新建設

第三卷 第六期

學習「實踐論」特輯

「實踐論」開闢了我們學術革命的思想道路　人民日報社論

新哲學研究的方向　潘梓年

「實踐論」解說　李達

「實踐論」的認識　王亞南

「實踐論」—馬列主義底發展與中國哲學傳統問題底解決　馮友蘭

「實踐論」—中國思想史（知行關係）的科學總結　侯外廬

凱恩斯主義批判　陶大鏞

實用主義批判　陳元暉

姓與氏　丁山

意識狀態試論　黃藥眠

再論中國歷史研究　翦伯贊

關於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書評）　彭澤益

新建設雜誌社出版

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

經中國人民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刊每月一日出版

定價每冊四千元

翻譯通報

·定價·

每册 2800元
三月 8400元
半年 16800元
全年 30400元

第一卷
合訂本

每部一萬一千元

本刊宗旨在加强翻譯工作者的聯繫，交流翻譯經驗、展開翻譯界批評與自我批評、提高翻譯水準。內容有：（1）翻譯理論與經驗（2）翻譯書刊評介（3）外文書刊評介（4）翻譯問題解答（5）統一譯名商討（6）翻譯界動態（7）翻譯計劃（8）翻譯消息（9）信箱等欄。

第二卷第一期要目

前進一步，提高一步！……沈志遠
論直譯（上）……焦菊隱
翻譯工作和『雜學』……呂叔湘
論翻譯工作的思想性……金人
談翻譯科學書籍……虞生
翻譯中的小問題一束（三）……雷海宗
對教科書中譯工作的幾點意見……黃非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幾段譯文……谷鷹
『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幾個良好譯例……茹普
一篇好的譯品（中）……曹汀
『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中譯本……謝寧
評徐步衡先生的『編譯』工作……小沙
關於音義兼譯……朱誠初
捷克人民的戰鬥雜誌『創造』……黃賢俊譯

第二卷第二期要目

實踐論（中俄對照）……毛澤東
從斯大林論語言學談到『直譯』和『意譯』……季羡林
論直譯（下）……焦菊隱
對於翻譯的幾點意見……葆煦
我對翻譯批評的意見……趙少侯
編纂『英華大辭典』的經驗……鄭易里
『攻克柏林』的華語配音……孟廣鈞
名從主人的音譯……逯壽
統一譯名和拉丁化……周華松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幾段譯文（續）……谷鷹
對於本刊第五期葉譯的商討……寒笙
『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金風
年輕的雪萊……茅於美

人民出版社 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全國各地均有分支店

新建設

第三卷　第六期

新建設雜誌社出版

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

「實踐論」開闢了我們學術革命的思想道路……人民日報社論（四）

專著

新哲學研究的方向……潘梓年（六）

學習「實踐論」

「實踐論」解說……李　達（八）
「實踐論」的認識……王亞南（一六）
「實踐論」——馬列主義底發展與中國哲學傳統問題底解決……馮友蘭（一九）
「實踐論」——中國思想史（知行關係）的科學總結……侯外廬（二七）
凱恩斯主義批判……陶大鏞（三一）
實用主義批判……陳元暉（三八）
姓與氏……丁　山（四三）
關於編寫與講授本國史的指導原則（下）……尙　鉞（四五）
意識狀態試論……黃藥眠（四八）

學術討論

讀了「怎樣研究中國歷史」……劉　晴（五〇）
再論中國歷史研究……翦伯贊（五三）
中國山水畫的發展和成就……楊竹民（五五）
答楊竹民先生……徐悲鴻（五七）

譯文

新編「哲學史」……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 王子野譯（五九）

學術問答

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政策與人民民主國家的貨幣政策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一九五〇年波蘭的貨幣改革與蘇聯盧布改爲金本位有無相同之點？（王烈望答）……（六七）

法、法律、法權的含義各如何？法律與法權二者是否可以混用？國家與國度兩者有何區別？（李浩培答）……（六八）

馬爾的語言學，自稱是「唯物主義的」，它的內容是怎樣的？主要的錯誤在那裡？（王輔世答）……（六八）

書評

關於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彭澤益（七〇）

學術文摘

由「實踐論」說到經濟工作……王學文（七三）

從經濟看美國政治……陳翰笙（七四）

中國古代史的劃階段問題……П·Б·西莫諾夫斯卡雅（七五）

學術簡訊

新哲學研究會舉行座談討論毛主席的實踐論——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積極開展發掘工作——北京歷史博物館開放「中國原始社會」陳列室——京市史學界春節茶話會交換推進研究工作意見——語言研究所舉行第二次語文專題座談會——老子學說在蘇聯——「列寧全集」第34卷出版——蘇維埃大百科全書的文學部份——蘇聯的圖書編目機構……（七七）

編後記……（三七）

『實踐論』開闢了我們學術革命的思想道路

——人民日報社論

近兩年來，隨着人民大革命的勝利，全國學術界已經開始自己的革命。這個學術界革命開端的特點，就是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從根底和極大規模地破壞了歷史的唯心論和歷史的神秘主義。勞動創造人類歷史的觀點，已經被極廣大的知識分子所接受，並成爲廣大的知識分子進行自覺改造的思想基礎。

但這只是我們學術革命的開端。這個學術革命必須繼續深入地前進，以求獲得更大的結果。這就是要把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與方法具體地應用於各種學術的部門，認眞地從事各種有系統的、而不是以枝節舉例爲滿足的批判的和研究的工作。

中國學術界在歷史上有過極其光榮的貢獻。我們也有很豐富的唯物論的歷史傳統。幾十年來，中國進步的學術界做了許多有利於人民事業的工作。但是，有一種事實也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這就是：我們近代學術界工作的眞正成就，還是很少很少的。毛澤東同志極其光輝地執行了中國革命所需要的各種根本理論工作的任務，他的理論工作總是站在實踐的前面，因而領導了革命實踐的前進。但是，就我們學術界本身來說，却還不善於學習毛澤東同志進行理論工作的方法，我們學術界的工作大大地落後於人民的需要，理論落後於實際。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二年的整風報告曾經指出，我們必須努力宣傳唯物論，宣傳辯證法，以克服理論戰線的落後。現在的問題仍然同樣：要克服我們在學術方面工作的落後，而使我們的學術工作提高到完全適合於人民新中國的建設的需要，提高到更高的水平，這就必須大力宣傳唯物論，宣傳辯證法。但毛澤東同志的所謂『宣傳』，並不是指那種口頭的空嚷，而是指那種必須按照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理論和方法，從事埋頭刻苦的工作。

宣傳唯物論，宣傳辯證法，這就是說，必須對着那種從封建社會沿襲下來的神秘主義和煩瑣主義的經院學派，對着近代中國那些或是土生的、或是從西方反動資產階級那裡販運來的各種唯心論和神秘主義的反動思潮，繼續進行革命的批判的戰鬥。

宣傳唯物論，宣傳辯證法，這就是說，必須用唯物論和辯證法來建立我們眞正的歷史科學，來發展我們的自然科學。

當然，這一切工作，絕不是用口號或標語所能解決的，也不是用一些貧困的知識去硬套若干抽象的公式所能解決的。這裡只能依靠認眞的搜集大量材料和認眞的研究。

恩格斯是說得非常精確的：『即令是唯物的觀點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的發展，也是一種需要數年靜心研究的科學事業。因爲很明顯的，在這裡，徒托空言是無益的。只有多數經過批判的選擇與全部精細研究過的歷史材料，才能解決這樣一個課題。』（恩格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正是我們宣傳唯物論偉大旗幟，它給我們指出了如何按照唯物論的道路去從事學術革命的工作。

不用諱言：我們進步的學術界在長時期中所以成就很少，就自己方面來說，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在於把『唯物論』徒托空言。對於一個問題精細研究過材料，或者對於很多材料加以批判的選擇，這樣工作過的人是很少很少的。時常出現這樣的情況：若干簡單的材料在很多人中間長期抄襲來抄襲去，以致連抄者都還弄不清楚它的出處。毛澤東同志說：『只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與合於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與論理來。』但我們的許多學術工作者實際上看輕了、以至否定了感覺的材料，更不用說有什麼『十分豐富』的感覺的材料。因此，他們的『學術工作』也就變成了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樣的所謂『學術工作』，結果當然只能是可悲的。

這樣的所謂『學術工作者』既然把『唯物論』徒托空言，所以很多人極力逃避對於現代問題和當前問題的研究。他們只喜歡集中談論古代而不喜歡研究近代，或者只喜歡集中談論外國的故事而不喜歡研究切近的事物。這些乃是因爲古代的事情或外國的事情，究竟離我們很遠，就可以便利於彼此長期空論不休，並不需要急求認眞的解決。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間關於『改造我們的學習』的著作中，對於我們社會歷史學術界方面的狀況，曾經這樣指出：『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眞動手去研究。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剩下希臘及外國故事（限於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抽象地搬來的。』毛澤東同志說這些話時，離現在已經將近十年，但是應該承認：我們整個學術界的成績還是很低微的。

是的，在我們的學術界中，也有些人從事搜集過某些問題的材料，而且是一些很可寶貴的材料。但是，這些人結果還只是爲材料而材料，這些人把自己工作停在半路上，而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他們『不知道感覺材料固然是客觀外界某些眞實性的反映，但它們僅是片面的與表面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沒有反映事物本質的』。毛澤東同志說：『認識的眞正任務在於經過感覺而到達於思惟，到達於逐步了解客觀事物的內部矛盾，了解它的規律性，了解這一過程與那一過程間的內部聯繫，即到達於論理的認識。』沒有把感覺的材料提高到論理的認識，這就是說，沒有認眞地從事研究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要有眞正好的成績，乃是不可能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法文譯本序言裡寫過以下有名的話：『在科學上面是沒有平安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勞苦不畏險阻的人，有希望攀到光輝的頂點。』這是極端正確的。事實上，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所指出的認識運動的全部過程，正是告訴了我們：在科學的路上必然會有怎樣的勞苦和險阻，而我們應該怎樣不惜勞苦地去克服必然遇到的險阻。在搜集十分豐富和合於實際的感覺材料的時候，這當然是要遇到許多險阻，並經歷一番極大的勞苦；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僞存眞、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論的系統』的時候，這當然又是要遇到許多險阻，並經歷一番更大的勞苦。

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這個著作中常常提到失敗的可能性和錯誤的可能性，而指出我們應該怎樣去變失敗爲勝利和變錯誤爲正確，這個啓發是極端重要的。毛澤東同志寫道：

『一般地說來，不論在變革自然或變革社會的實踐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這是因爲從事變革現實的人們，常常受着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學條件與技術條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觀過程的發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客觀過程的方面及本質尚未充分暴露）。在這種情形之下，由於實踐中發現前所未料的情況，因而部分地改變思想、理論、計劃、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說，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於實際，部分錯了或全部錯了的事，都是有的。許多時候須反覆失敗過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到達於和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夠變主觀的東西爲客觀的東西，即在實踐中得到預想的結果。』

當然，學術工作的實踐也是同樣的。但我們學術界許多工作者，總只期望自己一旦筆到功成，或者『日試萬言，倚馬可待』，而一遇挫折，便喪失了自己的毅力。把事情看得這樣容易，就當然不會眞正懂得什麼是學術的實踐，就不會在任何學術上『實現了預想的目的』，不會『得到預想的結果』。

毛澤東同志『實踐論』的重新發表，應該引起我們學術革命的展開。在我們的學術界各方面，各部門，應該認眞地討論『實踐論』，而把自己工作的檢討和這個討論聯繫起來，採取有秩序的恰當的態度，而不是採取粗暴的態度，從而改進自己的工作。

我們的革命經驗和歷史遺產都是端極豐富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民大革命的勝利和新國家建設的需要則給我們各方面的學術界開闢了極其廣大的『英雄用武之地』，我們已經存在的學術研究工作，現在需要更多和更深入的工作；我們還沒有開墾的學術研究工作當然很多很多，現在則需要大力從事開墾。恩格斯曾經有封信批評當時德國青年很少有人用唯物論作嚮導去認眞地進行研究工作，而指出研究的領域是無限地大，『誰只要肯認眞地去做，就可以有很多成就，就能夠出人頭地。』（『給史密特的信』）恩格斯的這個意見在我們這裡也是完全合適的。

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這個唯物論的偉大旗幟，將使中國學術革命的工作開闢了新的歷史的一頁。只要我們眞正能夠領略『實踐論』的深刻思想，並認眞地把它轉化爲學術的實踐，那末，中國學術界將出現偉大的成果，那是完全可以預卜的。

專著

新哲學研究的方向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在中國新哲學研究會武漢分會上的講話——

潘梓年

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在北京有許多朋友商談開展新哲學的研究問題，發起了中國新哲學研究會籌備會。武漢的哲學工作者也組織起來從事於新哲學的研究，成立了武漢分會。我們這個會之所以叫做「新哲學研究會」，就是用新的觀點來研究哲學上的各項問題。我們要加强對馬列主義理論的研究，用馬列主義的哲學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

什麼是哲學呢？有人說：「哲學是科學之科學」。我個人也是這樣的看法。亞里斯多德把論述物理學方面的稱爲科學，把非物理學方面的稱爲哲學，即所謂「形而上學」。這樣將科學與哲學對立，好像哲學就不是科學。個人認爲哲學也是科學，是科學的科學。具體地講，科學是在特殊的部份找出其規律，是某一部門知識的總結。用毛主席的話說：總結事物發展的規律就是科學。用中國的舊話說，科學就是以約賅博，以簡馭繁。各種科學都可以如此看。哲學是把所有的科學加以總結，找出總的規律，所以哲學是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思惟科學的共同的規律總結起來，得出總的規律，而這總的規律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幾條原則。這個講法是馬列主義肯定了的，爲什麼還說是個人的看法呢？因爲從研究方法講是否成立、妥當，我還沒有跟旁的朋友談過，所以是個人的意見。

從研究方法上來講，研究哲學最主要的是總結當前現實的鬥爭經驗，找出它的規律來。我們研究那一種學問，不能只是研究一些已經過去了的，或限於現有的；更主要的是研究發展中新生的事物，根據馬列主義的觀點，尤其要研究那是怎樣發展，如何推動其發展。我們不只是解釋世界，而是要改變世界。我們找出規律，把它引向我們所需要發展的方向，使發展具有目的性，這樣才不致走入「客觀主義」的歧途。

我們要研究當前的階級鬥爭、生產建設鬥爭等的經驗，找出它的規律，推動其發展。對於這種提法，在蘇聯哲學家尤琴同志新近來武漢時對同志們的諸問題的答覆中，更加强了個人的信心。在同志們所提出的問題中，有這樣一個問題：蘇聯目前哲學工作者的主要任務是什麼？尤琴同志說：蘇聯目前哲學工作者的主要任務有三：（一）總結社會主義的建設經驗；（二）總結國際工人運動的經驗；（三）根據現代科學的成就進一步研究哲學。這種看法與個人的意見可以說是一致的，因此加强了我的信心。

另外有同志提這樣的問題：研究哲學不懂自然科學行不行？尤琴同志對這個問題沒有作正面答覆，他說：假使哲學同自然科學沒有關係。那就沒有哲學；總結社會主義建設，如何能離開自然科學呢？

工人運動是怎樣的一回事呢？就是要革命，要改造世界。工人運動本是階級鬥爭中最尖銳的、最前進的。在沒有馬列主義以前，其鬥爭是自發的、無領導的、沒有科學武裝的。有了馬列主義以後，這個運動轉成自覺的、有領導的、有科學武裝的。因此工人運動是科學的實際行動，是把科學向前推進的運動。總結工人運動的經驗就可以使這個科學經常地向前發展。用列寧的話說，創造的馬列主義，必須經常有新的內容加進去，發展和修改舊的結論。

這種總結實際鬥爭經驗的方法，不僅是哲學的研究方法，就是其它學問的研究方法也是如此。最近蘇聯對岡察洛夫的「教育學原理」的批判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指出他沒有從現實的教育出發，總結新鮮的經驗。這是資產階級的方法，是脫離現實的方法。經濟學也是如此。斯大林同志說：經濟學的

主要任務是研究解決經濟建設方面的問題，總結其經驗。米邱林李森科的成就，就是總結農業生產方面的經驗。各種科學是如此，哲學也非如此不可。再拿毛澤東思想來講，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最好的哲學。它的產生是總結中國革命的實踐和經驗，那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眞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在這些經驗中，提出了許多新的規律，把馬列主義進一步地向前發展。在毛澤東的著作中，包含着新鮮生動的豐富內容。其所以是新鮮生動，就因爲這些都是毛主席由研究和總結中國革命過程中的各個問題而提出的規律。這些規律是從實際鬥爭中找出來的而又去指導實際，是總結羣衆的鬥爭經驗而又用來指導羣衆進行鬥爭。這就是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我們如果很好地掌握毛主席的這些規律，我們就能把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建立起來而推進其發展，所以這樣的總結經驗，不僅能够解決實際的問題，而且能够提高思想和理論，這是我們很好的榜樣。

我們已經知道研究哲學就是總結實際鬥爭的經驗，得出一般的規律。可是什麼是總結的武器呢？總結的武器是馬列主義。就最高的規律來講，馬列主義已經完成了。進一步的研究是在於更豐富它的內容，使它的範圍更擴大，包羅萬象，使這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武器，一方面解決新的問題、新的現象，另一方面又豐富了內容。尤琴同志最近發表的「蘇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等三篇文章，毫無疑問這是哲學的著作，是把馬列主義運用到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比如把資本主義社會變爲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的關鍵和動力是什麼？根據斯大林同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一書中的第一條有機聯系的規律來看，蘇聯過去的革命是被帝國主義國家所包圍，是孤立無援的，今天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就不同了，首先有蘇聯的幫助和新民主主義國家間的影響。再就第四條矛盾的鬥爭和統一的規律來看，土地改革，就是新的與舊的在鬥爭，在鬥爭中新的在生長，舊的在死亡，私有制要死亡的，新的要戰勝舊的。新的力量有各種，而其中主導的是工人階級，工人如何領導農民，工業如何領導農業等等問題，這些問題就把那條規律的內容變得更生動更豐富了。如果我們一條一條的研究起來，都可以在這裡得到很豐富的哲學內容。

在我們中國如何進行研究哲學呢？一方面有蘇聯的經驗幫助我們，同時我們從半封建半殖民地過渡到新民主主義的建設，這中間不管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都有許多的現實問題，有許多寶貴的經驗，我們要研究如何解決那些問題，如何總結這些經驗，使工作向前推進。拿武漢來講，在經濟方面，初解放時是破爛不堪，後來如何繁榮起來的呢？開始是穩定貨幣，接着調整公私關係，改進勞資關係，解決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等問題。處理這些問題有其一定的步驟、計劃和方案，這些步驟計劃就是值得研究與總結的。我們有什麼成功的經驗，有什麼失敗的教訓，而這些內容就會豐富辯證法中的某些條規律，這都是我們研究的對象，很好的材料。如果我們很不自量地說，這樣的研究是可以增加馬列主義的財富的。

再拿教育來講，我們的文教政策是團結、教育、改造。這種政策合不合理，是否科學，是否符合唯物辯證法的精神，都值得研究。其他如土地改革政策，文化政策，外交政策等等也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我們研究哲學就是要深入地研究這些東西。研究這些東西，一方面不會使我們脫離實際，另外還幫助我們掌握馬列主義，不會鑽牛角尖。同時我們這種研究工作是有助於當前建設事業的。這樣，可說在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基礎上提高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的理論。

以上這種對哲學的看法，我還沒有與旁的同志交換過意見，這僅是個人的意見。我們研究哲學，就是研究並總結實際鬥爭的經驗，那麼哲學史上的許多問題是不是還要研究呢？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哲學史上的問題不但要研究，而且還要很好地研究，但如果沒有與我們前面所講的一併研究，恐怕是不完整的。同時進行總結現實鬥爭經驗的研究，對哲學史上一些問題的研究，是會大有幫助的。

單純地研究歷史上許多問題，有時會變成鑽牛角尖。我過去曾研究「中庸」一書上的「誠」字，花很大氣力，並且很感興趣，自以爲是新的觀點，曾把這個研究寄與我老弟看，請提意見。我老弟批判我在鑽牛角尖。我過去又曾研究過王安石、商鞅以及卜式等的思想，現在自己發現過去走了許多彎路。自然，在研究工作中彎路是很難完全避免的，可是總是要盡力避免少走一些才好。我也看到許多朋友爭論孔孟，站在旁邊看，他們確是在鑽牛角尖。只是研究歷史上的問題，全不注意總結現實鬥爭的經驗，是有危險的。所以我認爲大學哲學系的同學，首先應研究新的問題，然後再研究康德、黑格爾等，使同學們先能掌握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再去研究哲學史上的許多問題，才不致走太曲折的路。

哲學不只是解釋世界，而還要改造世界，就是要掌握和研究當前的實際問題，總結其經驗，提出規律，使當前的社會更向前發展，這就是我們所應努力的方向。

「實踐論」解說

李　達

最近，全國的學術工作者和各級幹部，都正熱烈展開「實踐論」的學習運動，我們特請李達先生就「實踐論」的全文，逐段加以解說，幫助讀者作進一步的學習。全文約五萬餘字，將在本刊連載。——編者

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實踐論」發表以後，全國文化敎育界的工作者和青年們，都正在開始學習它。兩年以來，全國都展開着政治學習，大家學習社會發展史，學習新民主主義論，可說是已經相當普及了。現在，大家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實踐論」，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一步，這完全是必要的。

還有，全國數以百萬計的新的工作幹部，在新形勢下担任新任務時。爲要學得正確的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好好地掌握政策，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學習毛澤東的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的科學總結——「實踐論」，這也完全是必要的。

因此，我纔不揣冒昧，把我學習的所得，寫成「實踐論」解說，藉供同學們學習時的參考。或許這也是必要的。

「實踐論」涉及了辯證唯物論這一哲學的全部，如果要詳細地解說起來，可寫成一本大部頭的書，這在短時期內不易做到。所以，我的解說祇限於必要的範圍，適可而止。

我自己還在學習期間，解說中難免冒犯錯誤，請同學們予以指正。(註)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識對生產與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

馬克思的唯物論，是辯證法的唯物論；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例如法國機械唯物論和費爾巴哈的唯物論，是沒有辯證觀點的唯物論，即是形而上學的，或抽象的唯物論。前者是由自然領域擴張到社會領域的唯物論，後者只是適用於自然領域的唯物論。前者是無產階級的哲學，後者是資產階級的哲學。兩種哲學的基本差異的分歧點，是在認識論的基礎之上。

哲學是世界觀。辯證唯物論這一科學的世界觀，是人們對於世界（包括自然、社會與思惟）的一般發展法則的認識。認識是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的統一。認識主體是人，認識客體是外部世界，外界事物。但是爲認識主體的人，究竟是怎樣性質的人？對於這一問題，抽象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各有不同的解答，因而形成兩種不同的認識論、不同的唯物論。

在抽象唯物論一方面，爲認識主體的人，只是自然界的生物，是生物學上的人，是人類學上的人，是超越時間空間的人。不論是原始社會的人，奴隸制社會的人，封建社會的人，資本主義社會的人，甚至共產主義社會的人，在共爲人的一點是同一的。這樣的人，是抽象的人，是一般的人，沒有社會性，也沒有歷史的發展。這樣的人，雖好像是超階級的人，而實際上却隱藏了階級的眞相。所以抽象唯物論的認識主體，實際上是屬於資產階級的人，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抽象唯物論從抽象的人、一般的人去了解認識客體時，只把外部世界或外界事物，看做是可以感覺到的東西，看做是感覺的來源，却不看做是人的行動的對象，可被改造的對象。因而這樣的哲學的任務，至多只是說明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

在辯證唯物論一方面，爲認識主體的人，不單是自然界的生物，而主要地是社會的動物，是政治的動物，是在社會中製造並使用工具以變造自然物爲生活資料的高等動物。是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一定社會中的人，是屬於特定階級的人。他在原始無階級社會中，是與其他一切人平等的人，他在奴隸制社會中屬於奴主或奴隸的階級，在封建社會中屬於地主或農民的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屬於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社

(註) 以下各段，有引號的部分，均爲「實踐論」的原文，每段原文的後面，即爲該段原文的解說。——編者

會中是屬於工人階級。這樣的人，是實在的人，是具體的人。因而在階級社會中，為認識主體的人，是屬於特定階級的人，是特定階級的代表，所以辯證唯物論的認識主體，是屬於無產階級的人，是無產階級的代表。辯證唯物論從上述實在的人，具體的人去了解認識客體，就不單把外部世界或外界事物，看做是感覺的源泉，並且看做是人的行動的對象，可被改造的對象。因而，辯證唯物論這一哲學的任務，不單是說明世界，而最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世界——客體，認識——主體，認識了的世界（世界觀）——主體與客體的統一。主體與客體如何能够統一？辯證唯物論者的答覆是：由於實踐。實踐是勞動，是生產，是產業，是階級鬥爭，是「革命的批判的行動」。社會的人，只有在他們結成一定的社會關係，共同向外部世界採取自然物並變造為生活資料的過程中，即在社會的生產過程中，纔能認識外部世界，並把所得的認識（知識）來指導並組織社會的生產。特定社會中被壓迫階級的人們，只有在組織為一個階級共同對敵對階級鬥爭的過程中，纔能認識那階級社會的眞相，並根據所得的認識來指導並組織革命，所以主體與客體的統一，是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統一的。一架機器是知識與勞動的統一，其統一的基礎是勞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革命理論和中國人民革命實踐的統一，其統一的基礎是人民革命的實踐。所以人們對於自然和社會的認識，必須依賴於社會實踐，依賴於生產與階級鬥爭。毛澤東同志在『整頓黨風學風文風』中說過：『什麼是知識？從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民族鬥爭知識也包括在裡面。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沒有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概括與總結，此外再沒有別的知識了。』。知識（即認識）之依賴於生產與階級鬥爭，是非常明顯的。

抽象唯物論者費爾巴哈，雖然也曾經要把實踐作為認識的基礎，但他把實踐只解釋為人與自然的鬥爭。這是抽象的自然主義的實踐觀。因為人若離開社會，是決不能與自然鬥爭的。所以，在費爾巴哈說來，為認識主體的人是抽象的自然科學上的人，為認識客體的世界只是可以感覺的對象，不是可被變造的對象，因而這樣的主體與客體的統一，是在消極的被動的感覺過程中實現的，而不是在實踐的基礎上實現的。他不能理解人的社會實踐之歷史的階級的性質，因而他和馬克思以前其他一切唯物論一樣，是『離開人的歷史發展，離開人的社會性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識生產與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

「首先，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於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與自然的關係；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與人的一定的相互關係。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在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每個人以社會一員的資格，與其他社會成員協力，結成一定的生產關係，從事生產活動，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在各種階級的社會中，各階級的社會成員，則又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結成一定的生產關係，從事生產活動，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這是人的認識發展的基本來源。」

辯證唯物論由自然領域擴張於社會領域，就成為歷史唯物論，歷史唯物論的總論點是：我們人類生活在社會之中，第一件重要的根本工作，是取得物質生活資料來維持自身的存在。所以人們在從事政治活動及其他各種精神文化的活動之前，必先從事生產的活動，滿足衣食住等項的需要。這類生活資料的生產，以及一個時代經濟發展的階段，就形成為社會的基礎。其他國家機關，法律見解，科學，藝術等等，都是在這個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上層建築。這些上層建築物，都受那個基礎所規定、所說明。所以社會實踐雖有很多種類，而馬克思主義者却『認識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

人類由高級人猿進化而來以後，就結成原始人羣，共同向自然界採取生活資料以維持生存。他們在採取生活資料的過程中，接觸到自然界的無數自然物，首先就知道他們自己是和那些自然物有區別的。他們在長期的生產活動中，逐漸認識水、火、風、雷、雲、雨、動、植、飛、潛等自然現象，看到日月的運行、晝夜的循環、植物一年一度的生長和成熟等等，於是就了解這些自然物的性質及其規律性，並且順應它們的性質和規律性，經常地利用自然，克服自然，改造自然，實行和自然界交換其物質，即人類運用其勞動力來作用於自然物，而自然界便把人類所需要的交給他們。照這樣，人們便知道他們自己棲息於自然之中。與自然發生經常的相

互關係。並且，在生產活動中，人們知道他們自己必須結成一定的關係，互相交換他們的勞動，纔能向自然界取得生活資料。這樣的相互關係，是生產關係。基於這生產關係，更發生其他各種社會關係。在長期的生產活動中，人們就能『在各種不同的程度上，逐漸的認識了人與人的一定的相互關係』，即認識了生產關係以及在生產關係上發展起來的其他各種社會關係。這一切關於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係的知識，都是在生產過程中得到，並用來指導生產活動，促進生產。

在原始無階級社會中，人人都是勞動者，各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他們最初知道按照年齡別與性別，分任採集和狩獵工作，取得生活資料。往後由飄泊生活轉入定居生活，由採集經濟轉入生產經濟，知道結成氏族團體，按照一定分工方法，互相交換其勞動，結成平等的生產關係，經營農業與畜牧業，往後又經營手工業，因而生產力逐漸發展，物質生活也比較以前豐富了。但是，隨着勞動的分工與私有財產的發生，社會開始發生了奴主與奴隸的階級的分裂，社會便轉變爲最初的階級社會，即奴隸制社會了。

階級社會，經歷了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制的三種形態。這三種階級社會，都分裂爲兩大對立的階級。其一是剝削階級，即奴主階級、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他們都獨佔着社會的生產手段，專靠剝削其對立的階級，過着富裕的生活。其一是被剝削階級，即奴隸階級、農民階級和無產階級。他們因爲被剝奪了生產手段，迫不得已爲對方階級勞動，取得極少的生活資料，過着非人的生活。剝削階級，知道對方被剝削階級佔居絕大多數，爲了鎮壓被剝削大衆的反抗，便組織國家權力，作爲壓迫對方階級的機關。被剝削階級在其非人生活條件下，也逐漸地認識了剝削制度，認識了那鞏固剝削制度的國家機關，他們就知道團結起來，去推翻剝削與壓迫的階級，爆發了奴隸革命、農民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被剝削階級這樣由於認識剝削制度而實行階級鬥爭的知識，都是在生產過程中得到的。

『人的社會實踐，不限於生產活動一種形式，還有多種其他的形式，階級鬥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總之社會實際生活的一切領域都是社會的人所參加的。因此人的認識，在物質生活以外，還從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與物質生活密切聯系）。在各種不同程度上，知道人與人的各類關係。其中，尤以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給予人的認識發展以深刻的影響。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在階級社會中，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生活的方面很多，人參加於這些實際生活的活動也很多。大概說來，除了生產活動這一基本形式之外，還有階級鬥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等形式。在這些活動形式中，階級鬥爭是主要的活動形式，階級關係，原是生產關係，階級鬥爭是在生產過程中發生發展的。無產階級因爲被剝奪了生產手段，不能不在工錢制度之下，出賣勞動力於資本家，爲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但他們在生產過程中認識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之後，就知道團結起來，對資產階級實行鬥爭。這種鬥爭，首先是經濟鬥爭，即爲爭取較有利的勞動條件的鬥爭，更進一步，就進行政治鬥爭。組織革命。革命必須掌握正確的革命理論。於是階級鬥爭的精神，就必須貫串於一切精神文化的領域，於科學，於藝術，於哲學。因爲在這些領域中，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一向獨佔着支配地位，資產階級用整套的反動的科學、藝術和哲學，作爲統治無產階級的精神武器。正和他們憑藉經濟權力和國家權力作爲統治無產階級的物質武器一樣。無產階級爲要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就必須建立自己階級的整套的科學、藝術和哲學，清洗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掃除敵人僞裝的有害的毒素。所以，在階級社會中，對立的階級，各自生活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之中，各自有其一套的階級思想。

中國人民，百多年來，受着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思想毒害，以致革命的人民，在長時期內不能建立正確的革命思想。直到近三十年來，人民領袖毛澤東的思想，纔在革命的實踐中，逐漸鍛鍊出來，成爲全國人民革命的指導思想，並貫串於政治的經濟的及文化的領域，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思想。現在我們必須根據毛澤東思想，從科學、藝術和哲學的領域中，澈底『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爲人民服務的思想』。尤其是要熱愛祖國，熱愛人民，樹立愛國主義思想，清除帝國主義者對中國文化侵略的影響，克服民族自卑感，加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表現出中國人民在思想戰線上，也同樣的站了起來。

『馬克思主義者認爲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因此，人們的認識，不論對於自然界方面，對於社會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即由淺入深，

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大家對於社會的歷史只能限於片面的了解，這一方面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會的歷史，另方面，則由於生產規模的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人們能够對於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了解，把對於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這只是到了伴隨巨大生產力——大工業而出現近代無產階級的時候，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

認識依賴於社會實踐，依賴於生產與階級鬥爭，這在上文已經說明了。但社會的生產活動是一個發展過程，因而人們的認識也是一個發展過程。認識的歷史，隨伴於實踐的歷史。『社會的生產活動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因此，人們的認識……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這個道理，可以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哲學三方面加以說明。

先從自然科學的知識來說。我中華民族，從傳說中的氏族社會以來，勞動人民祖先，在生產活動中，逐漸地認識了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有過無數的科學上的發明和發見。自從燧人氏發明用火，庖犧氏發明畜牧，神農氏發明耕種，製造耒耜，嫘祖發明養蠶以後，數千年來，我民族就主要地從事於農業生產，直到現在。在數千年的農業生產過程中，有着很豐富的科學的創造，來爲生產服務。在數學上，早在歷史上的傳說時代，就發明了『十進法』和『九九乘法』。春秋秦漢之間，有『周髀算經』和『九章算術』，漢代以來，許多算學家創造了代數、幾何，還有『數書九章』『四元玉鑑』等算學著作。在曆法及天文學方面，在夏代氏族社會，即已發明了太陰曆，以後還發明了太陽曆。星象的觀測，也有許多優秀的天文家。在工程方面，水利灌溉工程學說，自夏禹治水以後，歷代出了許多偉大的水利工程專家。在機械工程方面，從傳說中的夏代奚仲作馬車以後，春秋時代有公輸般以能造機器著名，三國時，諸葛亮作木牛流馬，隋代曾造出了能容八百人的大船，明代曾造出多艘能容四千多人的大海船，航行印度洋。在紡織業方面，四千多年前，便有了繅車和機杼，漢代一個女紡織師，發明過提花機。在軍事工業方面，一千九百年前，就發明了火藥，以後又發明了火礮。在燃料工業方面，四千年前，祝融發明了用炭，漢代已有用煤的記載，宋代四川人已知道用煤氣。在造紙及印刷術方面，東漢蔡倫發明了造紙術，隋代發明雕版印刷術，宋代發明了活字印刷術。這一些偉大的科學的知識，都是從生產活動中得來，並服務於生產的。只因爲封建的生產方式，阻礙了科學技術的進步，最近二、三百年來，終於停滯不前，而讓歐洲人跑到前面去了。近二、三百年歐洲人科學上的進步，是伴隨於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而發展的。但是那些科學上的成就，只爲資產階級服務，變成了剝削的工具。

其次，說到社會科學的知識。這和自然科學的知識不同。自然科學的知識，主要的說明人與自然的關係，即如何認識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這一部門的知識，除了涉及生物學和自然哲學（雜有上帝創造人類創造世界的神學性）以外，大都不涉及階級關係。至於社會科學的領域，完全是涉及社會關係、階級關係的。在奴隸制、封建制社會中，關於社會方面的各種學說，完全是奴隸主階級和封建階級的人所創造的。這兩種社會中的階級關係和剝削關係，非常單純而透明。奴隸做工養活奴主，農『民出粟米麻絲以事其上』（封建主），這是剝削的定律。反之，奴隸如不做工養活奴主，就格殺勿論，農『民如不出粟米麻絲以事其上，則誅』，這是壓迫的定律。所以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關於社會方面的知識，是以上述剝削定律與壓迫定律爲依據的。中國自周秦以迄鴉片戰爭的二千餘年之間，有不少關於社會方面的學說。在經濟領域中，有管子書、商鞅書、貨殖傳、平準書、鹽鐵論、田賦論、租稅論、理財論等的著作，這些著作主要的是爲封建主講求剝削術的。在政治的領域中，主要的有儒家的倫理的政治學說和帝王統治術等的著作，這些著作，是鞏固專制政治，講求對農民鎮壓與欺騙的方法的。在法學領域中，有不少法家學說和歷代的法典，規定了很細緻的保障封建財產的章程。在歷史學的領域中，有不少史學方法論和史論的著作，但大部份是說明如何叙述帝王卿相等封建階級剝削與統治的事實。在這一類的知識中，雖然也有過一些積極的東西，但也只是對於社會歷史的片面了解。這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會的歷史，另方面則由於生產規模的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在歐洲方面，希臘羅馬奴隸社會時代，奴主階級也曾有一套剝削和壓迫奴隸的社會學說，最主要的是羅馬法。中世紀長期黑暗時代，一切知識都受神學所支配，直到資本主義的曙光期，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纔逐漸萌芽。隨着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發展，大工業的出現，階級與階級鬥爭（最初是資產階級對封建階級、其後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發展，社會生活的日趨複

雜，於是研究社會現象的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歷史學，就如雨後春筍一般地出現了。但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貫串着資產階級的偏見，却又僞裝超階級的態度，藉以鞏固其階級的剝削與統治，所以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除了古典經濟學較有突出的成就外，其餘在實際上並不能稱爲科學。但是到了十九世紀初期，與資產階級社會科學並行的，有空想社會主義出現了。

最後，再就哲學方面來說。哲學從古就分裂爲唯物論與唯心論兩個陣營。唯物論常是代表革命進步的階級，唯心論常是代表反動的保守的階級。最初的哲學是唯物論，接着有唯心論出現，往後又有新唯物論起而代之。哲學的歷史是唯物論與唯心論鬥爭的歷史。但哲學是世界觀，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概括與總結』，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還未發達的時代，哲學所能概括所能總結的那種世界觀，必然是片面的，是直觀的，是抽象的。十八世紀法國機械唯物論，雖然是復活了古代唯物論，形成爲資產階級革命的世界觀，但當時自然科學除了數學、力學以外，還不發達，這一唯物論，主要地是綜合當時數學、物理學、力學的知識而成的世界觀，帶有力學的機械的性質，所以成爲機械唯物論。這一機械唯物論，當作資產階級對封建階級鬥爭的精神武器來看，是起過很大的作用的，但當作哲學的科學來看，却是形而上學的、抽象的唯物論。當資產階級爬上了統治階級以後，就放棄了這種唯物論，而採用唯心論了。這樣的唯心論，就是德意志唯心的古典哲學，其最高峰是黑格爾的辯證唯心論。

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資本主義社會已發展到自我批判的時代，它的內在矛盾，已經充分暴露了出來，其第一個矛盾，是工錢勞動與資本的矛盾，無產者已形成爲一個階級登上政治革命的戰場。無產階級第一個最偉大領袖馬克思，在其領導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中，鍛鍊出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批判地攝取了過去知識的成果，綜合當時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結論，把德國古典哲學辯證唯心論改造爲辯證唯物論，把英國古典經濟學改造爲資本論，把法國空想的社會主義改造爲科學的社會主義。辯證唯物論、資本論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構成部份，辯證地綜合爲一體，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體系。所以馬克思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矛盾已經暴露而無產階級出現於世界革命戰場的時候，纔發生纔形成的。

『馬克思主義者認爲，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眞理性的標準。實際的情形是這樣的，只有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物質生活過程中，階級鬥爭過程中，科學實驗過程中），人們達到了思想中所預想的結果時，人們的認識才被證實了。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後，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爲勝利，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道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爲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列寧這樣說過：『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因爲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爲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强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爲實踐服務。判定認識或理論的是否眞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眞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與基本的觀點。』

現在，我們來談起認識的眞理性的標準問題。所謂眞理，是說人們的認識，正確地反映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即是說，主觀符合於客觀。反之，認識如果不能正確地反映客觀世界的規律性，或者歪曲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便是錯誤，即是說，主觀不符合於客觀。這眞理與錯誤的鑑定的標準是什麼？這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我們在生產建設過程中，常就某一產業部門，估計工人們的數目，他們的勞動能力和工作的積極性，調查技術的設備，原料的供給情況，及其他一切的條件，定出一定期間的生產計劃付之實行。到期如果計劃完成或者超額完成，這計劃便符合該一產業部門發展的規律性，便是眞理。又如在革命戰爭的過程中，指導者如果善於了解敵我雙方的情況和政治、經濟、地理、氣候等一切戰爭環境，『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來進行作戰，結果取得了勝利。這個作戰計劃便把握住了客觀的戰爭規律，即主觀與客觀相融洽，即是眞理，又如說，水是氫氧二氣化合而成的，我們若能把水分解爲氫氧二氣，又把氫氧

二氣化合爲水，這認識便是眞理了。米丘林學派說春麥可以變成耐寒的多麥，這一眞理，已由蘇聯農業界證實了。所以人們的工作如要達到預想的結果，必須要使主觀的思想與客觀的規律性相符合，否則必然招致失敗。人在社會中的行動，失敗原是常事，只要能够吸取失敗的教訓，正確地再認識行動的對象的規律性，就容易得到成功。六〇六針藥的發明者，經過了六〇五次實驗的失敗，終於在最後一次得到成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的革命，也曾遭受過大小若干次的失敗，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善於吸取這些次失敗的教訓，應用馬列主義的普遍眞理，結合了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鍛鍊出新民主主義理論作爲革命的指針，所以中國的人民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所謂「失敗是成功之母」、「吃一虧、長一智」，正是這個道理。』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是建築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之上的。它認爲實踐是認識的出發點和源泉，是認識的眞理性的標準。人若是離開了實踐，就不能得到任何一點的知識。所以實踐對於認識，佔居第一位。凡屬否認實踐的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理論，都是錯誤的理論，是辯證唯物論所排斥的。列寧說：『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因爲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實踐爲什麼高於認識？這是因爲實踐是認識的基礎，而認識只是實踐的因素，並且爲認識的眞理性的標準的實踐，是社會的實踐之綜合，對於認識具有普遍性的品格。不單如此，人的認識是直接作用於行動的對象，所以具有直接現實性。至於認識是通過實踐的活動去認識對象，並且冉通過實踐去證明的，它只有媒介的現實性。正因爲實踐比較認識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現實性的品格，所以實踐高於認識。

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即階級性與實踐性。這兩者具有有機的不可分離的關係。本來辯證唯物論這一哲學，是當作無產階級鬥爭的精神武器，在無產階級鬥爭中，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造所鍛鍊而又由列寧斯大林所發展起來的哲學，它是爲着無產階級，並專屬於無產階級。只有無產階級敢於面向眞理，因爲他們不怕被別人推翻。馬克思當年創造這一哲學時曾經說過：『正如哲學在無產階級之中，找到了它的物質武器一樣，無產階級在哲學之中，找到了它的精神武器。』由此可見，辯證唯物論這一哲學，在它被創造的時候，就和無產階級分不開的。馬克思主義者公開宣稱辯證唯物論是爲無產階級和他們的黨服務的，不但公開宣告這一哲學的階級性、黨性，並且還揭露敵對階級哲學的階級的本質，扯出它的『超階級性』『超黨性』的虛僞面幕；同時，這對於僞裝混入無產階級陣營的敵人（資產階級走狗）毀損或歪曲辯證唯物論的任何理論，作堅決無情的鬥爭，把它們清洗出去。其次，辯證唯物論是革命的哲學，行動的哲學，力說哲學的實踐性、革命性和政治性，並且揭露敵對階級哲學的欺騙的本質，撕去它的『純學術性』『純客觀性』的神秘外壳；同時，還對潛入無產階級陣營的敵人企圖閹割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革命性、政治性的有毒理論，予以無情的打擊和掃蕩。所以辯證唯物論強調革命理論對於革命鬥爭的依賴關係。革命的階級是爲革命而哲學，不是爲哲學而哲學。革命理論從革命鬥爭鍛鍊出來，又轉過來爲革命服務。

還有，爲眞理之標準的社會實踐，完全是客觀的。我們依據對於某一自然物的認識去改造它的時候，若能達到預想的結果，這認識便是眞理，反之便是謬誤。眞理與謬誤，由實踐來鑑定，完全是客觀的，絕不雜有主觀的成份。眞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此外別無標準。所以，『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與基本的觀點。』

『然而人的認識究竟怎樣從實踐發生，而又服務於實踐呢？這只要看一看認識的發展過程就會明瞭的。

原來人在實踐過程中，開始只是看到過程中各個事物的現象方面，看到各個事物的片面，看到各個事物之間的外部聯繫。例如有些外面的人們到延安來考察，頭一二天，他們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觸了許多的人，參加了宴會、晚會與羣衆大會，聽到了各種說話，看到了各種文件，這些就是事物的現象，事物的各個片面以及這些事物的外部聯繫。這叫做認識的感性階段，就是感覺與印象的階段。也就是延安這些各別的事物作用於考察團先生們的感官，引起了他們的感覺，在他們的腦子中生起了許多的印象，以及這些印象間的大概的外部的聯繫，這是認識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人們還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論理（即合乎邏輯）的結論。』

前面已經說明了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識對生產與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現在進而說明『人的認識究竟怎樣從實踐發生，而又服務

於實踐」的問題。要理解這個問題，必須分析認識過程。

在分析認識過程之前，必須說明辯證唯物論的反映論。這一反映論，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核心。我們分析認識過程時，如不能澈底展開這一反映論，就會背離於辯證唯物論，而陷於唯心的不可知論的泥沼。這一反映論，是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造，而由列寧發展起來的。馬克思說：「觀念的東西，是由人類頭腦中所翻印所加工的物質的東西」；恩格斯說：「我們頭腦中的概念」是「現實事物的反映」。這些命題，是唯物論的反映論的古典見解。列寧發展了這一反映論，把認識看作反映，認識就是反映自然。關於客觀的認識，即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即映像或肖像。凡屬認識過程中一系列的因素，如感覺、省悟、印象、概念、判斷、推理、思想、法則、結論等等，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依據這一反映論，人們就能够完全地認識客觀世界。雖然人們的認識不能一次地完全地反映出客觀世界一切的方面、聯繫和屬性，但那些還不曾被反映的方面、聯繫和屬性，人們都能够在認識過程中把它們反映於感覺和概念之中，變爲人們所認識的東西。照這樣，由於社會實踐的發展，人們就能够在認識運動過程中，一步又一步地接近於客觀世界之完全的認識。所以，唯物論的反映論，表明了客觀世界是可以完全認識的，因而揭破了不可知論之唯心的虛構。還有，反映是一個過程，並且是一個矛盾的運動過程。反映過程中的內在矛盾，是客觀世界內在矛盾的反映。如同客體與主體的矛盾，現象與本質的矛盾，感覺與概念的矛盾等，都是反映過程中的矛盾。由於這些矛盾的運動，引起反映過程中的突變，如由現象到本質，感覺到概念，都是突變。我們必須懂得這種突變，纔能理解唯物論的反映論的本質。

關於認識過程的分析，列寧給了輝煌的指示。他說：「從生動的直覺到抽象的思惟，從抽象的思惟到實踐，這是認識眞理，認識客觀實在之辯證法的路程」。這一認識的總過程，可分爲兩段的過程：一是「從生動的直覺到抽象的思惟，」即由感覺到思惟的過程；一是「從抽象的思惟到實踐」，即由認識到實踐的過程。這兩段過程，具有有機的聯繫，因爲在實踐中認識外界事物的規律性以後，立即要把這認識通過實踐來檢證，並用以指導實踐。在說明的順序上，我們先說明由感覺到思惟的過程。

由感覺到思惟的過程，可分爲感覺與思惟兩個階段。感覺是初級階段，思惟是高級階段。前者是感性認識，後者是理性認識或論理認識。感性認識必須以理性認識爲歸宿，理性認識必須以感性認識爲前提。認識必須從感性發展到理性，纔能告一段落。所以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不是獨立的認識，也不是獨立的認識階段，兩者互相滲透，互爲條件，其間決沒有不可踰越的界限。

我們認識外界事物，必先通過感覺，我們的思惟，把感覺作爲材料，抽象出外界事物的規律性。感覺中所有的東西，就是思惟的全部內容。感覺中所沒有的東西，思惟中也是沒有的。所以我們認識外界事物，必須從感覺出發。從古以來，一切科學都是從反映外界事物的感覺出發的。外物是感覺的源泉，感覺是認識的源泉。

在實踐過程中，我們接觸於外界事物，外界事物反映於我們的感官，便發生感覺。許多感覺合流在一起之時，我們就得到關於外界事物的知覺。當離開外界事物時，那感性知覺就在我們腦海中記憶下來，我們就感性知覺記憶中所留存的外界事物的各方面、聯系和屬性等，放在一個形像上概括起來，就造出了關於外界事物的印象。至於經驗，則是感覺的重複和積累。感覺、印象、經驗等，都是外界事物的反映或肖像。印象之反映外界事物，比較感覺要深刻些，明晰些。這感覺、印象和經驗等，都只是感性的認識，是思惟的材料。哲學上所說的直觀、直感或直覺，都是指這個階段的認識說的。延安考察團的人們，最初在延安考察所得的感覺和印象，就屬於這個認識階段。在這個階段上，人們只能認識事物的現象的外部聯系，不能認識其本質的內部聯繫，即是說：「還不能造出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論理的結論」。

毛澤東同志指示我們「從實際出發」，即是從感性認識的階段出發。担任某一任務的工作者，爲要正確的掌握政策，不出偏差，就必須善於了解情況。「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層的生動情況」（見農村調查序言二），搜集有關各方面的資料，聽取羣衆的意見和經驗，做一句話說，即「詳細佔有材料」，做爲了解情況的依據。

「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與印象的東西反覆了多次，於是在人們的腦子裏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產生了概念。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繫，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

事物的內部聯繫了。概念同感覺，不但是數量上的差別，而且有了性質上的差別。循此繼進，使用判斷與推理的方法，就可產生出合乎論理的結論來。「三國演義」上所謂『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我們普通說話所謂『讓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腦子中運用概念以作判斷與推理的工夫。這是認識的第二個階段。外來的考察團先生們在他們集合了各種材料，加上他們『想了一想』之後，他們就能夠作出『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徹底的、誠懇的、與眞實的』這樣一個判斷了。在他們作出這個判斷之後，如果他們對於團結救國也是眞實的話，那末他們就能夠進一步作出這樣的結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能夠成功的。』這個概念、判斷與推理的階段，在人們對於一個事物的整個認識過程中是更重要的階段，也就是理性認識的階段。認識的眞正任務在於經過感覺而到達思惟，到達於逐步了解客觀事物的內部矛盾，了解它的規律性，了解這一過程與那一過程間的內部聯繫，即到達於論理的認識。重複地說，論理的認識所以和感性的認識不同，是因爲感性的認識是屬於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繫的東西，論理的認識則推進了一大步，到達了事物的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系的東西，到達了暴露周圍世界的內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圍世界的總體上，在周圍世界一切方面的內部聯繫上去把握周圍世界的發展。』

現在進而說明認識的運動過程，即感覺到思惟的推移過程，我們說認識是外界事物的反映，正和鏡子中的映像是某種對象的反映一樣。但人的認識，並不像鏡子的反映那樣，完全是受動的，不變的。人是積極地能動地變造自然以維持其生存的動物，是從事於物質的生產的動物。人們實踐的物質的能動性，在觀念的形式上反映出來，就成爲認識的能動性。所以人在認識上反映外界事物的那種反映，是能動的反映。那認識的能動性，在認識過程中，表現爲主體的創造能力，能夠把感覺和印象實行論理的加工，把感性的認識提高到論理的認識。認識的這種能動性，是社會的歷史的實踐的因素；認識的深化運動，也是在實踐的基礎上顯現的。在物質的生產過程中，人們經常把各種物質的物體分解又結合，這就促進認識的分析與綜合的能力；人們又經常看到各種商品互相交換，這就促進認識的普遍化的能力；人們經常看到各種現象的反覆、各種現象在實踐上的再現，一種現象之後接着有他種現象發生，這就促進認識的推理能力，（例如由履霜而推論到堅冰至，由月暈而推知有風，由礎潤而知有雨，由美帝侵略朝鮮而推論到它將進攻中國等）。所以人們在實踐中所得的感覺和印象反覆了多次，就『在人們腦子裡生起了認識過程的突變，產生了概念』。概念的構成，是人們運用頭腦的創造力，就感覺與印象實行論理的加工的結果，即是把感覺普遍化的結果。感覺反映事物的個別性、事物的現象，事物的外部聯繫，概念反映事物的普遍性、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內部聯系。像這樣由個別到普遍、由現象到本質、由外部聯繫到內部聯繫的推移。就是認識運動過程中的突變。

就哲學上物質這一概念的構成過程舉例來說：世界是物質的統一體，物質的種類，千差萬別，混沌流動，有物理學性質的物質，有化學性質的物質，有生物學性質的物質，還有社會領域中的物質，即關係（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階級關係、政治關係、文化活動的關係等）。辯證唯物論這一哲學，却就感覺上所反映的千差萬別而又混沌流動的物質的物體的外部關聯中，抽出其最普遍的規定：即他們都是離開我們意識而獨立存在的客觀實行，而又爲我們意識所反映。我們從一切物質的物體中，單把這一方面的屬性抽象出來，把其他一切質與量的區別捨象出去，由此就可以到達於關於這一切物質的物體之最單純最普遍的規定。構成哲學上的物質的概念，即物質是離開我們感覺獨立存在，並在感覺上給與於我們而又爲我們感覺所反映的客觀實在性的哲學的範疇。這樣看來，關於物質的概念與關於物質的感覺，在數量上，在性質上，都是有差別的。感覺反映物質界的個別性、現象、外部聯系，概念反映物質界的普遍性、本質、內部聯系。感覺的內容非常豐富，概念的內容比較貧弱，這是兩者在數量上的差別。但概念比較感覺却更深刻地反映了物質界，這是兩者在性質上的差別。

概念構成以後，我們就能開始思惟，即進行判斷與推理。概念是反映客觀事物的思惟形式，判斷和推理是反映客觀事物與人類認識的一般規律的思惟形式。判斷與推理必須運用概念纔能進行，否則便不能思惟。延安考察團的人們，把延安考察所得的感覺和印象，實行普遍化的概括，就能造出『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概念，因而作出如下的判斷：『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澈底的誠懇的與眞實的』。（下接58頁）

「實踐論」的認識

王亞南

「新建設」的編者希望我以『學習「實踐論」與研究政治經濟學』這個題目，寫一篇文章；但期限很促，寫到了第一節「實踐論的認識」，已覺寫下去太長了，時間也到了，所以就把這一節發表出來，作爲我對「實踐論」的理解。

被看作毛澤東思想的基礎的「實踐論」的出現，那不但在中國思想界，在中國革命建設事業上是一件大事，就在我們這個革命勢力對反動勢力進行最後搏鬥的大轉形時代的世界思想史和世界史上，也將很快證示出它的具有決定意義的作用和影響。

顯然的，「實踐論」是依據當代世界革命特別是中國革命的具體條件，靈活運用馬列主義武庫中的一切法寶所創製成的，但當它創製成功以後，却對於那個武庫有了極大的充實。

由於「實踐論」，毛澤東思想就不僅更明確更系統地成爲馬恩列斯體系的延續，並且是對那個體系的非常生動的光輝的發展。

爲了確證上面的說明，我想在這裡把我對於「實踐論」的膚淺的認識，概括在以次幾點中：

第一 「實踐論」極明確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神髓。

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以往一切哲學相區別的基本關鍵，就在它不是以學術爲目的，不是學院式的探究眞理，不在提出若干叫人稱許供人信仰的敎條，而在作爲革命行動的指南。用毛主席的另一天才表現：就是講「造反有理」，就是爲了革命的實踐。

所以，「實踐論」的提出，不僅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精神的，同時還更能表達出馬克思主義的精神。那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嶄新的表現形式。

從馬克思主義創建以來，由於無產階級革命在一步一步地前進，在一步一步地按着馬、恩所指示的正確原則以及他們所提出的鬥爭的根本方針，而逐漸更由理論進到實踐的階段，而這被看作「無產階級的頭腦」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就相應益益顯示出它的實踐的性格。在列、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種實踐的性格，已經是表現得更加明顯了，但到了中國人民革命領袖毛澤東手中，它却又更進了一步。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一發展，下面將要聯繫到中國歷史的現實的條件加以說明，這裡得着重指出的，就是在哲學上，一個極有概括性的正確命題的提起，往往比科學上的一種偉大的發現還要困難，因爲任何一種科學上的發現，雖然必須與其他有關的已有的發現，保持一些直接間接的關聯，但哲學上的一個正確的命題的提出，它本身就要表現爲一系列思想理論的綜合。

引論到這裡，我就可以進而講到有關「實踐論」的第二點認識了。

第二 「實踐論」極生動地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認識論與方法論的統一。

哲學上最基本的問題，是思惟與存在的問題。照一般常習的講法，思惟能否反映存在，是屬於認識論的範圍；思惟如何反映存在，是屬於方法論的範圍。但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上，或在辯證法的唯物論上，並不把認識論當作一個特別的科學來處理，那只被看作是唯物辯證法的一個組成要素。也就是說，思惟能否反映存在的問題的說明，被統一在思惟如何反映存在的問題的說明中

了。

依據「實踐論」，思惟或理論，是能够而且必須反映存在的，而它是否眞正地極正確地反映存在，是否能當作眞理，把存在或其發展規律眞實地反映出來，那就要就人們的社會實踐——物質生產過程中的實踐，階級過程中的實踐，科學實驗過程中的實踐，去證驗，去衡定；所以，「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眞理性的標準」。

依據「實踐論」，人們對於外界的認識，人們由反映外界所成立的思惟或理論，都是以某種形式，通過一定的實踐過程的結果。菓物皮裡有肉，肉裡有核的認識，是由解剖來看，加以證驗了的；地球不是平的而是圓的那種認識，是由航海及其他有關的科學實驗，加以肯定了的；原始共產社會以來的人類社會的歷史，通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的認識，是由我們在歷史上，特別在現實上的充滿了壓迫、剝削、反抗、翻身運動的經歷，明確證示出來了的。認識是基於實踐。理論是以實踐爲基礎。

但同是生息在這個地球上，爲什麼人們歷來就不把它看成是圓的，反而把它看成是平的呢？同是生活在現實社會中，爲什麼許多人要認定人類歷史不是鬥爭的，反而是協作的呢？那除了傳統的階級的成見的限制以外，還由於我們反映外界的認識，有的是屬於感性的；有的是屬於理性的。「感性的認識，是屬於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的聯繫的東西，論理的認識，則推進了一步，到達了事物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繫的東西」。一切論理的或理性的認識，儘管在人類是極關重要的，因而感性認識，是必須提高到理性認識的，直感成平面的地球，是必須依照它的原樣理解成圓形的，淺見爲和平協作的社會，是必須依照它的本質，理解爲鬥爭的；但不經由直接的感覺經驗，不經由反覆不斷的接觸，不通過豐富的感覺材料，就我們這裡的例子來說，我們不會參加到證明地球是圓形的航海一類實踐過程，或不會經常站在證明社會是鬥爭的反抗運動中，那種被提高到論理的理性的認識，即使在那些確實是由直接經驗體會到的人們看來是健全的，是全面的，在我們未經歷者，傍觀者，仍不免是有些隔膜的，生疏的，理解得不能透澈逼眞的。

在我們人類的知識發達史上，對於外界的認識，一般差不多都是由低級的感性階段，逐漸由不斷實踐，不斷檢驗，不斷累積，達到一定數量，就引起質變，進到高級的理性或論理階段。但是，是不是認識一經進到了理性階段，就不再訴之於感性，不再訴之於實際經驗活動呢？就算一次達到了圓滿境界，不再前進呢？顯然不是的。「實踐論」是這樣處理這個問題的；論理的認識或理論，不僅是以實踐爲基礎，並還是爲了實踐；從實踐來，還是要回到實踐去，由實踐檢證了「沒有遺誤」，才被承認的。而且在事實上，那所謂「沒有遺誤」，還是就一定社會階段；依一定的社會的文化的技術的限制條件講的，也就是說，還只是相對的。物質生產範圍的擴展，階級鬥爭歷史的演變，科學實驗的進步，是會逐漸使我們的認識，由不完全進到比較完全，由相對愈益接近於絕對的。人類的生產過程和生活過程，在不絕推陳出新地辯證地發展着，我們的認識過程，也相應表現爲那種種社會實踐過程的一序列的指標。物質的生產與生活條件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就要顯出新的要求的規律，也同樣表現在思想上認識上，而思想上認識上的新轉變要求，又正好是作爲物質生產生活條件變革要求而提出的。所以，認識只是體現着自然社會乃至思想發展規律的唯物辯證法的一個組成要素。所以，講認識與實踐的關係，與其從認識方面來看，就寧不如從實踐方面來看，還更加生動一些，有力一些，基本一些。

然則，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上，爲什麼直到我們的毛主席，才把「實踐論」當作一個新命題來提出呢？

第三 「實踐論」極鮮明地標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現世界革命運動，特別是在中國革命運動要求下的新發展。

作爲無產階級革命行動指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即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在向着加深擴大其支配勢力的那一個歷史時期，基本上還只是着重在如何啓蒙無產階級，教導他們認識他們自己的地位，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力量；教導他們由一個「自在的階級」，變爲「自爲的階級」。當然，就是那種方式的革命啓蒙工作，也是要通過各種的爭運動——經濟的、政治的、思想的鬥爭運動進行的，即在要在革命實踐過程中進行的。但一般來講，當時的革命鬥爭方針，與其說是在即時行動起來，顚覆資產階級的統治，就毋寧說是在通過各種鬥爭方式，把無產階級喚醒起來，組織起來，使他們作着顚覆資產階級統治的準備。所以，在這一個歷史階段，無論是在經濟鬥爭當中，抑是在政治鬥爭當中，隨在都要對各種各色的有利於資產階級統治的思想——非階級的觀點、自然主義的說教、狹義的愛國主義理論、所謂和平社會主義、特別是這條條道路通達的唯心主義哲學——作着堅決的鬥爭。俄國就到了一九〇

五年的革命以後，列寧還須分出他的極寶貴時間，來清算當時極有影響的所謂經驗批判論及經驗一元論。直到十月革命成功了，社會主義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就不僅在蘇聯，在全世界各國勞動人民面前，已經千眞萬確地被證示爲無產階級革命行動的指南了。

可是，就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預見，首先在蘇聯革命實踐中被證示爲無比正確的同一瞬間，一方面，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爲了穩定其統治，爲了堵治其思想堤防的潰決，儘管像防避「瘟疫」一樣地多方阻制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在另一方面，由於到了帝國主義後半階段，各資本主義國家乃至一切落後地區的勞動人民，已經不能照着原來的樣子生存下去了，統治者階級也已經不能照着原來的樣子統治下去了，在這種情形下，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瘟疫」，就有了它必然要普遍發生的成熟條件了。我們不能廻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搏鬥的局面的產生，也就無法避免作爲無產階級的頭腦，作爲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武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

正因爲資本主義是當作一個「世界現象」而存在的，作爲反資本主義的理論武器的馬克思主義，也不能不是一個「世界現象」。問題只是在於世界各個國家，各個地域，在以怎樣的歷史條件思想條件來吸收，來應用，來發展馬克思主義罷了。由於列寧與斯大林，蘇聯已在它的歷史的思想的條件下，爲我們提供了應用並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好榜樣了。

現在我們談到中國。

中國有幾點與過去帝俄不同的情形，其一是我們有極悠久的極圓熟的封建文化；其二是我們的資本主義沒有很好發展起來；其三是我們的勞動人民在國內國外受著極殘酷的多重的壓迫，因而也就極容易接受各方面的新的感召。由於第一種情況，封建的思想系統，特別是知與行脫節的思想方法，早已被當作一個有力的傳統，在作用着；幾世紀以前其所以發生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在現代，其所以有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儘管在客觀上，它們根本不會跳出舊的樊籠，但至少在主觀上，都是當作那種思想方法的抗議或「反動」而提出的。愈至晚近，封建思想體系，顯然在跟着封建制本身，逐漸趨於瓦解，逐漸喪失其絕對的支配作用，但由於思想一般往往是落在社會現實發展後面的，我們的社會現實既不能順利向前發展，那種思想方法，就不但不易失去影響，反因以次的事實加重了。那就是就第二種情況說，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同時是一個半殖民地化殖民地化的過程，這就註定了它連件商品，從資本主義世界「買辦」進來的現代資本主義意識，對於它是外來的生疏的，無法在自己國內找到實際憑證的東西。在資本主義社會，爲了生產，爲了經營，爲了維繫其生產經營秩序所採行的科學的職業的公民的教育，對於我們的半封建社會，根本就不能「致用」，結局，學與用脫節，理論與實際脫節，就在舊的傳統影響下，還附添了新的內容。不但如此，就第三種情況，即就中國勞動人民遭受多重壓迫，從而也比較容易接受多方的新的感召的情況說，在蘇聯十月革命實現後，作爲蘇聯革命實踐指南的馬列主義，很快就在中國起了相當廣泛的反應。在開始，那差不多是當作教條來接受的，以爲在馬列主義的武庫中，藏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革命方式的現成鬥爭的路線和綱領。等到大家發現搬教條，談公式，並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時候，只顧幹，只顧行動的經驗主義又當作一個傾向，表現出來了。經驗主義其實是作爲教條主義的「反動」而引起的。教條主義也就是理論脫離實際的又一新的形態。

所以，總括講來，不拘是因爲那種原由，我們歷來就不是把理論，把認識和實踐統一來看的。歷來就沒有注意到理論是由實踐來的，並且是爲了實踐的。就當前革命運動方面來講，馬克思主義的創建者馬、恩雖爲他們後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提出了一般的基本的原則，但無產階級在各別歷史時期，各別國家的具體情況下的鬥爭任務和行動綱領，却是要我們把那種原則帶到實踐中去加以檢證，加以運用，才能發現那些方面要補充，那些方面要引申，那些方面要創制的。列寧、斯大林是這樣着重實踐，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的人民領袖毛澤東，亦是這樣，依據馬列主義，在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下，在長期革命鬥爭的體驗中，創立了他的新民主主義，而使馬克思主義更進一步和在更大的面上發展的。他把「實踐論」作爲他的整個思想的出發點和基礎，那並不僅只特徵着我們中國的革命思想的必然性格，並還標誌了我們這一個歷史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必然傾向。

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本質上，並不是作爲少數知識分子的「精神消遣品」，它是爲了「榮養」勤勞大衆的；它的目的，也並不只是爲了說明世界，解釋世界，而更重要是創造世界的。所以，在人民大翻身起來，旋乾轉坤的改造世界的當兒，充分體現着時代精神的「實踐論」的出現，那將是大有助於這個人民世紀的革命事業的。

（一九五一年二月八日於廈門大學）

「實踐論」——馬列主義底發展與中國哲學傳統問題底解決

（清華大學哲學系集體討論，並在中國新哲學研究會座談會上報告）

馮友蘭

一九五〇年裡有很多大事，其中的一個就是毛主席重新發表了他在一九三七年所寫的哲學著作，「實踐論」。

一九五〇年裡發生了美帝侵略朝鮮的戰爭。這是一個關係世界全局的戰爭。這個戰爭中，中國與美帝在各方面的對比，使我們更深切地體會馬列主義底一個眞理：「了解必然就是自由」。在這個戰爭中，我們中國這一方面是一切從容不迫而措置裕如。在美帝那一方面就只有一片慌張與混亂了。其所以如此，「顯而易見，是因爲我們的領導者，毛主席與中國共產黨，認識而且掌握了歷史發展底必然規律，照著這些規律去應付美國帝國主義，對於事情的發展，有科學的預見，所以一切的行動都是主動的，因此也就是自由的。美國底統治階級不認識或不敢正視這些規律，對於事情的發展是盲目的，是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所以一切行動都是被動的，因此也就是不自由的。

我們怎樣能夠認識自然及社會中的事物發展底必然規律，而能夠把握着他們，以指導我們底行動呢？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就告訴我們一個方法，一個唯一正確的方法。毛主席底「實踐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底結晶。它『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

作爲哲學工作者，我們對於「實踐論」，除了上面所說的一般的認識之外，更有業務上的認識。在人底生活實踐中，有對於自然的鬥爭，有在社會中的鬥爭，因此人也就有了對於自然的認識，及對於社會的認識。這兩方面的認識發展爲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以及總結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哲學。在哲學總結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底時候，它又發現一個問題，就是：人於有對於自然及社會的認識底時候，他是怎樣認識的。這一個問題包涵了許多問題，例如認識底方法，認識底性質等。這就是說，人除了有對於自然的認識及對於社會的認識之外，還需要有對於認識的認識。人先有了對於自然的鬥爭，然後才有對於自然的認識，先有了在社會中的鬥爭，然後才有對於社會的認識。認識本身也有這種情形。人是先有了認識自然及認識社會的這些認識，然後才有對於認識的認識。人對於自然有認識以後，就可以更好地對於自然作鬥爭。人對於社會有認識以後，就可以更好地在社會中作鬥爭。同樣，人對於認識有認識以後，就可以更好地認識，所以對於認識的認識，發展爲認識底理論與方法。中國底哲學傳統，以爲哲學是研究『天人之際』的，天指自然，人指社會，中國哲學中所常討論的知行問題，就是認識論這一方面的問題。

歷史中的哲學，雖然對於這三方面，都有相當的認識，在一定的範圍內，也有相當的貢獻，但是它是爲其階級性所決定、所限制的，因此對於自然，對於社會，以致對於認識，都只能有片面的、歪曲的認識。無產階級底哲學，關於上面所說的三部分的問題，却有全面的認識，與正確的解決。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對於關於自然方面的問題，作了正確的解決。歷史唯物論對於關於社會方面的問題，作了正確的解決。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對於關於認識方面的問題，作了正確的解決。

關於這三方面的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已建立了完密的體系，斯大林又聯系了當前的實際，對於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及歷史唯物論作了深刻的分析與全面的扼要的叙述，成爲馬列主義文獻中的經典著作。但是關於認識方面，斯大林還沒有詳細的討論，還需要一個著作，對於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作深刻的分析與全面的叙述。毛主席底「實踐論」，就担任了這個歷史的使命。

這兩位偉大的領袖底這兩個著作所以能担負起來這樣的歷史的使命，是因爲這兩個著作是他們領導世界上兩個大革命的經驗底結晶。誠如「學習」雜誌所說的，實踐論『是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革命的長期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它所包涵的理論，就是綜合了十分豐富的革命經驗材料加以整理改造的結果，同時，這些理論又是經過若干年來的革命實踐的檢驗而得到了證明的馬克思主義科學眞理』。斯大林底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對於蘇聯革命的關係，也正是如此。所以他底這個著作，是聯共黨史底不可分的一部分。毛主席的「實踐論」，也將是中共黨史的不可分的一部分。

蘇聯「眞理報」社論說：『毛澤東這一著作的特點，是對複雜哲學問題的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與敘述的形象性和鮮明性結合在一起』。這誠然是「實踐論」的特點，也是斯大林底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底特點。其所以能有這些特點，我們決不能說是僅只由於他們底見解的深刻及其文章技術的高明。其所以能有這些特點，主要的是由於他們所說的，不是用邏輯演繹法從馬、恩、列底著作中，推演引申出來的，而是以馬、恩、列底思想爲指南，在革命實踐中所體會出來的。他們所說的，是他們以馬、恩、列的思想爲指南而得到的經驗總結，不是以馬、恩、列底思想爲教條而引申出來的教條。

「眞理報」底社論又說：『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簡潔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論的認識論——反映論。在他的著作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基本原理，關於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關於革命理論在實際革命鬥爭中的意義的基本原理』，又說：『毛澤東深刻地說明了和發展了著名的恩格斯和列寧關於絕對眞理和相對眞理的原理』。是怎樣發展了呢？我們這篇文章底目的，不在於指出，在「實踐論」中，那些點是馬、恩、列、斯所尚未說到的，我們現在只指出「實踐論」底主要貢獻，是以中國整個的革命實踐，充實了豐富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

我們知道：斯大林於一九三八年發表他底「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那正是蘇聯革命已成功底時候。毛主席於一九五〇年重新發表「實踐論」，這也正是中國革命已經基本上成功底時候。這兩位偉大的領袖都在革命經驗可以作整個的總結底時候，以他們底兩個著作，作爲兩次大革命底實踐底總結，惟其這樣，才能使馬列主義有了更具體的，更豐富的內容，這也就是說，他們大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

作爲中國的哲學工作者，我們對於毛主席的「實踐論」，又有一種業務上的了解，這就是「實踐論」對於馬列主義的另一個發展。這就是：「實踐論」以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底基本原理，科學地解決了中國哲學中的一個重要的傳統問題，就是上面所說的知行問題，也就是「實踐論」底題目中所提出的『知和行的關係』底問題。它怎樣解決了這個問題呢？它以「實踐論」在結尾中所說的『辯證唯物的知行統一觀』解決了這個問題。

西洋資產階級哲學在認識論方面，有許多片面的、歪曲的理論，爲向這些理論作鬥爭，列寧提出了反映論。可是西洋資產階級哲學底那些理論，在中國，除了哲學工作者之外，是很少人知道的，在社會上是沒有影響的。但是知行問題，却是中國哲學中的一個傳說問題，一個對於許多人都有影響的問題。毛主席『有的放矢』，以馬列主義結合中國底實際，解決了這個中國哲學史上的傳統問題，也在這一方面發展了馬列主義，在中國的思想鬥爭底戰線上，得了一個偉大的勝利。

在有階級的社會中，不同階級的人，對於事物有不同的了解與看法。因此，就有統治階級底哲學與被統治階級底哲學。在世界觀與歷史哲學方面，有唯心論與唯物論。在認識論方面，也有唯心論與唯物論。在認識論這一方面，肯定認識爲第一性的是唯心論，肯定實踐爲第一性的是唯物論。前者是統治階級底哲學底認識論，後者是被統治階級底哲學底認識論。

認識論方面的唯物論，正如世界觀與歷史哲學方面的唯物論，也有機械的與辯證的之分。以爲實踐既然是第一性的，認識既然是依賴於實踐的，因此認識就只是實踐底工具，不能反過來影響實踐，這就是機械的唯物論。以爲實踐雖然是第一性的，認識雖然依賴於實踐，但是認識也反過來影響實踐，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

「實踐論」所給予我們的，正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它表現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底四個特徵：第一，『强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第二，認識『又轉過來爲實踐服務』。第三，『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眞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第四，實踐與認識，互相推進，『實踐與認識之每一循環，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

在中國哲學史裡，對於知行關係，作有系統的、自覺的討論，是自宋朝底道學家們開始的。中國古代的哲學家們，雖然沒有有系統地、自覺地、討論知行問題，但是他們對於人有知有行這個事實，也都有他們自己的看法。我們若以

上面所說的四個特徵作爲標準，去分析他們在這方面的看法，我們很容易看出，在這一方面，正如他們在別的方面一樣，是屬於那一個陣營的。

孔子底思想，是講中國哲學史的人所首先要分析批判的。有些人以爲孔子是注重行的。例如他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這可見他是以行爲主，而以學爲輔。但是我們若以上面所說的四個特徵爲標準，對於孔子底思想，作一分析，我們很容易看出來，他在認識論方面的思想，正如他在別方面的思想，是唯心論的。

就上面所引的孔子底話看，他以爲「學」與「行」是對立的，論語講到「學」的地方非常多。它底第一句就是『學而時習之』。他所「學」的是甚麼呢？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說：『余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從這些話裡，以及從他一生底歷史裡，我們看出來，他所學的，是古來的詩書禮樂，以及典章制度。他注重『聞知』，引申類推，所以他喜歡顏回『聞一知十』，這就是說，他比較不注重認識底最重要的來源，即實踐方面的來源。

從『古』得來的知識，孔子認爲就是眞理，在他，沒有再加考核底問題，更沒有必需從社會的實踐中加以考核底問題。旣沒有考核底問題，也不會有認識與實踐互相推進底可能。

就上面所說的四個特徵裡，只有認識爲實踐服務這一點，在道德活動底範圍內，在孔子底思想中是有的，說孔子注重「行」，大概就這方面說的。

我們再看孔子底主要反對者，墨子底思想。墨子說：『言有三表』。第一表是『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第二表是『原察百姓耳目之實。』第三表是『發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這以『本』，『原』，『用』，爲主的三表，與上面所說的四個特徵就很相近了。照他底第一第二表，他肯定認識底來源是聞知與親知。他很重視經驗爲認識底來源。至於第三表，就是以社會的實踐，爲對於認識的考驗底標準。認識旣需在實踐中考驗，則認識與實踐就有互相推進底可能。至於認識爲實踐服務，更是墨家底一貫的精神。

從孔子與墨子，在認識論方面的思想看起來，中國哲學在創始底時候，就已分爲唯心論與唯物論。這是當然的，因爲在那時候，本來已有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底存在。

中國哲學中的，在認識論方面的唯心論，在道家哲學中，更趨於極端。道家哲學，以爲感性知識與理性知識，都不能得到眞理，只有超於感性及理性的「眞知」，才能得到眞理。這樣的眞理，自然是與實踐脫離關係的。

中國哲學中的在認識論方面的唯物論，在法家哲學中，也得到相當的發揮。韓非子說：『無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先秦底法家是當時新興勢力地主階級底思想底代表。因其是新興勢力，所以它底思想，也有唯物論底傾向。

這個唯物論底傳說，在漢朝底唯物論者王充底哲學家裡得到繼續的發揮。王充說：『事莫明於有効，論莫定於有證。』這兩句話底第一句，說明了墨子底第三表，第二句說明了墨子底第二表。可是他比墨子又進了一步。墨子『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只注重感性的知識。王充則說：『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効驗彰明，猶爲失實。』這就是說，於感性的知識之外，還需要理性的知識。

到宋朝底道學，對於知行問題，作更有系統的討論。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大略分起來，共有四種。第一種是關於知行先後的，在這一方面的討論可能有三個說法，一是知先行後，二是行先知後，三是知行互爲先後。第二種是關於知行難易的，在這一方面的討論，亦可能有三種說法，一是知易行難，二是知難行易，三是知行俱不易。第三種是關於知行分合的，在這一方面的討論也可能有三種說法：一是知行合一，二是知行分立，三是知行相資。第四種是關於知行重輕的，在這一方面也可能有三種說法：一是知重行輕，二是行重知輕，三是知行並重。就我們所能想到的關於知行的討論，也就是這四種，而就邏輯方面說，在每一方面的討論中，也就是有三種主張。在事實上以上十二種說法都曾經有人主張過。可見這個問題，在中國哲學史裡，是個很重要的問題。

宋朝底道學家繼續發揮古代儒家在認識論方面的傳統思想，在這時候，「大學」「中庸」成爲主要的經典。「大學」底八條目，首先下手，在致知格物。（關於格物有許多不同的解釋，不過事實上以前人所作的「格物」底工夫，都是「知」一方面的事。）「中庸」主張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然後繼以篤行。程伊川更明顯地說：『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張南軒說：『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又說：『知有精粗，行有遠近，然知常在先』。

關於知行難易底問題，伊川說：『力行須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又說：『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

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

關於知行輕重底問題，他說：『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而不能行，是知之未至也。』這是以知爲重，以行爲輕。有知必有行，無知必無行。

朱子繼承伊川之說，不過作了很重要的修正。他說：『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又說：『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爲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又說：『夫泛論知行之理，若就一事而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然合乎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哉？』他底意思是：先就一知以成一行，有此行則知之深，知之深則可進至行之大。他底意思有兩層。就第一層說：知在行先，就第二層說，知行互爲先後。

朱子可說是把伊川底理論提高了一步，但他們都以爲知行是分立的。朱子說：「知與行工夫須著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愈明；二者不可偏廢。如人兩足相先後行，便漸漸行得到。若一邊輕了，便一步也進不得。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他以爲知行雖然不可偏廢，但似乎是可以截然分開的。

王陽明底知行合一底主張，正是與此相反的。他以爲『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眞切篤實是行。』王陽明底所謂知，主要地是良知，是在道德方面，對於是非分別的感覺。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在知行的這個意義下，他主張知行合一是可以言之成理的。但是把這個主張應用到一般的知行上，就把知行等同起來，以爲知就是行底開始，行就是知底延長。這樣就忽略了知行所特有的性質。王船山就是這樣批評知行合一底主張。他說：『知行相資以爲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効，故相資以爲用，則於其相互，益必知其分矣。同者不相爲用，資於異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這就是船山底知行相資底理論。

在中國哲學史裡，船山底關於知行關係底學說是比較最正確的了。他說：『知之非艱，行之維艱，艱者先，先難也；非艱者後，後獲也。』他又說：『且夫知者固以行爲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爲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効也。知焉未可得行之効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學，未嘗離行以爲知也。』就這些話裡，我們可以看出來，就知行底先後說，他是肯定行先知後的。就知行底難易說，他是肯定行難知易的。就知行底分合說，他是肯定知行相資的，就知行底輕重說，他是肯定行重知輕的。

顏習齋有與船山類似的主張，他對於大學『格物』有一個新的解釋。他說：『此格字乃手格猛獸之格，格物謂犯手實做其事，即孔門六藝之學是也。且如講究禮樂，雖十分透澈，若不身爲周旋，手爲吹擊，終是不知。故曰致知在格物。』又說：『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見理不明，只敎人再窮理。孔子則只敎人習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下矣。』

在這兩段話裡，有許多意思可以發揮。他以『格物』的格字爲『手格猛獸』之格，很能看出實踐底改造與鬥爭底意義。不論對甚麼東西，儘管討論『十分透徹。』若不見之於實踐，『終是不知。』必需『見之於事，』方是『徹上徹下。』這可見他是主張行先知後的，也是主張行重知輕的，也是主張知行相資的。

以上略說宋朝以後的哲學家們對於知行問題的各種主張。在這各種主張中，自程伊川至王陽明，都是繼承儒家底唯心論的傳統。王船山與顏習齋，雖然自命爲儒家，但至少在認識論方面，他們底思想，是古代的唯物論的傳統底復興。

在對於這各種主張作批判之先，有兩點須先說明。

有人可以這樣說，在中國以前的哲學家對於知行的討論中，知行二字底意義是很紛歧的。這個哲學家所謂知，未必是那個哲學家所謂知。那個哲學家所謂行，也未必就是這個哲學家所謂行。例如朱子是主張知行分離的。王陽明反對他，而主張知行合一。王船山又反對王陽明，而主張知行相資。我們若把這三位所謂知行分析起來，可以看出，他們所謂知行底意義，未必完全相同。因此他們底辯論未必能完全針鋒相對。對於他們所謂知行不加分析，而籠統地相提並論，是錯誤的。

這樣說也許合乎事實。可是，我們要注意的，還有一件事實，就是：雖然他們對於知行的討論，往往不能針鋒相對，可是他們都自以爲是針鋒相對。王陽明眞以爲他是批評了朱子，而且把他批評倒了。王船山眞以爲他是批評了王陽明，而且把他批評倒了。這也是事實。這個事實也有它底意義。它底意義就是：儘管他們所討論的知行，未必是同樣的知行。儘管他們所謂知行，未必有同樣的意義，但是他們所討論的，在本質上是一個問題，就是實踐與認識的關係底問題。他們所謂知行有不同的意義，正是表示他們對於實踐與認識的認識底片面性。他們底認識雖有片面性，但是從這個片面性中，可以反映出來，他們對

於實踐與認識的不同的認識。這不同的認識，正是由於他們底階級立場與觀點所決定的。這一個事實正是我們現在所要說明的。

有人還可以這樣說：中國以前哲學家所謂知行，大部份是就道德方面的知行說的。他們所謂知，主要的是『明心見性』。他們所謂行，主要的是『涵養省察』。再明顯一點說，他們所謂知，主要的是『讀書明理』，他們所謂行，主要的是『臣忠子孝』。所以他們所謂知行，並非一般的知行，所以他們關於知行的討論，也不可認爲是關於一般知行的討論。

這樣說也是有根據的。不過我們可以指出：中國以前哲學家們所有的關於知行的討論，雖然大部份是關於道德方面的知行，但是他們的意思，都是認爲這些討論對於一般的知行也是可以應用的。他們於討論知行的時候，常舉一般知行中的例子。我們以上所引的幾段可以說明這一點。「實踐論」說：『人的社會實踐，不限於生產活動的一個形式』。中國以前的哲學家所討論的道德活動，也是人底社會實踐底一個活動形式。他們對於這個活動作分析，而見其中的知行關係。又以此種知行關係推及於一般的知行關係。他們這樣作，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實。這也是我們現在所要說明的。

他們所以這樣作，是爲他們底立場所決定的。中國以前的哲學家們，大都屬於封建社會中的地主士大夫階級，除極少數外，他們都是脫離生產，輕視勞動，輕視羣衆，以爲只有自己的知識，是寶貴的。他們底這種生活，反映在他們底思想裡，就結晶爲認識論的唯心論。他們不生活於生產程序中，而只生活於生產關係中。因此，他們不能知道生產活動是人底社會實踐中的最基本的活動形式。因此，他們只能在一種上層建築之內，看知行關係。他們所以從道德活動出發，分析知行關係，其原因就在於此。這就決定了他們對於知行關係，不可能有完全正確的看法。

墨子是古代的『賤人』。顏習齋是參加勞動的。王船山在明末反抗滿清，有社會鬥爭底經驗，後來『伏處深山窮谷』，有與自然鬥爭底經驗。所以他們對於知行關係能有比較正確的看法。所以他們在中國哲學底認識論這一方面，建立了唯物論底傳統。不過他們底唯物論，還都是機械論的，還不能免於中國以前的哲學家們所有的缺點，如以下所說的。

在中國哲學家中，墨子是有羣衆觀點的，他『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其餘的哲學家們，大都只看見個人底知行，而看不見羣衆集體的知行。因此他們所謂知行，都是就個人說的，不是就社會說的。他們底關於知行的討論，只能應用於個人，而不能應用於社會。這是由於他們或則完全地沒有唯物論的觀點，或則沒有完全的唯物論的觀點。

中國以前絕大多數的哲學家們所生活於其中的生產關係，是與他們最有利的。他們底興趣，自然就在於維持那種關係，歌頌那種關係。因此他們底觀點，很容易是唯心論的，他們底思想方法，很容易是形而上學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使他們中的大部份，都以爲知就是知，行就是行。這就是，使他們孤立地看知行，把知行看作是分離的，對立的，本來就是處於對等地位的。這樣的思想方法使他們只從靜的觀點去看社會，看知行，使他們看不見社會是一個發展，知行是一個程序，看不見認識不但有由淺到深底發展，並且，隨着社會由低到高底發展，認識也有由低到高的發展。

中國以前的哲學家底思想，不但受他們底立場的限制，並且受中國底封建社會底歷史條件底限制。在中國底長期停滯的封建社會中，沒有一種社會科學，對於社會有整個的看法，對於社會發展有整個的了解。在中國底長期停滯的封建社會中，自然界中引起人底注意的，是四時寒暑底循環，歷史中引起人底注意的，是歷朝治亂底循環。在這種情形下，哲學家很容易以爲不變是絕對的，變是相對的，而變也只是一個循環。在這種情形下，他們的思想方法很容易是形而上學的。

以上所說的關於知行的討論，代表中國社會發展底一個階段，就是中國底封建社會。

封建社會中的哲學家底對於知行的見解，是爲他們底社會實踐所決定的。他們底這種見解，反過來又影響社會實踐。在舊日封建社會底傳統裡，大多數人都以爲人只要有書本上的知識就可以辦一切的事，能解決一切的問題。詩賦策論及八股文，成爲教育人才的科目，也成爲拔取人才的標準。顏復指出受這樣教育的『人才』底心理，說：『天下事來，吾以半部論語治之足矣。又何疑哉？又何疑哉？做秀才時無不能做之題，做宰相時自無不能做之事。』以前做八股出身的『人物』，確是這樣想的。

在封建社會裡『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成爲認識的南針。這本是中國長期停滯的封建社會在人底意識方面的反映。可是它反過來又加强了中國封建社會底長期停滯。

顏習齋是反對這樣的學術教育的。他底存學編，『大旨明道不在詩書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可是他所要『身實學』與『身實習』的，還是先秦底『禮

樂射御」，並沒有逃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底圈子。

在中國底封建社會將到結束底時候，孫中山又提出知行問題。他對於知行顯然已有比較新的看法。第一，他討論知行已不是從道德方面的知行出發，第二，他比較地能從社會發展底觀點論知行，因此他底關於知行底討論，已不止可應用於個人，而且可應用於社會。第三，他肯定從社會底進化看，人是先有行而後有知的。

孫中山是受資產階級教育的人，也是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生活過的人，他底思想已不受封建社會底限制，所以他對於社會，有比較整個的看法，對於社會發展，有多一點的了解，因此，他能對於知行，有較新的看法。他以社會底進化，證明行先知後，這就比王船山底說法明確得多了。船山以古語『知之匪艱，行之維艱』，證明行先知後，他底意思還不十分清楚。他的意思也許是：因爲行難；所以人『應該』以行爲先；也許是：在事實上行是先於知的。

孫中山在「孫文學說」中，所用以說明『知難行易』底例證，大都是科學與技術方面的事實。這與以前的哲學家只拘限於道德的知行底範圍內者，又不相同。這可見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人，與在封建社會中的人，比較起來，知識是豐富多了，眼界也寬廣多了。

不過孫中山底思想畢竟還是資產階級底思想。他認爲，雖然行先於知，可是知難於行，因此也就認爲知重於行。他寫「孫文學說」的動機，本是要以之促進當時的革命實踐的。可是在他底理論上，他過分推崇了知，過分推崇了有知的少數人，而對於有行的多數人則有相當的輕視，以爲他們是不知不覺者，對於少數的先知先覺者，他們只能盲目的服從。

孫中山雖然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但是他沒有生長在中國內地，對於中國底封建社會沒有很深的接觸。他底革命理論，大部分是資產階級底革命理論，在這些理論爲有相當數目的中國人所了解底時候，帝國主義已使中國不可能有一個資產階級，可以作爲這個理論底實現底推動力了。孫中山一方面對於中國底情形，沒有深切的了解，一方面沒有得到正確的革命理論，他過分推崇知，固然其由於他是領導資產階級革命的知識分子，但也許還由於他急於了解中國及找尋正確的革命理論而感覺困難底緣故。他始終沒有得到正確的革命理論，因此也就沒有適當地解決中國歷史上的革命問題，也就沒有適當地解決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問題。

孫中山過分推崇知，是反映作爲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底思想。嚴復是最先有系統地輸入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個人。他就說：『學問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竊之爲術，而大有功焉。』他所謂學問，即以後所謂純粹科學。他所謂事功，即以後所謂應用科學。他用了一個『竊』字，就表示，在他底思想中，這兩種科學底高下了。北京解放以前，在北京各大學底學術工作者中間，這種思想，有相當普遍的流行。

毛主席寫「實踐論」，又討論知行問題。孫中山與毛主席，這兩位偉大的革命家都討論這個問題，這並不是偶然的。這表示這個問題是中國哲學傳統中的重要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與革命底進展，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毛主席把握了馬列主義底理論，又以之與中國底革命實踐結合起來，成爲毛澤東思想。他解決了中國歷史上的革命問題，在革命實踐中，了解了理論與實踐底關係，因此也解決了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問題。

毛主席底「實踐論」與孫中山底「孫文學說」，在時間上雖只相隔二十年，但是這兩個著作，代表兩個時代，一個代表舊民主主義革命底時代，一個代表新民主主義革命底時代，一個是資產階級哲學底理論，一個是無產階級哲學底理論。

因此「實踐論」所討論底問題，雖是以前哲學中的傳統問題。但是於討論這個問題底時候，「實踐論」有完全新的立場、觀點、與方法。

與以前的哲學家相反，「實踐論」底立場，是無產階級底立場。「實踐論」所代表的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實踐論」指出，辯證唯物論底最顯著的特點之一，就是『它底階級性，公然申明它是爲無產階級服務的』。

與中國以前哲學家相反，「實踐論」的觀點是唯物論的觀點。因此與中國以前的哲學家相反，「實踐論」討論知行關係，從生產方面的活動出發。因爲，『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從生產活動出發，「實踐論」就表現了辯證唯物論底另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它的實踐性，强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爲實踐服務。』

由於唯物論的觀點，「實踐論」又表現了辯證唯物論底另一特點，就是它的社會性。「實踐論」從『人的社會性』，從『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它注重『社會的實踐』，『社會的人』。因此，它對於知行的討論，不僅可以應用於個人，而且可以應用於社會。

與以前哲學家相反，「實踐論」底方法是辯證法底方法，「實踐論」『堅

講認識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認識依賴於實踐，知依賴於行。知行不是等同的，但也不是分離的。知行是互相爲用的，但不完全是平等對立的。辯證法底方法，使「實踐論」能從動的觀點看認識與社會。「實踐論」指出認識由淺入深的具體程序。感性的認識是淺的認識，理性的認識是深的認識。又指出『社會實踐中的發生、發展、與消滅的過程是無窮的，人的認識的發生、發展與消滅的過程，也是無窮的。』『實踐與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

站在無產階級底立場，從唯物論底觀點，用辯證法底方法，「實踐論」得到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底結論。它說：『我們底結論是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知與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

這個統一是怎樣的一個統一呢？在這一點，我們又可以看出來，毛主席底「實踐論」與斯大林底「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相同的地方。關於自然方面的問題主要的是心物問題。關於社會方面的問題，主要的是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底問題，關於認識方面的問題，主要的是認識與實踐底問題。對於這些問題，處理稍有不當，就會發生唯心論或機械唯物論底偏差。斯大林底「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底特點，就在於把心與物底問題，上層與基礎底問題，處理恰得其當，對於心與物，及上層與基礎的看法，恰好各如其分。

「實踐論」也把認識與實踐的問題，處理恰得其當，對於認識與實踐的看法，也恰好是各如其分。

在認識方面，就本質上說，認識依賴於實踐，就根源上說，認識發生於實踐。正如在自然方面，就本質上說，心依賴於物，就根源上說，心發生於物。也正如在社會方面，就本質上說，上層依賴於基礎，就根源上說，上層發生於基礎。可是既有了認識以後，尤其是在認識上昇到理論底階段以後，認識與實踐交相爲用，互相影響，正如在自然方面，心物可以互相影響，在社會方面，上層與基礎可以互相影響，這是辯證唯物論對於自然、社會及認識的全面的看法。

「實踐論」正是這樣把握了對於認識的全面的看法，『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或右的錯誤思想』，正如斯大林底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把握了對於自然及社會的全面的看法，反對『左』或右的錯誤思想，於此，我們又可以看出來，毛主席底這個著作之所以必與斯大林底著作同爲馬列主義文獻中的經典著作。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所以能對於認識有全面的看法，乃是由於它底階級性，勞動人民生活於生產程序中，也生活於生產關係中。他們對於自然作鬥爭，也對於剝削階級作鬥爭。他們底實踐，就是鬥爭。在這兩方面的鬥爭中，他們須要認識來解決他們所接觸的實際問題。能解決問題的，就是正確的認識，不能解決問題的就是不正確的認識。認識解決了問題，就把實踐推進一步。實踐推進一步，也就把認識提高一步。無論在對於自然的鬥爭中，或在社會的鬥爭中，實踐對於他們有生死存亡底關係。例如農民種莊稼，與地主種花草，對於他們有顯著不同的意義。農民種莊稼失敗了，就有餓死底危險。地主種花草失敗了，至多不過感到一種惋惜。在舊的社會中的階級鬥爭中，農民與地主間的爭執，農民失敗了，就可能有家破人亡底危險。地主失敗了，不過花幾個錢了事。因此，勞動人民對於實踐與認識的關係的認識，是親切的。這種認識也是他們從實踐中得來的，因此必然肯定實踐底第一性。因此代表他們底思想的認識論，必然是唯物論。

在鬥爭底實踐中，認識與實踐不是分立的，而是打成一片的。其實也不是『打』成一片的，而是本來一件事底兩面。勞動人民就是這樣認識實踐與認識的關係。這樣的認識，是眞實的，而且是全面的。

尤其是無產階級出現以後，在他們用機器生產底活動中，一方面有勞動底實踐，一方面又需要科學的知識。科學的知識，可以運用機器，機器底運動，證實並改正科學底理論。

在社會中的鬥爭中，他們又是最革命的。在成爲自覺的階級以後，他們需要革命的理論，以指導革命的實踐，又提高革命的理論。這樣，認識或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就更突出顯露出來。無產階級底政黨，共產黨，總結這樣的經驗，又把總結提高爲一套完整的理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是無產階級底哲學，而無產階級底哲學，必然有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

再回看中國以前哲學中關於知行的討論。那些哲學家們，如我們於上面所說的，大部分不是生活於生產程序中，而只生活於生產關係中，因此他們沒有生死鬥爭底實踐，他們所謂知行，也都不是生死鬥爭中的知行。他們雖強調道德方面的知行底重要，但是他們所謂知行，都沒有『有之則生，無之則死』那樣的意義。他們對於知行，認爲或先或後，或難或易，或重或輕，或合或離，顚之倒之，沒有一致的意見。這都表示，他們對於認識與實踐的關係的認識，

是不眞實的。他們底討論，是離開實際的、學院式的討論。因此，在他們底那些討論中，不但結論不正確或不完全正確，就是問題底提法也是不正確的。因爲那些問題底提法，都是以形而上學的思想爲基礎，孤立底去看知行，以爲它們是分離的，是對立的，是本來都處於對等的地位的。對於不正確的問題，當然不會有正確的答案，至少是不會有完全正確的答案。我們只能指出其中那些是比較正確的。

「實踐論」「『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就這一方面說，『知行合一』也是可以主張的，不過不是『知是行之始』，而是『行是知之始』。「實踐論」又指出『理論又轉過來爲實踐服務』，『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就這一方面說，『知行相資』底主張，是比較正確的。

專就這個循環往復底程序說，我們不能說，在這個程序裡，知行誰先誰後。專就這一方面說，以前中國哲學中的知行互爲先後底主張，是比較正確的。但若推究認識底本質及其根源，則以前哲學中底行先知後底主張，是比較正確的。

就認識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說，實踐比認識爲基本，就這一方面說，以前哲學中的行重知輕底主張是比較正確的。可是在從實踐到認識，又從認識到實踐的循環往復底程序中，實踐與認識是同樣重要的。「實踐論」說：『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確地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有同樣的重要，從這一方面說，以前哲學中的知行並重底主張是比較正確的。

於我們所舉的中國傳統哲學對於知行問題的各種討論中，只有知行難易底問題，在「實踐論」中找不到與它有關的討論。這是因爲所謂難易是主觀的範疇。在道德的教訓中，可以應用這種範疇。因此，在中國古代的一個道德教訓中，有『知之匪艱，行之維艱』這一句話。上面已經說過，中國以前的哲學家討論知行問題，是從道德的活動出發的。因此也就接受了這一句話而對它加以討論。在中國哲學史中，凡是討論知行難易底問題，從程伊川到孫中山，都是從這句話出發的。

可是在我們對於事物作客觀的分析底時候，我們是不涉及主觀範疇的。例如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我們只須指出經濟發展底規律，不需要問那一種事難那一種事易。在客觀地分析事務底時候，我們不討論這一類的問題，因爲沒有這一類的問題。

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以前大多數的哲學家對於知行的討論，都只代表片面的看法，每一派的哲學家，只看見知行底全程序底一面。不過，如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中國哲學，在認識論方面，自古代以後，本來有一個唯物論的傳統。「實踐論」以完全新的立場、觀點、與方法，發展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解決了認識與實踐的關係問題。在中國哲學方面說，「實踐論」正是發揚了自古代以來的、認識論上的、唯物論的傳統，解決了中國哲學中的知行關係的問題。

「實踐論」這樣就把中國哲學提高了一步。它是以馬列主義的內容，表現於中國的民族形式，這種表現是馬列主義底發展，同時也是中國哲學底提高。爲甚麼要民族形式呢？一個與實際相聯系的哲學，一個『有的放矢』的哲學，是必然有民族形式的，中國哲學有幾千年的歷史，當然有其傳下來的問題，只要這些問題，在有些人底心中，還是問題，哲學工作者，就不能不以辯證唯物論底理論，與這些問題以解決。這樣的解決就是，馬列主義的內容，表現於中國民族形式的現代中國哲學。

毛主席底「實踐論」是將與斯大林底「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同是馬列主義文獻底經典著作，對於我們中國的哲學工作者，「實踐論」尤其有特殊的意義，因爲它爲我們底工作，不但指示了一個正確的途徑，而且樹立了一個偉大的模範。

更正

（一）上期本刊第八頁第二十六行『所謂「實踐是認識論的第一與基本的觀點」』應更正爲『所謂「生活、實踐底觀點，應該是認識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觀點。」』

（二）同期第十五頁上欄第七行「結觀」係「結論」之誤。

（三）同期第十七頁上欄第二行末句「直到反動階級全部消滅爲產階級，以止。」應爲「直到反動階級全部消滅爲止。」「第十三行「壓惡」應爲「厭惡」。第二十四行「但一年以來壓在地來經濟建設上的成就是很大的」中「壓在地來」四字係誤植，應刪去。同行「幾千年主封建制度下的幾萬萬農民」，應爲「幾千年來壓在地主封建制度下的幾萬萬農民」。

（四）同期第七十三頁哲學論文索引末一則「恩格斯對於辯証法唯物論的批判」，係誤植，應刪去。

「實踐論」——中國思想史（知行關係）的科學總結

侯外廬

毛主席光輝理論之一「實踐論」，應從馬列主義在東方的具體發展、應從中國革命實踐醇化爲科學的理論抽象、應從革命理論認識中對左右兩條戰線鬥爭而掌握的正確科學武器、應從綜合了列寧的認識反映論與認識媒介論、斯大林的認識裁變論，等等方面，去仔細研究的；同時就中國哲學史上「知和行的關係。」（「實踐論」小標題）在「實踐論」這一輝煌理論怎樣作了科學的總結，亦是研究「實踐論」的一個重要方面。

毛主席指示過我們，從孔子到孫中山必須依據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作出總結。總結有兩種步驟，一種是批判的歷史研究，使歷史上的思想家科學地予以他們應得的歷史地位，「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例如，列寧一九一二年的「在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中論孫中山思想，屬於這種。另一種是思惟過程的歷史發展，使歷史上由于階級偏見以及生產限制而不能得到結論的認識，依據近代的革命實踐，達到全面的歷史了解，並把那些認識變成了科學。這就是「實踐論」所說的：「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大家對於社會的歷史只能限於片面的了解，這一方面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會的歷史，另方面，則由於生產規模的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人們能够對於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的了解，把對於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這只是到了伴隨巨大生產力——大工業而出現近代無產階級的時候，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毛主席對於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關係」所作的總結，正是這一科學。

三千年來，中國哲學史在知行關係上，亦如西洋「哲學上的唯物論與經驗論都不懂得認識的歷史性或辯證性」，其間有些學者如王船山，敢於發抒進化論的思想，「六經責我開生面」批判了傳統認識，「雖然各有片面的眞理，但在認識論的全體上則都是錯誤的。」所以如此，就因爲除了歷史的限制外，還「不但常常受着科學條件與技術條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觀過程的發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

列寧在一九一三年寫的「馬克思學說底歷史命運」中，把馬克思主義分成了三個時代，從一九〇五年馬克思學說發展至東方爲第三時代，他說，「極大的風暴底新泉源已在亞洲湧現出來了，緊跟着俄國革命（指一九〇五年）的……中國革命。我們正處於這些風暴盛行及其反轉來影響歐洲的時代。」他又說：「自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後，全世界歷史三大時代的每一時代，都使它獲得了新的證實和新的勝利。但是行將到來的歷史時代，定會使馬克思主義這個無產階級學說獲得更大的勝利。

這一「行將到來的時代」，眞正地到來了，這一「定會使馬克思主義這一無產階級學說獲得更大的勝利」，隨着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在理論上亦得到新的證實，如毛主席所說：「馬列主義之所以稱爲眞理，也不但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爲爾後革命的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更進而眞正地使馬克思學說獲得勝利的發展。「實踐論」之成爲中國哲學史上知行關係問題的科學的總結，正合於「實踐論」所發揮的邏輯規律。

知行關係問題在中國哲學史上打不清的官司，就這樣地歷史地在馬克思學說發展的第三時代被「實踐論」所解答並解決了。這不但是中國三千年文化思想在今天的智慧總匯，而且更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眞理在中國的新證實、新發展。「實踐論」在最後亦透徹地指明了這一時代意義：「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按馬克思學說第三時代的發展階段），正確地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這種根據科學認識而定下來的改造世界的實踐過程，在世界、在中國均已到達了一個歷史的時節——自有歷史以來未曾有過的重大時節，這就是整個兒地推翻世界與中國的黑暗面，把它們轉變過來成爲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無產階級及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鬥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的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係。地球上已經有一部分實行了這種

改造，這就是蘇聯。他們還正在促進改造過程。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將要通過這樣的改造過程。」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一文裡已經指出：「十月革命並不是單單的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方面的革命，它同時又是頭腦的革命，是工人階級思想的革命。」毛主席的「實踐論」在今天的特徵，正是發揮了斯大林的學說，更上升爲理論的東西。知行關係的合理總結亦正是在知行關係的世界改造以及知行關係在頭腦的改造的時代。

我們說「實踐論」是中國知行關係認識的科學總結，更須進一步從具體歷史的意義方面去了解。

第一、中國知行關係問題上「歷史的辯證的發展」——毛主席說他自己「幼年沒有進過馬列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套……『學習』這兩個字就都有了，我可以用這兩個字來學習馬列主義。」（「論反對主觀主義」）按「學而時習」的學（知）習（行）正是中國哲學史的很早的理論，孔子的知行論就是「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底知行平行關係的錯誤理論（一方面說「君子有九思」，「生而知之者上也，」他方面說「吾道一以貫（訓行）之」），毛主席在有一處便批評到他：

「孔子提倡『再思』，韓愈也說『行成於思』，那是封建社會的事情。現在的事情，問題很複雜，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還不够。」（「反對黨八股」）

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關于中國古代與中古哲學史上的知行關係的傳統認識，毛主席的理論批判是時常有獨特的業蹟，因爲「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讚揚封建的毒素。」（「新民主主義論」）

「實踐論」是知行關係問題上歷史的辯證的發展，批判了舊的知行關係的偏向，給以歷史的一定的地位，並創造出新理論。這就是說「學會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思想方法，認眞的研究中國歷史，研究中國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對每一問題加以調查研究，然後創造出理論」（「論反對主觀主義」），在知和行的關係這一問題上正也不能例外的。毛主席曾一再警告我們，「割斷歷史，對於中國昨天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團」或「對於今天的中國與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與趣」（見「改造我們的學習」），就是頭重脚輕根底淺的了。

「實踐論」才以範例的馬列主義理論，解決了中國知行關係昨天與前天的問題。另一方面，科學的總結，如毛主席所一再以同樣的文法顯示我們，「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不批判了不揚棄了舊傳統的一系列的知行關係思想，也不會創造出新的理論，尤其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小資產性的、洋八股式的改頭換面，反會對於舊的「破」與新的「立」有害的。

中國哲學史如最早而在後世流行的素樸的知行論「知之匪艱，行之維艱」，或如資產階級的專家認識的「知難行易」，或如以「名」「實」關係出現的思惟與存在關係的爭論，或如以「德行、文學」（世說）以及「尊德行、道問學」（道學）出現的知行兩颬思想，或如以主觀唯心論爲內容的「知行合一」（王陽明）說，衆議紛紛，莫衷一說，都有其時代發展的局限與階級的偏見，即以「命日降，性日受」，「日成、日新、日革」爲出發點的進化論思想家王船山的「作器」「述器」知行關係論，亦僅批判了生知爲聖人的觀照論的錯誤而有餘，批判了知行內容皆服從於絕對道德的天理論的錯誤而有餘，但實踐內容的限制則侷促於形式的抽象理論（「有即事以窮理，無立理以限事」）。在中國哲學史有些表面上似乎有辯證性的知行觀念的，如道家相對思想或陽明心學，然而它們是與眞理神貌兩異的，他們證明的是所謂「身如菩提樹，心如明鏡台」的殭死概念，正如列寧所說：

「辯證法不止一次地會作爲走向詭辯術的橋樑。然而我們依舊是辯證法者，我們與詭辯家作鬥爭的手段，不是一般地否認任何轉變底可能性，而是在既定東西底環境中以及在其發展中對它加以具體的分析。」（「論尤尼烏斯」）因此，我們研究『實踐論』切忌在知行關係論方面混同於古人的形式概念，而應在每一似是而非的觀點方法上作明確的區別。

關於總結中國歷史的知行論，一方而依據「失敗爲成功之母」的道理而言，中國已有的各時代的古人總結，是具有優良傳統的偉大歷史性，另一方面，這一歷史性的效果發現，只有到了今天的時代始可以把理想變爲現實。我們珍貴並誇耀中華偉大民族的知慧；思想史的前行者，對於祖產業蹟的今天繼承者是血肉相連的，割斷了這一前日的歷史，是不會繼往開來的。中國思想史上有一特點，即在一定時代的發展關鍵處，那時代的學者都會在一定的限度內作了過去思想的總結，如戰國末的莊子「天下篇」與荀子「非十二子」等篇（知行關係上的用語，如「有見於此，無見於彼」，「蔽於此，而不知彼」，見就是認識）；如六朝的「世說新語」，明末的宋元明學案，淸末的「國故論衡」

，大小數十種代表作，這正是中國前日的歷史。但是結合了各時代的各樣失敗的總結，而成功為總結的總結，就祗有偉大的「實踐論」。辯證地了解，正如毛主席所說：「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因此，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作無批判的兼收並蓄。」

第二，「尊重歷史的辯證的發展」，前日與昨日是有分別的——毛主席一再指示要明白中國的前日與昨日，所謂「前日」應解釋為近代之前的中國，所謂「昨日」應解釋為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中國。上面我們在說明前日，現在我們還須說明昨日。

中國歷史走進了近代，知行關係亦有了新的因素，不僅在於「六經責我開生面」而已，還要追求世界的新發明，從「中學為體與西學為用」的知行中西二元論以至「全盤西化」的維新，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無疑地輸入以至在思想上維新過的，正如列寧在「左派幼稚病」中敘述俄國的歷史，我們幾乎可以亦這樣說：「中國的進步的思想界，處在空前野蠻反動的專制壓迫之下，迫切地注視歐美在這方面的每一種『新發明』。中國眞正用了半世紀以上的辛苦鬪歷……異常努力和專心致志來從事探討、研究，從事實際檢驗，熬受失望苦楚，參照歐洲經驗等等辛苦鬪歷，才掙得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

毛主席重視這個比較，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了中俄相同的或近似的情況。說：「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眞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世界以前向西方尋找眞理的一派人物。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我自己在青年時期，學的也是這些東西。這些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那所謂新學，包括那時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和中國封建主義的文化即所謂舊學是對立的。……新學派自己表示懷疑的很少，要維新，只有學外國。」

上面所云「社會學說」中就有哲學上的認識論，叔本華、尼采、康德、黑格爾、斯賓塞、休謨以至杜威、馬哈、柏格森、杜里舒，都按「新發明」被介紹來中國，孫中山的「知難行易」的孫文學說，就是一種本質上偏於科學實驗的經驗主義的翻板（雖然他批評「實行家」的低級經驗），陶知行之改為陶行知，便是杜威認識論的批判自覺，如毛主席所指出，「基本上那些中間還加雜了許多中國的封建餘毒在內」，但這種新思想「有同中國封建思想作鬥爭的革命作用。」它們打了幾個回合，就被思想上反動的同盟軍打敗，「所謂新學就掩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靈魂，而只賸下它的軀殼了。」（參看「新民主主義論」）這是在前八十年的中國的特點，到了後二十年的中國，「五四」以後，便屬於新範疇的中國了，這就在思想上屬於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與社會革命理論的支配的中國了。「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按即理論與實踐），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眞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都大大的向前發展了，根本上變換了中國的面目」。（同上）

由上看來，從舊學到新學再到馬列主義，有具體的辯證發展的歷史，前日與昨日到了今日，亦是中國理論與實踐從低級至高級的發展過程，思惟運動的合規律的邏輯過程。然而這並不能說有了十月革命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我們就一勞永逸，萬事大吉，主要還是依靠於中國革命的實踐過程中馬列主義的實證。

第三，「歷史的辯證的發展」之在今日的實證——毛主席曾把昨日與今日的中國，特別區別開來，尤其重視了今日的實踐。因為「偉大的人民革命決不會在其第一次出動中就徹底獲勝。它們是在來潮和退潮中發展和鞏固起來。」（斯大林「論中國革命底重大成績」）革命實踐與革命理論是合拍的，應該是有其過程的。正如列寧敘述俄國史，我們也同樣可以說：「在中國異常鞏固的理論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布爾什維主義，又有三十餘年的實踐閱歷，也是世界上除蘇聯外無與倫比的。任何一國，無論就革命經驗，或就革命運動的方式，都沒有過這樣多的閱歷，甚至近似這樣多的閱歷。任何一國都沒有在這樣一個時期內，把現社會一切階級底各種鬥爭形式、鬥爭方式和鬥爭色彩聚集得這樣豐富。中國民族革命與階級鬥爭，總是特別有效地領會歐美政治經濟方面的『新發明』。」因此，馬列主義的普遍眞理指導了中國革命的實踐，而中國革命的實踐復具體地證實了馬列主義的眞理，「實踐論」就是歷史的辯證的發展證件。

這是一般的了解。其次，如「實踐論」文前按語所言；「實踐論是為着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這些主觀主義的錯誤而寫的」。「實踐論」和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鬥爭，在階級敵對上而是對着由小資產階級的小生產觀點出現的保守思想（教條主義）與小資產階級小生產

觀點出現的孤立思想（經驗主義）。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在階級立場上主要是小資產階級。毛主席說明了這種思想的歷史的根源：「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三種東西，……在我們黨內，則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層的包圍中，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着一條小資產階級尾巴進黨來。」（「反對黨八股」）

然而這在中國革命史中更有特殊的運動途徑，從五四運動到現在的繼承發展，不是偶然的。毛主席透澈地分析過：

「五四運動……到後來就產生了洋八股、洋敎條，我們黨的一些人則發展這種洋八股、洋敎條成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的東西。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敎條。這種新八股，新敎條，在我們許多同志的頭腦中弄得根深蔕固，使我們今天進行改造工作還要費很大的氣力。這樣看來，『五四』時期生動活潑的前進革命的反封建的老八股、老敎條的運動，後來被一些人發展到了極端，發展到了它的反對方面，成了新八股、新敎條。不是生動活潑的東西，而是死硬的東西了；不是前進的東西，而是後退的東西了；不是革命的東西，而是阻礙革命的東西了。這就是說，洋八股，或黨八股，新八股，新敎條，是五四運動本來性質的反動。但五四運動也是有缺點的。許多那時的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評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敎條，主張科學與民主，是很對的，但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後來這個運動的發展。五四運動的發展路上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份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與民主的精神，並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面給了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及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份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這就是右翼，是形式主義向右翼的發展。但在共產黨內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份人走極端，馬克思主義沒有拿得穩，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這就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這就是形式主義向『左』翼的發展。這裡看來，黨八股這種東西，一方面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因素的反動，一方面也是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的繼承、繼續或發展，並不是偶然的東西。」（「反對黨八股」）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批判這樣的東西是中國革命之所必需，也是中國「革命改造路上的一個大工程」，因為不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惡習成為眞正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障礙。這就是「實踐論」端正思想認識的鬥爭意義，在中國思想史上盡了絕大的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的任務，尤其在「受着科學條件與技術條件的限制，而且受着客觀過程的發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之時，主觀主義的片面認識容易伺隙作勢，欺瞞着思想界的活動，「實踐論」適時的作了科學的「破立」鬥爭，「我們的結論是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知與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這在總結的意義上，它充分體現了哲學的黨性，更是天才的。

（上接42頁）引證一概實證論的潮流，特別依據奧斯特瓦爾得、馬赫、畢爾生、普恩凱萊、杜恒，依據科學不是『實在底絕對的模寫』的說法，並且從這一切中極其順利地導出了神，……從唯物論的觀點看來，馬赫主義與實用主義底差異，是像經驗批判論與經驗一元論底差異一樣地極瑣細和極不重要的。至少比較一下波格唐諾夫的與實用主義的關於眞理的定義吧：『對於實用主義者，眞理是經驗中的各種特定的作業價值（Working Values）底總稱』。（註十）

近代資產階級哲學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特點，就是他們都剽竊經驗字眼來代替意識、精神、心理、感覺等等，經驗批判論也好，經驗一元論也好，經驗符號論也好，以及實證主義，休謨主義，實用主義等等，它們裝着與唯物論有什麼姻親關係的樣子，其實它們與唯心論都存在着近親的血緣關係。它們在一大堆『經驗』的名詞下，用各樣各色的語句來說明自然、物質、物理的、外在的世界不是第一性的，客觀存在的，基始的，而意識、精神、感覺、心理等才是第一性的，客觀存在的，基始的。

杜威是生活在資本主義垂死階段的帝國主義時代裡，生活在大腹便便的老闆們的一羣中，他想挽救資本主義的命運，企圖在帝國主義份子遭受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敗北情況下，從意識形態方面去設想，以爲在這裡可以找到什麼「續命湯」，但杜威這種企圖是徒然的。

註：（一）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曹葆華中譯本二六頁。
（二）杜威：創造的智慧七——八頁譯文引自胡適文存卷二節一一一——一一二頁。
（三）杜威：確定性的尋求一七三頁譯文中引自張栗源敎育哲學六六頁。
（四）詹姆斯：實用主義。孟憲承中譯本一六五——一六六頁。
（五）杜威：哲學之改造，許崇清中譯本八四頁。
（六）杜威：民本主義與教育，鄒恩潤中譯本四〇八頁。
（七）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曹葆華中譯本一三五頁。
（八）詹姆斯：實用主義。孟憲承中譯本一一九頁。
（九）右書二〇二頁。
（十）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曹葆華中譯本三〇五頁。

凱恩斯主義批判

陶大鏞

近十多年來，凱恩斯的經濟思想，已經瀰漫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對於中國來說，這套主觀主義、神秘主義和野蠻主義的愚民邏輯，在反動統治時代，也曾風靡一時。二次大戰以後，特別是美帝發動侵朝戰爭以後，凱恩斯主義已經變成英美侵略集團擴大戰爭的重要武器了。這幾年來，蘇聯的經濟學家和英美各國的進步學者，都給凱恩斯主義作了頗有貢献的批判。爲了澄清凱恩斯主義所可能遺留下來的一點毒素，爲了鞏固我們的思想戰線，更爲了揭穿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反動性、欺騙性、殘暴性和愚蠢性，我們來進行對於凱恩斯主義的批判工作，實在是非常必要的。

由於時間和篇幅的限制，加上手頭的參考資料也不完備，在這篇文章裡，我僅能就凱恩斯學說的基本觀點，試作一個全面的批判，祇可算是引論而已。

一 凱恩斯主義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產物

凱恩斯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產物，說得更具體些，「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產物」（福斯特語）㊀，它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衰謝和垂死掙扎，它是被當作挽救資本主義的「萬應靈丹」而被提出來的！

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爲，凱恩斯（一八八三——一九四六年）所處的時代，剛好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下降時代。當他從青年進入壯年，大英帝國已從黃金時代進入了衰落時代。他看到「和平繁榮」的毁滅，他看到資本主義體系的破裂（十月革命），他看到一次厲害一次的經濟危機（特別是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九年的二次），他也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中存在着嚴重的缺陷（失業現象）和基本的不平衡。他雖發表了「自由放任的終結」（The End of Laissez Faire）（一九二六年），他雖指出了「當代最大的經濟禍患都是冒險、不安定和愚昧的結果」㊁，他雖反對失業和自由放任；但他並沒有摒棄私有財產，他從沒有放棄資產階級的榨取哲學，他却主張更「聰明地」來「管理」資本主義經濟，更「有效地」來彌補資本主義的缺陷、更「現實地」來醫治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所以，經過了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空前深刻化的世界經濟危機和一九三三——一九三六年的「特種蕭條」階段，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已表現得更露骨、更嚴重了，金融寡頭們更爲崩裂中的資本主義體系感到驚惶不安了，他們狼狽地攏絡了一批幫閒「智囊」，要「智囊」們開出一張藥方，把資本主義從死亡的邊緣上搶救過來。凱恩斯勛爵就這樣充當了壟斷資本集團的忠僕，他一連開了幾張藥方，藥性一帖比一帖來得强烈。在一九三〇年，他發表了「貨幣論」（A Treatise On Money），到一九三三年，又發表了一本小冊子——「繁榮的手段」（The Means To Prosperity），一九三六年，他的代表作「就業利息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以下簡稱「通論」）也跟着問世了。在這三本書裡，凱恩斯的立場和基本論點是一致的，他要向壟斷資本集團献出一套可能而有效的方案，來保衛搖搖欲墜的資本主義制度。在「貨幣論」裡，他對於維持投資和儲蓄間的比例關係與經濟危機問題，已經作了詳盡的說明㊂；在「繁榮的手段」裡，他進一步認定提高物價、擴大就業、增加社會支出（特別是增加政府支出）是走向繁榮的主要步驟。在「通論」一書上，他更把這些片斷的經濟理論予以發展和系統化，算是形成了一套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體系。他喪心病狂地向壟斷資本集團献計：祇要通過通貨膨脹政策、祇要壓低工人階級的實際工資，祇要實行集體浪費、擴充軍備甚至發動戰爭、祇要强化資產階級的專政（他說是「國家干涉」），就可以達到他所謂的「充分就業」，就可以不斷地提高壟斷利潤，也就是可以挽救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了！他在「通論」的「結語」裡，就曾這樣「坦白」地宣稱：「如果各國能够懂得運用國內政策來達到充分就業……那就不致有重要的經濟力量會使一個國家的利益和

它的鄰國相反對了。」[四]這就是說，在凱恩斯看來，祇要通過上述種種反動的國內政策，首先克服了個別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就可進一步挽救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了。由此可知，凱恩斯主義所反映的，是一個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代，它代表了反動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它之所以受到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普遍歡迎和讚揚，是有着它的社會根源的。

二．凱恩斯主義的階級本質

凱恩斯主義既是反動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我們就不難把握它的階級性了。儘管有些庸俗經濟學家，如克拉因（(L. R. Klein）之流宣稱凱恩斯已在資產階級的經濟思想方面起了革命[五]，甚至如亞爾斯（C. E. Ayres）之流還把凱恩斯比作經濟學領域裡的達爾文和哥白尼，但在階級立場上，凱恩斯同他的老師馬夏爾（A. Marshall）以及其他的庸俗經濟學家一樣，都是澈頭澈尾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即使是克拉因，也祇好俯首承認：在政府的經濟政策方面，凱恩斯並沒有「革命」[六]，「凱恩斯主義的改良政策並沒有侵犯到個人對於生產物的私有權」，「實際上，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是一個保守的政策，因爲它的目的是在維護自由企業的資本主義（Free-Enterprise Capitalism）」[七]！

當然，這並不是說，在凱恩斯和古典派經濟學家（我們這裡所指的古典派經濟學家是指的里嘉圖及其先驅者，並沒有像凱恩斯那樣把里嘉圖的後繼者如穆勒（J. S. Mill）、馬夏爾、庇古（A. C. Pigou）等庸俗經濟學家也包括在內）[八]之間，就毫無相異之處了。至少有兩點，是特別值得指出的：第一，亞丹・斯密和里嘉圖的經濟思想，是反映了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和希望，它是資本主義上昇時代的意識形態，還多少帶有進步的歷史傾向；而凱恩斯和其他的庸俗經濟學者一樣，他們的經濟思想祇是反映了壟斷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時代的金融寡頭的利益和妄想，它是資本主義下降時代的意識形態，完全是衰頹的、開倒車的。第二，古典派經濟學家至少還抱着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的觀點，至少還承認勞動價值學說，（亞丹・斯密說過：「勞動是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尺度」；里嘉圖也說過：「商品的交換價值，同它生產時所投下的勞動量成比例」。當然，亞丹・斯密和里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尚未充分予以發展，還沒有明白地揭示價值的實體。）他們在主觀上還有一種願望，想來發掘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客觀發展規律；可是，在凱恩斯及其夥伴看來，價值並不是決定於勞動時間，而是決定於生產成本[九]、決定於供給和需要的狀態、特別是決定於主觀的效用！凱恩斯根本否定了科學的勞動價值學說（和剩餘價值學說），他完全站到了主觀唯心論的一邊，爲了掩飾和滿足壟斷資本集團的血腥剝削，他乾脆就拒絕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客觀發展規律了！

所以，凱恩斯的經濟思想，非但不是「革命」的「科學」的，而是反革命、反科學的！在他的整套經濟理論體系裡，我們除了可以找出一連串標新立異的名辭（如消費傾向，儲蓄傾向、投資傾向、資本的邊際效率、非自願失業、供給函數和需要函數、流動性偏愛等）和眩人的抽象的數學公式以外，就無從發現凱恩斯主義同其他庸俗經濟學說之間存在着什麼質的不同了。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是比後者「進步」了，那祇是說：它比後者是表現得更「進」一「步」地反動了！我們可以說：它已集了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一切反動經濟思想的大成！

因爲，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裡，凱恩斯主義已「被各國的資產階級接受爲普遍眞理了」（引福斯特語）[十]。特別在今天，它已公然披着不同顏色的外衣出現在我們眼前了。大體上，可以歸併成下面三派：

第一派，是杜魯門、馬歇爾式的凱恩斯主義者，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華爾街集團和一批法西斯好戰份子，他們雖然沒有公開擁護凱恩斯的學說，但是他們所執行的獎勵浪費政策、通貨膨脹政策乃至擴張軍備政策，都是以凱恩斯主義爲理論根據的。在凱恩斯看來，古代埃及人和中世紀人都要比現代的人幸福，因爲埃及人會建築金字塔，中世紀人也會建築尖頂的大教堂。所以，他希望世界上的百萬富翁們生前要蓋大廈，死後還要葬在金字塔裡！[十一][十二]好像祇有這樣，才能增加有效需要（Effective Demand）、才能擴大生產投資，才能達到充分就業！這就是說，愈浪費、愈荒淫無恥，就會愈有利於充分就業！凱恩斯的這套消費哲學，就說明了爲什麼美國壟斷資本家寧願把小麥當柴燒、把牛奶傾到海裡去！

錢不够了，怎麼辦？凱恩斯另有妙計：可以膨脹通貨！他還替壟斷資本家們找出充分的理由：「一個政府，即使是德國政府（指第一次大戰後，馬克空前膨脹時代的德國政府——鏞），可以靠印鈔票長期生存下去。這就是說，通過這個手段，它就可以控制眞實的財源——這財源就像用租稅所得到的一樣眞實」[十三][十四]。同時，「當貨幣工資上漲時，將會發現實際工資正在下降；當貨

幣工資下降時，實際工資正在上漲。」⑬這又說明了戰後美國反動政府爲什麼這樣拚命膨脹通貨了。

當然，光是這樣，還覺得不够，要大大刺激消費，要開闢市場，何不積極備戰，發動一次世界戰爭呢？凱恩斯又來替戰神做律師了：「戰爭的經濟原因，就是人口的壓力和市場的競爭。」⑭因而，在凱恩斯的心目中，戰爭並不能算是一種罪惡，這反而應該歸罪於「人民的一種天然的好戰心理」了！⑮凱恩斯不是明明在替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世界主義說教了嗎？

第二派，是艾德禮、貝文式的凱恩斯主義者，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歐洲的右翼社會民主黨徒和其他各式各樣的改良主義者。事實告訴我們：今天英國的工黨政府，正在忠實地執行着凱恩斯的經濟綱領。凱恩斯在他的「通論」裡，再三强調要加强國家的干涉和擴大政府的機能，要由國家通過租稅制度、利息率政策以及其他手段來調整消費傾向⑯。他這樣說：「我相信，一個較爲周密的投資社會化，將會證明是獲致一個近似充分就業的唯一手段。……然而，社會化的必要措施，應逐漸地予以採用，不要使一般社會傳統發生破裂。」⑰因而，今天工黨政府所實行的「國有化政策」也好，社會安全制度也好，都祇是凱恩斯主義的具體運用而已。

此外，好些社會民主黨徒所鼓吹的企業自由和計劃經濟的調和論，也都屬於這一個類型。

第三派，是工會中的凱恩斯主義者，他們的代表人物，是各國工會組織中的敗類和機會主義者，他們也在工人隊伍裡散播凱恩斯主義的毒素，來麻醉工人階級，軟化勞動人民的鬥爭情緒。他們公然向工人撒謊，說凍結工資可以防止失業（增加就業）和避免經濟危機，這剛好就是凱恩斯所振振有辭的：「在一定的組織、設備和技術之下，實際工資和生產量（從而，和就業量）間有着一種獨特的關係，即是說，一般而論，就業的增加，祇能伴隨實際工資率的下降而發生。」⑱照這樣的愚民邏輯來推論：如果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話，他們就註定要失業的了！像英國的總工會（T. U. C.）和美國的產業職工聯合會（C. I. O.）和美國勞工聯盟（A. F. L.）等黃色工會領袖，就是搬弄這一套凱恩斯邏輯來出賣工人階級的利益的！

除了這三派，當然還可能出現一些變種，像華萊士、鐵托、白勞德之流，都可說是凱恩斯主義的信徒。⑲不管他們披着那一襲凱恩斯主義的獸皮，不管他們是自由主義者、改良主義者、機會主義者還是法西斯主義者，他們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却是完全一致的！他們都是壟斷資本集團的忠僕，他們又都是勞動人民的公敵！正因如此，我們才說：凱恩斯主義是一種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最反動的意識形態！事實上，凱恩斯勛爵本人，就是一個金融巨頭，他當過英格蘭銀行總裁和英國財政部顧問，還担任過布列頓森林會議和英美財政談判（英向美國借款三十七億五千萬美元）時的英國首席代表。凱恩斯的具體身份，也可以表明凱恩斯主義的階級本質了。一九二五年，當他拒絕參加英國工黨時，還曾公開表白過他自己的階級立場：「它（指工黨——編）是一個階級的黨派，而這個階級並不是我的階級。倘若我最後要去追求派系的利益時，我將會追求我自己的。……當階級戰爭到來時，我將會站到有教養的資產階級（educated bourgeoisie）的一邊。」⑳其實呢？他所站的一邊，却是最沒有教養、最殘忍無恥的反動資產階級的一邊。

三 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基礎

在說明凱恩斯主義的中心理論以前，我們先來談談它的觀點和方法。首先必須指出：凱恩斯經濟思想的哲學基礎，是完全建立在主觀唯心論上的。在凱恩斯看來，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並不是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而是由於「人類本性的心理特徵」（「通論」九一頁）。他的哲學觀與馬克思主義者剛剛相反，他不承認「存在決定意識」，他顛倒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客觀發展規律，他天花亂墜地說心理動機可以決定經濟發展的方向。他把柏克萊、休謨的主觀唯心論剽竊過來，再滲入一些先驗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教條。他的整套經濟理論體系是以「三個基本的心理因素」爲骨幹的，這三個心理因素就是：「消費的心理傾向，對於流動性的心理態度，和對於資本財產（Capita-Assets）的未來收益的心理期待」㉑。他最主要的就業理論，就是從心理分析出發的，他硬說就業量（從而所得量）決定於有效需要；有效需要又決定於消費傾向（Propensity to Consume）和投資量；而消費傾向又受着十四種心理動機的支配：有八種主要的動機會使每人抑制浪費自己的收入（所得），它們就是謹愼、遠見、精算、上進、獨立、企業、榮譽和貪婪；殘外有六種心理動機又會使人消費，這就是享受、短視、慷慨、失算、虛飾和奢侈。㉒在凱恩斯的唯心經濟學中，是並不包括勞動人民需要粮食、衣服、住屋的動機的！如果依照他的形而上學，似乎祇要適當地平衡和控制住這十四種心理動機，就可求

得資本主義的充分就業了！他倒要把每一個經濟學家訓練成實用主義派的心理學家了。

如果我們翻讀他的那本大著——「通論」，幾乎在每一章每一節裡，都充滿了唯心的概念，所謂「動機」、「傾向」、「期待」（Expectation）、「邊際」、「偏愛」（Preferencc）、「效用」、「信心」等，眞是琳琅滿目，不勝枚舉。

凱恩斯旣是一個主觀唯心論者，所以，他的思想方法必然是形而上的、反歷史邏輯的。敏德爾（J. Mindel）說得很對：「凱恩斯的方法論種根於他的哲學觀，它是主觀的、非歷史的。他所認定的經濟制度是一個孤立的、『封閉的』制度，可以行之於任何歷史階段和時代。」[23]

這就是說，凱恩斯對於經濟現象的分析，不是從實際出發，而是從抽象出發的。他雖自命是從「動」的觀點來看經濟問題，然而在事實上，他的經濟分析都是假定以生產技術條件不變爲前提的（即他所謂的「在一定的技術、資源和成本的狀態之下」[24]），所以，他並沒有從發展的觀點來看問題，他同其餘的庸俗經濟學家一樣，認定「經濟生活的一般法則永久是相同的；適用於過去的法則，也必適用於現在，」這樣一來，他就把資本主義看成「永恒的自然形態」（即看成永恒存在的東西），也就是把歷史發展的法則抽象化了。於是，他得出了荒唐透頂的結論：「我確信：……這是觀念（Ideas）、並不是旣得利益、對善或惡的問題才是危險的東西。」[25]爲了替旣得利益集團辯護，爲了替人吃人的資本主義制度說教，他已完全墮入主觀唯心論的泥淖了。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旣以主觀唯心論爲基礎，當然要矛盾百出、歪曲事實了。要詳密地批判凱恩斯的全部學說，可以寫成一本書，時間和篇幅都不允許我這樣做，在這裡，我祇能提綱挈領，把凱恩斯經濟學說中的幾個中心問題，略予批判如下：

（1）**就業理論**

凱恩斯主要的理論和實際上的成就，就是推翻了資產階級經濟思想中賽伊（J.B.Say）的所謂市場法則以及由此法則所派生出來的『均衡』學說」（福斯特語），這句話，眞是一針見血。因爲，凱恩斯並不認爲「供給可以創造出相適應的需要」，他覺得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並不能眞正發揮自動調節的作用，如果沒有國家的干涉，要提到長期「均衡」是不可能的。他與一般的庸俗經濟學家不同，他承認資本主義社會裡還存在着「非自願的失業」（Involuntary Unemployment），如果要達到「充分就業」，就必須通過國家干涉的方式，來獎勵投資，增加就業的量。在他看來，就業量決定於有效需要，有效需要又決定於消費傾向和投資量。他又認爲消費傾向是比較穩定的，要是消費傾向不變，就業量就決定於投資量（他認爲在投資與就業或所得之間，保持着一定的比例關係或倍數（Multpilier）他稱就業與投資之間的比例關係爲就業倍數。）而投資量又是決定於資本的邊際效率（即「利潤率」）和利息率的。所以，凱恩斯認定消費傾向，資本的邊際效率和利息率是自變數，就業量是因變數，[26]後者是隨着前者之變而變的，這就是凱恩斯就業理論的主要內容。

所以，凱恩斯一面承認資本主義社會裡存在着「非自願的失業」，一面又强調投資量的增加將決定於利潤率，這樣推論下去，他就得出了下面的錯誤結論：要消滅失業，必須增加投資量；要增加投資量，必須確保一定的利潤率（實際是超額的利潤率）；要確保高額的利潤率，就一定要壓低工人的實際工資，因爲「就業的增加，祗能伴隨實際工資率的下降而發生」。[27]如果有人由於實際工資下落而不願（或失去）工作，那就不再是「非自願」的失業者，而是「自願」的失業者了！

因而，依照凱恩斯的反動邏輯，要消滅失業和達到充分就業，一定要以實際工資的下降爲前提，他完全沒有了解，生產者失去了生產手段，才是造成失業的基本原因；要眞正達到充分就業，一定先要使生產者與生產手段結合起來。他根本不懂，在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時代，投資增加後，資本有機構成將會提高，產業後備軍將會變成常備軍，失業問題將益趨嚴重。特別應該指出的，就是凱恩斯非但沒有從階級關係來看就業問題，反而一手掩蓋了剩餘價值剝削的實質，甚至還把超額利潤看成理所當然的經濟現象，難怪壟斷資本集團要尊他爲資本主義的「救星」了！

尤其荒唐的，就是凱恩斯所告訴我們的三個自變數，又都受「心理動機」的支配。消費傾向不必說了，至於資本的邊際效率，那是決定於對於「利潤收益的期待」（Expectations of Profit Yields）的；再說利息率，那它一半又是決定於所謂「流動性偏愛」（Liquidity Preference指資本家偏愛以最易流通的財富保存起來）。三個自變數如此，二個因變數更不必談了。因而，我們可以稱凱恩斯是一個無可救藥的主觀唯心論者！

（2）**消費理論**

凱恩斯認爲：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私人消費的增加率，是趕不上所得的增

加率的，這構成了凱恩斯消費理論的基本命題。他說：「按常例，當人們的所得（收入）增加了，他們一般就會增加消費，可是，消費的增加，並不像所得的增加那樣多。[28]這當然是凱恩斯的錯覺，他祇看到消費不足，他卻沒有指出消費為什麼不足！為了自己的階級利益，他當然要把消費趕不上所得的原因，歸之於「先天的」人之本性了。他自己鑽在象牙之塔裡，又怎能聽到貧民窟裡的一片啼饑號寒之聲呢？他自己要養尊處優，又怎麼肯替無產階級發掘相對和絕對貧窮化的法則呢？他雖承認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是脫節的，但他始終反對這就體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他既不承認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階級剝削另一個階級的社會形態，自然更不可能承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消費是有其階級性的了。他祇是從量的方面來說明消費不足，並沒有從質的方面去分析消費不足和勞動人民貧窮化之間的關聯。他一面堅決反對增加工資，一面卻竭力鼓吹有錢階級揮金如土。他責備不消費、少消費，但他永遠不肯承認這批不消費、少消費的人都太窮了，他的消費不足論，比西思蒙第的還要令人作嘔！

再沒有更瘋狂的經濟哲學了，凱恩斯居然認為「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戰爭是可能增加財富的」[29]！難怪杜魯門要命令麥克阿瑟發動侵朝戰爭了！戰爭！戰爭！戰爭！戰爭既可挽救「消費不足」！戰爭又可「增加財富」！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凱恩斯，現在又是一位戰爭煽動家了！誠如米克（R.L.Meek）所說：「凱恩斯學說的某些成分，今天在事實上已被用作重要的戰爭工具。例如，在美國，凱恩斯就常被用來作為大量軍備支出的經濟理由了。」[30]

（3）利息理論

在凱恩斯的全部經濟學說中，利息理論是比較突出的，他把利息率看成「一個高級的心理現象」（「通論」，二〇二頁）同時又認為利息是一個純粹的「貨幣現象」。他說利息率將決定於兩個因素，即流通性偏愛和貨幣流通量。利息率的昇降，與流通性偏愛成正比，與貨幣流通量成反比。即是說，流動性偏愛愈强，利息率就愈高；貨幣流通量愈多，利息率就愈低。反之亦然。假定流通性偏愛不變，那末，貨幣數量的多寡就可決定利息率了，這是凱恩斯所關心的結論。

因為，照凱恩斯的推理，利息率既是決定投資量的二個因素之一，投資量既是決定就業量的重要的因素，所以，如果由於貨幣數量的多寡而影響了利息率，也就一定會影響到就業量。而貨幣數量的多寡，又往往取決於國家的貨幣政策，於是，凱恩斯認為：國家的貨幣政策是可以決定就業量的。

基於這樣的理由，凱恩斯就進而主張實行通貨膨脹政策了。因為，通貨膨脹了以後，通貨流通量就會增加，利息率就會下降，投資量就會增加。（用凱恩斯自己的話：「投資的規模要由低的利息率來促進。」[31]非但如此，在凱恩斯看來，通貨膨脹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通貨膨脹政策一面可降低利息率以促進投資，一面還可由政府通過貨幣政策，舉辦公共工程以擴大投資。加以，通貨膨脹了以後，一面「貨幣工資會漲、而實際工資會跌」，一面政府還可大量投資於備戰的經濟計劃，所以，凱恩斯是把通貨膨脹政策視作資本主義走向繁榮的靈丹的，無怪乎有人要給他加上一個雅號——通貨膨脹主義者了！

通貨膨脹有百利，利息率更是萬能！在凱恩斯的心目中，祇要靠着靈活地運用利息率，甚至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實行「計劃」經濟！真是想入非非！在這裡，他又把投資、儲蓄公式搬了出來：

所得（國民收入）＝生產品的價值＝消費＋投資

儲蓄＝所得－消費

所以，儲蓄＝投資[32]

從「貨幣論」到「通論」，凱恩斯一直堅持要達到充分就業，要避免經濟危機，就得維持投資和儲蓄間的均衡。怎麼維持呢？可由國家銀行機動地運用利息率政策：當利息率提高了，儲蓄就會增加，投資就會減少（利潤率也下降）；當利息率壓低了，儲蓄就會減少，投資就會增加（利潤率也上昇）。關於這一點，凱恩斯是最最感到得意的！

得意，得意又有什麼用？他認為萬能的利息率，並不能眞正改變資本主義經濟的客觀發展規律。他還是浮在面上，他還誤認利息是一個純粹的「貨幣現象」，他把貨幣同資本、利息同利潤都看成了孤立的範疇，他祇說利息率的高低和利息的量的多少，他不敢進而追問利息的本質及其來源；他與一般庸俗經濟學家一樣，並沒有把利息看成全部剩餘價值（利潤）中的一個分割部分，因而，他實際上是想否定利息的階級性和剝削性，替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寄生虫——食利階級做辯護士！他之所以主張由國家來掌握貨幣政策和控制利息率，也完全為了替壟斷資本集團找一個口實，可以借「國家」之名，來强化經濟壟斷（法西斯的經濟獨裁）！凱恩斯在替「通論」一書德文版（一九三六年）所寫的序言上，就曾坦白地供認：他的「通論」是「最容易適應極權國家的情形的」！

凱恩斯全部經濟學說的精義，大致不過如此。總起來說，它是極端反動、極端愚昧的！他所認識的價值、工資、貨幣、資本、利潤、利息等基本概念，都是根本錯誤的，他並沒有眞正建立起一套完密的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體系，甚至像地租這樣重要的經濟問題，他也沒有論及，在他不能自圓其說的時候，他就杜撰出一條「基本的心理法則」或「社會的心理法則」來了！他的主觀唯心論的經濟分析，只是爲了要倒果爲因！他否認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他抹煞了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律，他推翻了政治經濟學上已有的科學成果。他的一切理論，都可歸結爲一個目的：讓壟斷資本集團無饜足地榨取剩餘價值！到今天，在資本主義世界裡，凱恩斯主義已經變成了一套哲學——一套神秘主義的愚民哲學！一套改良主義的反動哲學！一套野蠻主義的戰爭哲學！

※　※　※　※

四　凱恩斯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死敵

根據上面的剖析，我們可以肯定地指出：凱恩斯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與馬克思主義毫無相同之處：凱恩斯站在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而馬克斯是站在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凱恩斯是一個主觀唯心論者，而馬克思是一個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者。凱恩斯找出了資本主義的缺憾，是爲了醫好它，使它「返老回童」，而馬克思發現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是爲了證明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無產階級革命必然勝利的歷史眞理。一句話，凱恩斯主義的最大目的，是維護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任務，是把全人類從人剝削人的階級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中解放出來。所以，凱恩斯主義根本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有些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惡意地把凱恩斯和馬克思拉在一起，硬說他倆的學說(特別是關於他們的經濟危機學說)是不謀而合的。像狄拉德(D. Dillard)在他的「凱恩斯的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1948)一書上，一則說「凱恩斯的學說與馬克思的學說有些類似」[33]；再則說「凱恩斯和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過程的分析有許多相同之處」[34]；又如羅濱生(Mrs. J. Robinson)在所著「論馬克思經濟學」(An Essay On Marxian Economics, 1942)一書的序言上，也居然帶上了一副「超階級」的眼鏡（她是今天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界的台柱之一），要凱恩斯的信徒和馬克思主義者彼此學習，來互補短長！就拿今天英美的一些自命進步的新經濟學家來說，也都犯了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的嚴重錯誤。如斯威冉(P. M. Sweezy)[35]、弗路蘭(F. Verrlan)[36]之流，就是典型的人物。前者認爲凱恩斯補充了馬克思的學說，後者又說他倆對失業恐慌的看法趨於一致。這種有害的論點，過去還會使一些超乎社會實踐的中國學者中過毒。直到今天，還不免有人把凱恩斯的危機學說，（即把「資本的邊際效率（即利潤率）之驟然下降」看成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37]）拿來套在馬克思的身上，而拒絕從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生產社會性和佔有私人性之間的矛盾來分析經濟危機。凱恩斯主義者是不敢承認「資本主義生產的眞正障碍是資本的本身」（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英譯本，二九三頁）這一歷史事實，也是不肯接受「要消滅危機，須先消滅資本主義」（斯大林語）這一歷史眞理的。對於上述的這類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我們必須予以糾正。

其實，凱恩斯所高舉着的那一面反馬克思主義的旗幟，是始終鮮明的。在他的「自由放任和共產主義」(Laissez-Faire and Communism, 1926)一書上，他一則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一種如此不合邏輯和如此愚蠢的學說」；再則說：「從經濟方面看，我不能相信；蘇維埃共產主義在心智的興趣或科學的價值上，對於我們的經濟問題是會有過任何貢獻的。」[38]在「通論」上，他又那麼武斷地說：「我相信：到將來，我們向蓋西爾(S. Gesell)精神學習的，要多於向馬克思學習。」[39]什麼是蓋西爾的精神呢？那祇是一個「自然的經濟秩序」(The Natural Economic Order)——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高度剝削的經濟秩序！而凱恩斯就認定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答案」！[40]

所以，凱恩斯是一個澈頭澈尾的反馬克思主義者。遠在一九二〇年，列寧就看出這位所謂自由主義者的狐狸尾巴了。列寧曾這樣痛斥過：「這位資產階級的學者，也像不學無術的英國市儈一樣，是社會主義的無情的敵人。他把社會主義描寫成醜惡的、殘暴的，獸性的形態。」福斯特也畫龍點睛地指出：「在任何一點上，凱恩斯主義是與馬克思主義相衝突的，企圖用馬克思主義來鞏固凱恩斯主義，或者把凱恩斯主義看成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現代的增添物，是毫無根據的，因而，是一定要失敗的！」[41]今天的事實證明出來；從理論到實踐，凱恩斯主義實際已經宣告破產了。

最後，我們還要重複一下：凱恩斯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死敵，是資本主義

總危機時代的一種最反動的意識形態，在今天，它已被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利用爲挑撥新的世界戰爭的工具，所以，它還不僅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死敵，並且是全世界愛好和平民主的勞動人民的公敵！讓我們用馬克思主義把自己更好地武裝起來，無情地揭露凱恩斯主義的反動本質，來打倒這個最兇惡的思想敵人！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於北京

①見「政事月刊」（Political Affairs），一九四八年一月號，二七頁。

②見「自由放任的終結，」頁四七

③「貨幣論」一書的主要論點可歸納如下：經濟危機的成因，是由於投資率和儲蓄率間的變動。要穩定物價，要避免經濟危機，一定要通過貨幣管理政策和利息率政策，使投資和儲蓄能夠保持平衡。詳該書第二卷，第六、七編。

④見「通論」，三八二頁。

⑤見所著「凱恩斯主義的革命」（The Keynesian Revolution）序言。

⑥同上。　⑦同上，一六七頁。

⑧參閱「通論」，第一章，三頁，註一。

⑨不過，凱恩斯是把它們稱爲使用成本（Uses Cost）和因素成本（Factor Cost）的。詳見「通論」第六章。

⑩見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他對紐約學生的演講辭。

⑪見「通論」，一三一頁及二三〇頁

⑫見所著：「貨幣改革論」（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第二章，四一頁。

⑬同上，一〇頁。　⑭同上，三八一頁。

⑮同上　⑯同上，三七八頁。

⑰同上，三七八頁。　⑱同上，一七頁。

⑲英國「銀行家月刊」（The Banker）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號上就曾說過：「我們全是凱恩斯的信徒。」

⑳見他所著 Essays in Persuasion，三二四頁。

㉑見「通論」，二四六——七頁。　㉒同上，一〇八頁。

㉓見「政事月刊」，一九四八年二月號一五六——七頁。

㉔見「通論」，二八頁。

㉕「通論」的結束尾。如直譯，最後一句應爲「對晉或惡才是危險的。」

㉖見「通論」二四五頁。　㉗同註十八。

㉘見「通論」，九六頁。　㉙見「通論」，一二九頁。

㉚見「現代季刊」，一九五〇年冬季號，三四頁。

㉛同上，三七五頁。　㉜見「通論」，六三頁。

㉝見該書一五四頁。

㉞同上，三三〇頁。

㉟見他在「科學與社會」季刊一九四六年秋季號上所著一文

㊱見他在「現代季刊」一九四七年春季號上所著一文

㊲見「通論」，三一五頁。

㊳見該書四七——八頁及一三〇頁。

㊴見「通論」，三五五頁。　㊵同上。

㊶見「政事月刊」，一九四八年一月號三三頁。

編後記

「實踐論」的學習運動，正在各地熱烈展開，我們爲了幫助讀者進行學習，特出學習「實踐論」特輯，並請李達先生根據「實踐論」原文，逐段詳加解說，以便讀者作進一步的學習，全文約五萬餘字，將在本刊連載，希讀者注意。

本刊是綜合性的學術刊物，每期發稿，必須照顧到各方面的學術問題。過去各期，以史學和哲學論著居多，而政法、財經方面的理論文章，所佔篇幅較少，我們歡迎各方賜稿，特別是關於新區土改、物價問題、財政政策、人民民主建政工作的理論分析。

這一期，發表了兩篇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的論文，這個批判工作，還應繼續擴大和深入，敬希各方面的學術工作者，能來協助我們展開這個工作。

「學術討論」一欄的投稿，最近特別顯得踴躍，這是一個好現象，它表明我們學術界正在培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風氣。爲了節省篇幅，我們希望以後的來稿，儘可能少引別人的原文，力求「開門見山」。

本刊改爲學術性月刊後，已出滿一卷（六期），在各方協助和鼓勵之下，使我們的工作向前推進了一步，但我們的缺點一定很多，希望讀者多多提供意見，以便隨時改進。在這一期裡，我們附了一份意見表，請大家塡後寄下。

本期篇幅，又超過了四頁。第三卷的索引，決於四卷一期「特大號」刊出，希讀者鑒諒。

實用主義批判

——實用主義是經驗批判論的直系親屬

陳元暉

一 實用主義的『經驗』包藏着什麼？

列寧說過：『凡是多少知道一點哲學文獻的人都一定曉得：差不多沒有一個現代的哲學教授（以及神學教授）不是直接地或間接地從事於駁斥唯物論的』。(註一) 杜威及其信徒們也就是列寧所指的這一夥的『現代的哲學教授』，他企圖用他的『經驗論』作爲他的武器來向唯物論進攻。

現在我們來看看杜威及實用主義者們怎樣使用『經驗』這個字眼：

『（1）舊派人說經驗完全是知識。其實依現在的眼光看來，經驗確是一個活人對於自然的環境和社會的環境所起的一切交涉。

（2）舊說以爲經驗是心境的，裡面全是「主觀性」。其實經驗只是一個物觀的世界，走進人類的行爲遭遇裡面，受了人類的反動發生種種變遷。

（3）舊說於現狀之外只是承認一個過去，以爲經驗的元素只是說着經過了的事，其實活的經驗是試驗的，是要變換現有的事物；它的特性在於一種「投影」的作用，伸向那不知道的前途；它的主要性質在於連絡未來。

（4）舊式的經驗是專向個體的分子的。一切連絡的關係都當作從經驗外面侵入的，究竟可靠不可靠還不可知。但是我們若把經驗當作應付環境和約束環境的事，那麼經驗裡面便含有無數連絡，無數貫串的關係。

（5）舊派的人把經驗和思想看作絕對相反的東西。他們以爲一切推理的作用都是跳出經驗以外的事。但是我們所謂經驗裡面含有無數推論。沒有一種有意識的經驗沒有推論的作用。』(註二)

從這幾個『舊說』和『其實』裡面，我們可以找出杜威的『經驗論』的『眞髓』。杜威在這裡既不承認經驗是主觀的，也不承認經驗是客觀的，經驗只是一種『交涉』，『變遷』，『投影』，『連絡』，和『推理』。如果要問實用主義者經驗是心的呢？還是物的呢？他們的答復無疑是說：經驗是心物之交。這個『交』字，是只可意會的，不可言傳的，實用主義者的神秘和玄妙就在這裡，唯心的破綻，也就從這裡顯露出來。

認識開始於經驗，這是認識論的唯物論，但認識如果僅僅停止在經驗的階段，那還只是『半截觀音』，不是辯證的認識論。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中指出：認識有待於深化，認識的感性階段有待於發展到理性階段——這是認識論的辯證法。

認識有待於深化，但開始必須從客觀外界得到感覺經驗。僅僅承認感覺經驗，那就是過去唯物的經驗論的缺點。如果連感覺經驗是客觀的，是客觀存在在腦中的反映都加以否認，認爲經驗只是所謂內省體驗，那是唯心的經驗論。實用主義者是屬於前一種的人物還是後一種的健將，請看杜威，便知分曉：

杜威在「確定性的尋求」一書中這樣說明感覺與觀念的關係：

『（一）在實驗的認識中作用，它的前端總是起因於自然界的一種經驗的素材，但以未經控制，是不確定的有疑難的。經驗的素材，是生物與環境的自然交互作用所產生，本身上非感覺、非概念，亦非二者的混合，這種素材，這是一切日常未證明的經驗的材料。（二）感覺（事實）與概念的辨別，是爲了進行探究達到證明的結論中，有意造成的。（三）所以感覺（事實）或觀念都非絕對的，固定的，而是偶然的、臨時的。只要觀察供給更好的證據，科學的進步供給更好的指導的臆說，事實與觀念，都得修正的。（四）因此作爲事實或作爲觀念（理論）的材料，不斷地互相檢核。其中一項的進步，同時就引起另一項的進步。二者不斷地互相影響，以改組經驗的素材，構造可以認識的新對象。』(註三)

從這一段的引文中可以得出下列四個論點：第一，認識是起於經驗，經驗既非感覺，又非概念，只是人與環境交互作用所產生的怪物。第二，感覺並不是客觀的，不是從客觀世界得到的，而是『有意造成的』。第三，感覺只是偶然的、臨時的。第四，認識的對象可以由經驗構造的。詹姆斯說他自己的經驗論是『澈底的經驗論』，從上述的四個論點看來，實用主義其實是澈頭澈尾的主觀唯心論！

經驗，不是作爲認識的感性階段的東西，而是虛無縹緲的東西。人類的認識就嚴密限於這虛無縹緲的『經驗』範圍裡，決不能達到經驗以外或以上。唯理論主張超越經驗的實在，實用主義以爲實在就是經驗。經驗即實在，實在即經驗，這就是實用主義的認識論、眞理論和宇宙觀。主觀唯心論者貝克萊說：存在即被知；現在實用主義者說：存在即被經驗。這兩種說法，能看出它們的差別嗎？

實用主義者口頭不承認經驗是主觀的，但無論如何總掩蓋不住狐狸的尾巴。實用主義者用『經驗』這字眼來否定客觀物質世界，他們認爲客觀物質世界是主觀觀念的產物，請看詹姆斯的自供：

『所以我們若說到人的思想以外獨立的實在，是一個很難尋得的物。……我們可以瞥見他們，不能握住他們；我們所握住的，常是人的思想所已烹調過的一個替代物。』（註四）

經驗批判論者，也是以他們的『經驗』，大吹大擂，來掩飾他們的反動性。所以列寧說：『經驗』掩蓋了哲學上唯物論的路線與唯心論的路線，並且把兩者之混淆不清奉爲神聖。』經驗批判論以各色各樣的詞句掩飾着主觀唯心論，其中最主要的是以『經驗』的概念代替物質的概念。他們想更巧妙地掩蓋主觀唯心論的實質，馬赫便提出什麼『感覺的複合』，波格唐諾夫也在說什麼『集體經驗』等等名詞來迷惑着人。所謂『感覺的複合』，就是說物體是感覺的複合；甚至頭腦也不過是感覺的複合，因此在感覺的複合下，我感覺着感覺的複合，而『我』也不過是感覺的複合。世界是什麼東西呢？一句話：世界是我們的感覺。由此導出了馬赫與阿萬那留斯的『唯我論』。波格唐諾夫以爲用『集體經驗』來代替『個人經驗』可以作爲他的隱身術來隱蔽他的主觀唯心論的面目，說什麼外間世界不是在個人的經驗中而在集體經驗中給與人的。這種『集體經驗』也不外是馬赫主義的『感覺的複合』。波格唐諾夫認爲在經驗之外，在感覺之外，並不存在任何世界，世界只存在於經驗之中。這種『集體經驗』能產生什麼作用，列寧曾譏笑他說：『以爲用人類底意識替代個人的意識，或且用社會地組織起來的經驗替代一個人底經驗，而哲學唯心論便會消失，——這等於以爲用合股公司替代一個資本家而資本主義便會消失一樣』。

阿萬那留斯曾表示：『我既不知道物理的東西，也不知道心理的東西，而只知道第三種東西』。馬赫主義者，經驗批判論者，以及他們的血緣近親——實用主義者都在追求這『第三種東西』，也都只知道這『第三種東西』。『感覺的複合』，『世界要素』，『集體經驗』以至於實用主義的『經驗』都是一丘之貉，都是這『第三種東西』。無論用那種字眼，他們都是企圖着說明一個道理：意識決定存在。他們在事實上都宣佈自我（經驗所從出）是第一性的，環境是第二性的；也就是說精神是第一性的，而物質是第二性的。所以，實用主義的認識論根本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必須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論之重視經驗，因爲它是在認識過程的秩序中居於最先的地位。人類是以自已的外部感覺器官（視、聽、觸、味、嗅）來知覺世界的。當外部的對象作用於這些感覺器官時，就引起了把該對象的知覺形成爲一個總體的相適合的感覺，就取得了經驗。經驗是認識的感性階段，它往往是表象的，片面的，如果認識停留在這一階段不前，就還不能認識眞實的客觀世界，所以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文中說：

「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僞存眞、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論的系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

經驗的全面性和眞實性要經過理性的烘爐來鍛冶的，不經過這一過程，就不能達到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但人類的認識運動到理性階段還未完結，毛澤東同志說：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如果只到理性認識爲止，那末還只說到問題的一半。而且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說來，還只說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爲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

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更進到實踐，這便是認識的全過程，經驗在這全過程中有它的位置，但它不就是全過程。

意識、感覺、經驗、思考都是人腦的產物，而人腦則是物質的、肉體的器官——是發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質的產物。另外，如果沒有作用於我們感覺器官的對象，意識、感覺、經驗和思考也不能够產生，所以，物質世界是認識運動的基礎，物質是第一性的。離開了物質世界來談感覺經驗，就必然陷入唯心論的泥坑。

二　杜威『實踐』了什麼？

在「民本主義與教育」一書裡，杜威發表了如下有關知識論的幾個論點：

第一，『試看一個雕匠雕刻一塊木頭，或用硫强水雕刻的人雕刻一個碟子，——任何一種前後一貫聯屬的活動，便可見每個運動的反應一方面節制支配感官所指示的情形，一方面並限定第二次感覺的刺激』。所以，知與行是不能分離的，處處是行，處處是知。知從行來，知在行裡。行從知來，行即是知，知識是在人類不斷對環境『給予』與『領取』交互活動中生長起來的。這就是杜威所主張的知識的行動性。

第二，『人是世界活動裡面的參與者，可見知識乃是一種參與的活動，知識的價值全靠知識的效能』。知識所以可貴是在它可以當作一種工具，用來解決困難並產生效果。正如皮爾士所說：『一個觀念的意義完全在於那觀念在人生行爲上所發生的效果』。判別知識的眞僞，衡量知識的價值，是以效果爲標準。效果可以從試驗中得來。把知識放在實踐中考驗，便能看出效果。這就是杜威所主張的知識的效果性。

第三，杜威認爲近代實驗方法進步，知識論得到了新的改造。『（第一），實驗的方法說：除非我們的動作眞能發生所期望的具體的變化，由此符合並證實所懷的概念，決不能說是有了知識。倘若沒有這種特別的變化，我們的信仰不過是某種假設，某種猜想罷了，只可用來作爲試驗的表示罷了。（第二）實驗的方法又說：思想是有用的；思想所以有用，全在能够周密的觀察現在狀況，用來作爲根據，藉以推知未來的結果。』這就是杜威所主張的知識的實驗性。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論將實踐包括於自已的認識論中，並且把它放在認識論的基礎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實踐的標準放在唯物論的認識論的基礎上』。列寧說：『在恩格斯那裡，一切生動的人的實踐包涵在認識論本身中，給予着眞理的客觀標準。』

杜威也常談實踐，但他的『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論的實踐，絲毫也沒有共同之處。

實用主義者把實踐理解爲實驗，理解爲試驗室的經驗。因此，感覺的直觀發現自然的秘密，而實踐在實驗的形式中證實或推翻發現了的眞理，實踐不是被放在認識的基礎上，不是被認爲是認識的動力，實踐出現在認識之後，而認識的動力是直觀。

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上說：『通過實踐而發現眞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眞理與發展眞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與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公式。假設（或直觀）→實驗（或實踐）→證實（或認識）這是杜威的公式。一種實踐是以認識做它的中間項，另一種實踐則以它自已做中間項，兩種實踐的區別是很明顯的，從這裡就區別出唯物論與唯心論。

反對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所認爲認識的基礎和動力是實踐，有所謂『好奇心』、『認識慾』、『對上帝的理智的愛』、『企求智慧』、『直觀』等等作爲認識的動力和基礎。杜威不用這些名詞，他別出心裁，創出了『情緒底挑逗』、『想像的連綴』、『自發的暗示』等等名詞，把它們作爲認識的動力和基礎。他說：

『人的經驗所以成爲人的，是由於聯想和記憶底存在，而這些聯想和記憶則順着情緒底挑逗，憑着想像底連綴，而展開的。……我們仲欠、閃鑠、迴避、假托、隱瞞、辯解、掩飾——無非是想使我們的心境稍紓其所不安。簡言之，自發的暗示是傾於經驗的理想化，而於意識中以實際所無底性質付與經驗的。時間和記憶是眞藝術者，他們依着心所期願改塑實在底形相』。（註五）

多麼生動的一篇主觀唯心論者的自供！仲欠、閃鑠、迴避、假托隱瞞、辯解、掩飾都是心所安排的，連客觀現實世界都可以依着心所期願來塑造，這種理論是什麼呢？心創造世界，心創造一切！杜威主張實踐，杜威主張知識的行動性和實驗性的實質是什麼，從這裡可以得到註解。

實踐不是實驗室裡的實驗。物質的實踐首先是人與自然的互相關係，人與自然的鬥爭。在階級社會中階級關係，階級鬥爭是最重要的物質實踐。實踐如果脫離階級鬥爭的內容，將是不可想像的怪物。但杜威可以把實踐搬到實驗室中去，因此實驗即實踐，經驗即實驗等荒謬論點便成爲他的哲學的基本內容。

實踐是生活，在階級社會中人類的現實生活是階級鬥爭，離開階級鬥爭所謂生活將是不可思議的。杜威也承認實踐是生活，但他的所謂生活不是階級社會中的階級鬥爭生活，而是杜威爲它所安排好的實驗室裡的生活。杜威在敎育上主張的『敎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等，其出發點就是他的反對階級鬥爭的生活觀。

實用主義的另一特徵是主張知識的效果性：知識不關於客觀的實在的，不過是我們的心的過程，把我們所懷疑的置換一種確實的，使其結果滿足於我們，就叫做知識。眞理知識在實用主義者看來是我們情意的結果，抽去人的趣味、熱望、感情、滿足、目的、希望等，眞理與認識都不能成立。依實用主義者的眼光看來，客觀的事物事實雖屬於物質世界，屬於實在，但追本究源不過是各主觀的情意的結果，如果離開人的行爲，其自身即不能存在。

什麼是有效果的行爲，實用主義者認爲有效果的行爲就是有目的行爲；而有目的的行爲是發生於『好奇心』、『認識慾』、『對上帝的理智的愛』、『情緒的挑逗』、『想像的連綴』、『直觀』等等。杜威說：『有目的的行爲是出於審愼斟酌的；未行之先，已預料將得的結果，心裡已經瞻前顧後在那裡斟酌考慮。有目的的行爲不但含有結果的預見與瞻前顧後的考慮，並含有渴望達到這個目的的有意識的狀態』。(註六) 這個有意識的狀態是什麼？這仍然是心創造一切，心創造世界。

辯證唯物論哲學的認識論有兩個最重要的原則：第一，辯證唯物論承認外間世界的存在，它是我們的感覺和概念的來源。第二，辯證唯物論承認反映於人類的感覺與概念中的世界的可認識性。辯證唯物論底認識論是反映論。杜威是以各色各樣的詞句來反對上述兩個最重要的原則。

杜威的同行馬赫說：『認識是……生物上有用的心理經驗』。『只有效果才能區分認識到誤謬……』、『概念是物理學的作業的假說』，依據他這些說法，眞理的標準不是實踐而是什麼『效果』，『有用』，『假說』等等。列寧批判馬赫主義說：『對於唯物論者，人的實踐底「效果」證明着我們的表象與我們所感知的物底客觀本性之符合。對於唯我論者，「效果」是我在實踐中所需要的一切，實踐是可以用認識論分離開來』。(註七) 這些詞句用來批判杜威，也一樣適用。

三 實用主義者的空間和時間是客觀存在的嗎？

費爾巴哈說：『空間與時間，不是簡單的現象形態，而是存在底……根本條件』。承認空間與時間的客觀存在，這是唯物論的基本立場。唯心論則認爲空間與時間不是客觀存在，而是人的直觀形態。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上說：『任何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間與時間；時間之外的存在，和空間之外的存在，同樣是極大荒謬』。

我們現在來看實用主義者怎樣理解空間時間。詹姆斯說：

『宇宙的空間，與宇宙的時間，不是如康德所謂直覺，乃是人爲的構造。人類的大多數，永遠不用這些觀念，他們生存於衆多的時間與衆多的空間中，這些衆多的時間交互穿插的，十分雜亂的』。(註八)

這裡所謂『人爲的構造』、『交互穿插的』、『十分雜亂的』都是說明空間和時間都要靠人類的主觀觀念才能把它理成有秩序的系列，它才爲人類覺知。如果不是這樣，那無論是成年人和小孩，都分不出前日與昨日，也分不出倫敦和北京。觀念是時間與空間存在條件這一論點：從上面所引的一段話中可以看得很明顯。

空間時間是否可以認識的呢？實用主義者在談到人與宇宙的關係時有一個很妙的比喻，他說：宇宙是一個圓圈，人類是住在全宇宙圓圈的正切線上，全不知圓圈起於何處，終於何處。這就是說宇宙是什麼樣子，住在正切線上的人類是無法認識的。圓圈的起迄不知，更無從知道時間的流轉。

空間與時間，在實用主義者看來是經驗的產物，這就是說不是具有感覺的人存在於空間與時間之內，而是空間與時間存在於人之內，依存於人的經驗，爲人所產生。

馬赫說：『空間與時間是感覺系列底有秩序的（諧合的）體系』。又說：『在生理學方面，時間與空間是定向感覺底體系，這些感覺同感性的感覺一起決定着生物學上合目的的順應反應底放出。在物理方面，時間與空間是物理要素底相互依存』。空間與時間是什麼呢？在馬赫看來仍不外是『感覺的複合』。

列寧駁斥馬赫關於空間與時間的問題時，說：

『在抗拒從他自己的前提中所必然地發生的唯心論結論時，馬赫反駁康德，堅持空間概念發源於經驗。但是如果在經驗中沒有給與我們以客觀的實在（馬赫是這樣教導的），那末這樣地反駁康德，就絲毫也沒有消除康德和馬赫所共有的不可知論底共同立場。如果空間概念是我們從經驗中取得的然而又不是在我們之外的客觀的實在的反映，那末馬赫底理論依然是唯心論的。在人及人的經驗出現之前，自然存在於時間中爲數幾百萬年，這就表明了這個唯心論的理論底荒謬了』。

這些話引來駁斥實用主義者，也同樣是貼切的。否定時間與空間的客觀實在性，就必然替信仰主義洞開天門，實用主義者對於神的肯定不是偶然的。誰是唯物論者，誰是唯心論者，從他們對於空間與時間的理論上很容易判別出來。

四　耶和華是否實用主義者的上帝？

詹姆斯說：『在實用主義上，如上帝的假設，有滿足的功用，這假設便是眞的』。這句話很明顯地道出了實用主義者和耶和華的關係。

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文內說：『世界是由神創造的，還是世界永遠存在着？哲學家們，依照他們如何答覆這個問題而分成了兩大陣營。凡斷言精神先於自然界而存在，以及從而歸根結蒂，凡這樣或那樣承認創世說的（在有些哲學家，比如黑格爾，創世說往往採取了比基督教還要淆亂而荒唐的形式），構成唯心論陣營。凡承認自然界爲基本東西的，則屬於各種不同的唯物論學派』。實用主義者的唯心論尾巴，在對宗教的問題上就顯露出來。

實用主義者相信比人類更高的神力是存在的，並且具體關生動地刻劃出人和神的關係：

『我自己硬不信我們人的經驗就是宇宙裡最高的經驗。我寧可相信我們人類對於全宇宙的關係，就和我們的貓兒狗兒對於人的生活的關係一般。……我們從宗教經驗所給我的證據看來，也很可相信此人類更高的神力是存在的，並且這些神力也朝着人類理想中的方向，努力濟度這個世界』。（註九）

詹姆斯認爲上帝存在有許多好處，他可以維持舊的理想，保證一個永久存在的秩序。所以他說：

『在他方面，上帝的觀念，縱沒有如數學觀念的明瞭，却有一個實際上的大優點，就是保證一個理想的秩序，可以永久存在。』

神的兒子，流露對上帝的喜愛，是不足爲奇的。

杜威曾談到宗教的起源說：

『不能應付所生活着的世界，人就沒法和宇宙全體發生一點關係。宗教的起源，是這種嘗試的表現……像溺人的抓着浮草一樣，是初人缺乏現在所有的工具技術，就逞着想像，在苦難中抓着了宗教當作安慰』。

從這裡我們只聽到宗教是什麼『浮草』，『安慰』等等名詞，却沒有聽到宗教怎樣發展成爲人民的鴉片，它的主要作用是麻醉等等有關宗教本質的詞句。在宗教問題上杜威貌似不如詹姆斯那樣虔信上帝，其實杜威同樣是上帝的忠實神僕，他不過是用『觀念』，『理想世界』，『人類的意向』等等名詞來稱呼上帝而已。

當然，實用主義的宗教和舊式宗教是有些不同的。所不同的不是上帝是否存在的問題，耶和華是一切唯心論者的上帝。不同的是實用主義者不重宗教的表現，而重內心的上帝；它不指一定的教理教統，以宗教爲存於人類內界的宗教的習性，所以情感行爲、經驗等等是上帝存在的重要條件。

馬赫的追隨者，杜威的同鄉，芝加哥的教授卡盧斯先生也曾提倡他的什麼『一元論』，企圖調和宗教與科學，宣傳一種『新的神學』，一種『科學的神學』，這種神學雖然否定聖經的文字，但堅稱：『一切眞理都是神的，神在自然科學裡也像在歷史裡一樣展示着自己』。列寧斥責卡盧斯，說他是『在我們面前的是以宗教的鴉片來麻醉人民的一羣『美國文字騙子底首領』，杜威便是這個騙子首領的繼承人。

五　實驗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有無血統關係？

實用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有無血統關係？答覆這問題我引用列寧的話：

『還有一個例子可以表明反動的資產階級哲學怎樣利用馬赫主義。美國最新哲學底『最新時髦』要算是『實用主義』（字源是希臘文的『Pragma』——行爲、行動；即行動的哲學）。各種哲學雜誌說得最多的也要是實用主義。實用主義嘲笑唯物論與唯心論底形而上學，宣揚經驗而且僅僅宣揚經驗，承認實踐是唯一的標準，（下轉30頁）

姓與氏

丁山

山東大學文史系古代史教研小組要我講古代宗法問題。其實宗法，卽是家法。在恩格斯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一書裡，對於家族發展過程，早已分析盡致了。取以印証中國的古代社會，有的得到更有力的証明；有的也得到極其重要的補充。現在，將我所講的要點，「半知全解」的寫出來，——這篇，姓與氏是就恩氏所說，加以中國古代史實的証明；下篇半亞血族羣婚制就是要補充恩氏家族論的脫節。（將在本刊發表——編者）這不過是抛磚引玉的引言，希望研究古代史的同志們，多多指正。

我記得史記裡常說，某人「姓某氏」，氏與姓兩個名詞，在司馬遷時代已經是混爲一談了。白虎通姓名篇嘗說，「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勉人爲善也」。氏，果爾由貴賤階級產生的嗎？恩格斯說，「階級制度，當是從雜亂的性的關係狀態中直接發生的」，不是由職業貴賤區別的。况且原始氏族社會裡，大抵是合族之人共同生產，共同消費，根本沒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當然沒有經濟的階級（對婚姻階級言）。自周以來，中國古代人，爲什麼有姓，又有氏呢？姓與氏，究竟有何嚴格的辨別呢？六朝以來，雖由門閥階級產生若干姓氏的專門著作，總是分辨不淸這個問題。到了十三世紀初期，鄭樵作通志，其氏族略序依然說，「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以別貴賤，姓以別婚姻」。到了十七世紀，顧炎武重申鄭氏之說，作原姓，爲省我的繁證，且錄其全文於此：

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最貴者國君，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衞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稱「齊環」，衞太子之稱「鄭勝，晉午」是也。次則公子，公子無氏，不稱氏，稱公子，公子彄，公子益師，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然則，氏之所由興，其在卿大夫乎！故曰，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若謚，若邑，若官，爲氏，——氏焉者類族也，貴之也。考之於傳，二百五十年之間，有男女而稱姓者乎？無有也。女子則稱姓。古者男女異長，在室也稱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也，于國君，則稱姓，冠之以國，江芈、息媯之類是也。于大夫則稱姓，冠以大夫之氏，趙姬、盧蒲姜之類是也。在彼國之人稱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國若氏，驪姬、梁嬴之于晉，顏懿姬鬷聲姬之于齊，是也。旣卒也，稱姓，冠之以謚，成風、敬嬴之類是也。亦有無謚，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少姜、之類是也。范氏之先，「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士會之帑處秦爲劉氏；夫槩王奔楚爲堂谿氏；伍員屬其子于齊爲王孫氏；智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故曰，氏可變也。孟孫氏小宗之別爲子服氏，爲南宮氏；叔孫氏小宗之別爲叔仲氏；季孫氏之支子曰季公鳥，季公亥，季寤，稱季不稱孫；故曰，貴貴也。魯昭公娶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崔子欲娶棠姜，東郭偃曰，「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崔之東郭，氏異；昭公之與夷眛，代遠；然，同姓，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變也。是故氏焉者，所以爲男別也；姓也者，所以爲女坊也。自秦以後之人，以氏爲姓，以姓稱男，而周制止，而族類亂。作原姓。（見亭林文集。）

這篇文章，至今還有人稱道之。以春秋左傳國語諸書證之，在公元前五世紀以前，「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決無例外。所謂「氏焉者，類族也，貴貴也」；所謂「最下者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證明周代的氏，涵有嚴格的階級性，貴族有氏，庶人無氏，當然庶人沒有族外交際的自由，用不着氏，假定需要稱氏，一定跟着貴族稱呼。這就說明了一般庶人的身份，相等於貴族的奴隸。那末，春秋時代的氏族，恰相當於恩格斯所說的「家族」，所以左傳裡嘗說，「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大夫的氏族，也嘗總稱爲「大夫之家」。然則，氏族，決是家有奴隸的貴族。

男女辨姓，婚姻不通，姓是怎末來的？在顧氏原姓篇，並沒有說出姓的來原，當然是件憾事。嘗見所及，左傳國語都有比較重要的解釋。爲省讀者翻閱原書的麻煩，且將那幾段原文節錄於此：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隱、八年左）。

崇伯鯀之後伯禹，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共

之從孫，四嶽佐之。……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者也。……（國語，周語下）

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二人而已。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佶、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義以導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國語，晉語四）

從這三段短文裡，關于姓的來源就顯示着若干的矛盾。舉其要者，如，左傳說，「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周語說，「皇天賜禹姓曰姒，四嶽姓曰姜」，姓，究竟是天賜呢？還是天子所賜呢？這是第一個矛盾。周語說，「皇天賜四岳姓曰姜；」晉語則說「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姜姓，究竟是所賜呢？還是因爲炎帝生于姜水？這是第二個矛盾。當十八世紀初期，顧棟高作春秋世族表序則信左傳之說，云，

愚謂欲考姓氏之分，斷須以左氏爲樞紐。蓋盤古燧人之初，未始有姓也。至庖犧得風姓，炎帝得姜姓，黃帝得姬姓，帝堯以伊祁而爲祁，舜以嬀汭而爲嬀。至三代迭王，延及春秋之初，分封之國，存百有二十四，稽其姓，合中國與鄭睛僅及二十有一：——〔姬、姜、子、姒、風、祁、嬀、姞、任、嬴、己、偃、妘、曹、芊、熊、曼、歸、隗、允、漆。〕——是時諸侯之國，公子公孫，支分派別，列官分職，世有掌司，因以命氏。……（春秋大事表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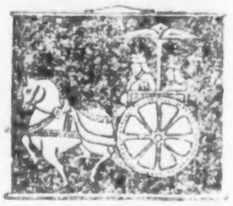
根據左傳，將春秋時代的古姓統計出來，只有二十一個，實尚未盡。據我所聞，國語尚有董、彭、禿、斟、四姓，詩經尚有戈、庸、二姓，金文尚有娸、嫘、嫪、諸姓，山海經所見的幾、桑、銷、烈，一類怪姓除外，春秋以前的中國，綜計之，也不過三十幾個。每個古姓，各有其始祖，各有其圖騰，因此，現代史學家多數主張姓的來源始于圖騰神話。可是，殷商王朝的圖騰是「高祖夔」，夔不是子，爲什麼商王姓子？夏后氏以句龍——禹爲圖騰，禹不是姒，爲什麼夏后姓姒？又爲什麼有吞薏苡而生禹的神話？圖騰神話，似較顧氏「地望」之說爲進步，但也不能印證恩格斯所說原始社會的發展規律。

恩格斯說：「一切矇昧人及處在野蠻最低階段，中間階級乃至部分地最高階段的一切野蠻部落中間，女性不僅享有自由，而且居于大受尊敬的地位。……由易落魁人證明，他們的家族，當着共產主義的經濟時候，那裡總是一個氏族佔着支配地位，從而女性是從個別氏族中擇取她們的丈夫的。……女性在氏族裡面，乃至任何地方，都是一個大力量。（詳張譯本五〇——五一頁）因此，恩氏論定「氏族制度，似乎是從普那路亞家族中發生的。……要是存在着羣婚，那只有從母親方面來確定血統。因之，祗有承認「母系」了。（詳張譯本四三頁）根據恩氏所測氏族發生的背景來回看顧炎武所舉「女子稱姓」的例證，也就可以論定，——男女辨姓，當是亞血族羣婚時代，承認「母系」血統的遺跡，所以春秋以前的古代女子，在名字之下，必着以姓。姓，當然是「母系血統」的特徵。再從中國古代史實分析，有夏之世，部族的首領，照例稱后，如夏后臯，夏后相，等是。后字本誼，是象母親誕育子女形，那時社會，母親尚握有氏族的政權，應該是亞血族羣婚的「母系血統」，現在傳說的古代史料都說夏后相、夏后桀，娶妻生子，都是「莫須有」之事。

根據定公四年左傳說，「周成王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在殷商王朝覆滅以前，顯然是以宗氏統率分族，以分族統率民衆。假定，將「分族」比附爲恩格斯所說的「氏族」，將「宗氏」比附爲恩氏所說的「大氏族」；那末，王朝，就相當于「聯合部族」的大酋長。即是，王朝的婚姻制度，也還是兄弟羣與姊妹羣的羣婚，不過武丁以後，確已發展到「父權」階段，不再是「母系血統」了。論其政治，也形成了國家組織，不完全是「共同生產，共同消費」，更形成了若干階級。所謂「類醜」，正是顧炎武所說的「最下者庶人」，當即工農階級，他們就跟着奴隸主——宗氏及分族的領袖，——稱氏。氏的發生，當然出于食士之君的奴隸主。這個問題，我在甲骨文所見殷商氏族及其制度篇另有詳細說明，在此從略。要而言之，姓與氏的分別，是：

姓爲母系血統的氏族遺跡，

氏爲父權時代的氏族組織。



關於編寫與講授本國史的指導原則（下）

尚鉞

在這裡，研究一下今日有些本國歷史教本對於歷史人物的處理問題，似乎是必要的。

中國歷史上幾個最特出的皇帝，如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中，最爲新舊史家所贊賞的是唐太宗。同時，最特出的朝代是隋朝，而隋朝統治階級的作爲是與唐太宗的成功有密切關係的。

關於唐太宗，一般史家有的說：「唐太宗是歷史上一位賢主，」「唐高祖得天下大半由於秦王世民之力。」有的說：「李淵仗着他兒子世民的本領，不出十年，便把整個中國，完全統一。」有的說：「唐太宗是一位比較有學問的君主，而又遇事果斷，任名臣……，時海內昇平，民各安居樂業，於是貞觀（六二七——六四九年）之治，論史者往往推爲秦以後極盛之世。」又有人說：「李世民智勇超羣，戰無不勝，武德七年，剷平羣雄，全國統一。」及「他在位二十二年刱兩漢以後最大的王朝。」更有人極力稱讚道：「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傑出的君主。自稱年十八便爲經綸王業，北剪劉武周，西平薛擄（應作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內安。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又說：「貞觀之治，尤爲後世所想望。」又說：「太宗既英才挺出，又勤於聽政。」

這些史家所代表的政治意見和階級立場，是極爲不同的，論理，見解應該有極大的差異。然而從上面的叙述與判斷說，却幾無二致。就是說，一致讚美唐太宗。但以唐初的社會狀況說：李唐王朝是直接承繼隋末大混亂之後，間接的是承繼五胡十六國南北朝的混亂局面之後，因之，就晉隋唐三個朝代生產力中的人力來比較一下，就可以看見當時的狀況了。

首先是西晉極盛時，晉武帝太康元年的數目字：戶數是二、四五九、八〇四；口數是一六、一六三、八六三。隋極盛時的隋煬帝大業二年戶數是八、九〇七、五三六；口數是四六、〇一九、九五六。至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則是「戶不滿三百萬。」這裡面還包括的有唐初由塞外歸來及四夷降附的戶口數，此後連年都有增加，至高宗永徽元年戶部高履行奏稱：「隋大業中戶八百九十萬，今戶三百八十萬。」由大業末到永徽不過三十六年，人口減員，戶數竟少去五百餘萬。由此，貞觀初年的情形，就更可想而知了。人口雖然大量減員，但土地面積却沒有變動，所以就有大量荒蕪空曠的土地。這情形由顯慶二年（公元六五七年）十月高宗與中書令杜正倫的問答中可以看得出來。高宗到許汝州，問：「此間田地極寬，百姓太少。」因又問曰：「隋有幾戶？」正倫答：「大業所有八百餘萬戶，末年亂離至武德有二百餘萬戶。」按武德元年爲公元六一八年。由武德元年到顯慶二年已是三十九年了，而許、汝洲一帶（這是魏晉時極富庶的區域）尚且如此之荒涼，貞觀初年（公元六二七年——）的情形當可想見。這種地曠人稀景象之所以造成，一是由於隋楊廣的虐殺，二是由於隋末的軍閥混戰和農民起義的大戰爭，三是因爲唐太宗「不出十年，統一全國」的大戰爭。最後統一了，和平下來，地曠人稀的景象對於作爲統治者的唐太宗說，首先就感到「無民可治」的痛苦了。這就使得唐初的殘餘人民，雖然仍是毫無權利可言，但總算比楊廣乃至南北朝時代要好得多了，因爲人口減員已經到了李唐統治者再無可虐殺的程度了。這就是一般史家所盛讚的貞觀政治的物質基礎。即使如此，而李世民在短短的十年中間把自東漢末年以來的時分時合，長期黑暗混戰局面統一起來，造出安定和平的貞觀政治，也是不容忽視的。

因爲，由漢末到隋代四百餘年的長期間，一方面是由生產力繼續發展對社會秩序與社會生活提出打破種族鬥爭和種族割據的和平與統一的要求，另方面是體現奴隸佔有制與封建制的統治階級所搞的分裂，割據與混戰。在這一長期間，由於社會的上層建築與內部結構的時常劇烈變化，社會趨勢所迫切要求的和平與統一，就只能是暫時的和局部的。

這種尖銳矛盾和鬥爭的局勢，一直拖延到南陳與北周，社會已呈現出極度疲敝的衰竭狀態，隋文帝楊堅才輕輕地篡了北周，滅了南陳，把中國統一起來。這就是一般史家所謂「自古得天下未有如此之易者」─隋楊堅取得統治權的社會基礎。可是在隋代短短的不到三十年中，却出現了兩個極端典型的統治者，而且只有兩個。一個是歷史上著名節儉的皇帝──楊堅，另一個則是歷史上著名的荒唐淫侈的皇帝──楊廣。過去史家多說楊堅的節儉是因爲懼內──獨孤皇后，楊廣的荒唐淫侈則因爲他個性的好大喜功。這種論斷是不正確的，是孤立歷史現象的看法，忽視了歷史人物是社會關係的產物。實際上，楊堅與楊廣都是適應着長期社會要求──和平與統一而產生的。不過他們兩人存在的時間不同，環境的差異也很大，因之兩人的作法因個人的特點與環境條件的殊異而完全相反罷了。

由於楊廣的荒淫殘虐，終於激起了社會的反抗。於是而有「羣雄並起」。從大業七年「(楊)玄感一呼，衆至十萬。」(楊廣語，見隋書煬帝本紀)的話，可以看出當時的英俊人物與廣大人民羣衆，在社會要求之下，又爲解決反暴君虐政的歷史任務而走上革命武裝鬥爭的道路了。社會既已提出革命武裝鬥爭的要求，如是英勇、果敢、善戰的軍事領導者就成了迫切的需要。因之，這時候任何起來反對暴君虐政的人都是社會所支持的人物。從而最具有解決當時社會問題的材能與智慧的李世民，便在社會全力支持之下，獲得了成功的結果。因此，李世民的成功，雖然部分的由於他個人的材能，如智勇等，但主要的還是由於社會提出適合於他的材能發揮的要求，並全力支持他解決問題。沒有這種社會要求，或者沒有社會力量的支持，李世民個人材能是完全無用的。由唐承隋制(楊堅的改革)的貞觀政治基礎上看，也可以看出這一點來。新舊史家把提出和支持他來完成這種任務的從歷史到現實的全部社會力量，通統劃到他個人的名下去，這就誇大了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忽視了人民羣衆創造歷史的偉大力量。這樣編寫或講授歷史，常常會使人們的想像發生混亂：以爲當時沒有李世民就不能推翻隋末的暴君虐政，或者就根本不會發生李世民的材能和影響所憑藉的那種社會運動。這是完全錯誤的。我們只要看看在歷史上，論英武、論學識、論果敢、論善戰、論風流倜儻，項羽比劉邦都高明得多。但因項羽的活動是使戰國時代許多分散的奴隸王國復辟的反動行爲，所以垓下別姬他所作的自我檢討的悲歌就唱出：『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及『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這個「時」與「天」就是社會趨勢。這就說明了傑出的人物，如果他與偉大的社會趨勢背道而馳，即使有『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本領，也必然要爲社會所拋棄，而等於完全無用的廢物。因此，我們說當時即使沒有李世民，楊廣的暴君虐政也一定會被推翻，從而類似貞觀政治的那種政治也一定會建立，以使人民能和平安定的生活，使生產力有發展的機會。不過時間或有延緩，政治外貌或有不同，而統一與和平的安定局面是一定要出現的。不是嗎?在李世民同時起義的農民領袖如竇建德、李密、王薄等以及軍閥及官僚叛亂的人物，總起來不下數十百人，或自稱爲王，或自稱公，或稱皇帝，總管等。由此可知，當時即使沒有李世民，或李世民中途戰死，這種歷史任務也一定有人會代之來完成的，即使代替他的人在能力、智慧各方面都不如他。因爲這種歷史的必然性是當時基於生產力發展的社會經濟條件決定了的。任何英俊的人物只能改變它的局部外貌，不能改變它的總趨勢；只能順應着它，不能違反它。

從上面的許多研究中，可以看出：我們馬列主義者不相信歷史是由英雄偉人造成的，因而就反對梁啓超所謂的「歷史純爲個性發揮之製造品……」「英雄造時勢，」及其認爲含有眞理的「歷史爲少數偉大人物之產兒，」「英雄傳即歷史傳」等等唯心史觀的見解。同時，我們「也不相信經濟變化能自動產生政治成果」的經濟唯物論的機械的觀點。因爲這兩種觀點都是不僅無法發展歷史科學，而且是阻礙歷史科學的發展的。在這裡，引一段恩格斯的話來結束這一問題：

『人類自己製造着歷史，但迄今爲止，尚未能以集體的意志，或按照集體的計劃，或在一個明確規定了的，特定的社會中製造歷史。他們的努力互相衝突，正由於這緣故，所有這種社會是由必然性來轄治的，而偶然性事件，則爲必然性的補充物和必然性出現時的方式。在這裡，表現於種種偶然性上面的必然性，最後地仍是經濟的必然性。値得我們研究的所謂偉人，就是從這必然性上面產生的。在這一個特定的時代和特定的國家內產生這樣那樣的一個人，而且恰恰產生那個人，這自然是偶然的事情。但如果把他除掉，就會有一個代替者的需要產生，這代替者是一定會找得到的，不管好壞，但他歸根是一定找得到的。當法蘭西共和國被戰爭弄得精疲力竭，正需要一個軍事獨裁者的時候，恰恰那個科西嘉人拿破侖來作這個軍事獨裁者，這是一個偶然事件；可是如果沒有拿破侖，另一個人也會起而代之；因爲某

種人一經成爲必要，他總是找得到的：如凱撒、與古斯特斯、克倫威爾等。在馬克思發現唯物史觀的時候，帝里(Thierry)，米奈(mignet)，吉佐(Guizot)和英國一八五〇年以前英國所有的歷史學家本身都是實證，證明唯物史觀是當時急迫需要的東西；而摩爾根發現了同樣的概念。這一事實證明了時機已經成熟，唯物史觀已經不得不被發現了。」(見馬恩通訊選集：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恩格斯致斯塔根堡函。)

三

馬列主義的理論與思想方法，在中國的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雖然已經取得偉大的輝煌勝利，但在歷史科學上，成績還有限得很。從大中學校的許多歷史教師去年暑假所反映的幾個大問題，如中國古代史劃階段的問題、歷史人物如何處理問題、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性的問題、以及本國史究應怎樣研究和講授的問題，等等。可以看得出來。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爲它關聯着青年們如何經由歷史材料走向馬列主義認識的大問題。在蘇聯，歷史科學已經獲得了很大的成績。這些成績中一個最基本的，有原則意義的，就是蘇聯歷史科學掌握了辯證法唯物論的方法，因此，才使其餘的成績有了保障。(見伏爾金著：「辯證唯物論與歷史科學」)同時，聯共中央和蘇聯人民委員會對各學校教授本國史的問題，於一九三四年經過精密討論，並作出了決議。可以看見聯共及蘇維埃政府是如何重視歷史科學的問題了。我們黨一向是重視中國歷史科學的建立的。目前在各機關、學校、訓練班中，一般的都在認眞地進行學習三種課程：社會發展史、中國近代革命史、和新民主主義論，可以說都是培養科學的歷史觀點的課程。我想，這主要的原因，就是使幹部和學員，從具體的歷史材料和歷史發展規律，走向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以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和方法，來改造幹部和學員們的不正確的思想意識。簡言之，即以正確的科學觀點來改正各種各色的非科學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說過：『我們認爲只有一個整體的科學，就是歷史科學。』因爲歷史科學是正確反映人類社會客觀發展的科學。中國歷史是人類整個歷史的一部分，一方面它的發展規律與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具有共同性，受着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規律所支配；另方面，它又有着它的不同的歷史條件、地點和時間的特殊性，因之，就不能用無效果的公式主義硬套，如認爲中國民族必然與西歐國家經過宿命式的共同道路等。所以馬克思指出：『極端類似的事變，而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會造成完全不同的結果。』並提出正確的歷史研究方法教育我們：

『分別研究這些進化中的每一個，然後把它們互相比較，就易於找到瞭解這種現象的鑰匙；如果利用某種一般歷史哲學理論的萬應靈丹(這種靈丹一下子解釋一切，正因爲它什麼也沒有解釋。)，是無論如何也不會達到這種瞭解的；這種理論的無上價值，就是它的超歷史性。』

列寧於一九一四年，捍衛布爾什維克對民族自決的立場問題反對盧森堡時也說過：『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要把這個問題提在一定的歷史範圍中；如果這是說到一個國家，……那就要估計到這個國家與同一時代歷史中其他國家的不同的特點，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

因此，我們研究、分析中國具體的重要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就必須估計到這些事件和人物的一定的時代性、階級性、地域性以及它們的特點，並把它們提到一定的歷史範疇中，與同一時代的其他地區和國家的不同特點，互相比較，才易於找到瞭解這些事件和人物的方法。只有這樣編寫的和講授的歷史，才能使成長着的後輩，經由歷史材料走向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並把自己變成毛澤東的優秀學生和戰士。

因之，這就要求我們本國史的編著者和講授者，學習毛澤東同志，把馬列主義在歷史學的範疇中中國化，從而建設起中國的歷史科學來。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

本刊啓事

我們爲了減輕投稿諸同志的負担，已經郵局許可，關於郵費一項，可以按照「零寄整付」辦法，由我們總付，投稿諸同志可不必再貼郵票，(限於平寄)但須於信封上書明「稿件」字樣，將左上角剪開，以便郵局查驗，並請書明「編輯部收」。至於需要退稿者，仍請附足回件郵資爲荷。此啓。

意識狀態試論

（創作論的一段）

黃藥眠

一個人，一生下來就是在一定的社會、和一定的階級環境中長大，所以他的生活也隨着他出身的階級、階層而有所不同。據最近生物學的研究，連後天獲得性，也還是可能遺傳的。這樣說來，就是在先天的遺傳中，也包含有若干階級性了。

過去弗洛伊德把性慾看成爲人的最基本的衝動，只因它受到意識的壓制，社會法律道德的制約，所以它潛伏在意識下面，但一有機會，這種潛意識又浮現起來。弗氏的這種學說，完全是以部份代替了全體。特別是當他把它應用到社會方面，和文學上面，他這種學說的謬誤性就更容易看出來了。而它之所以流行，又可以說是和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沒落，和世紀末的病態文學，有其密切關係的。不過，從今天唯物論的觀點來說，潛意識這個東西，我認爲是存在的。但它的發生，應該從社會的結構，和階級的生活實踐去理解。

當一個人在某一特定階級和階層中生活長久了，他就自然會形成一種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即對於外在事物的一套反應方式，）而且人們常常就根據這種生活方式和習慣，有意無意地來觀察和衡量這個世界，並加以判斷，這就是意識。換句話說，廣義的意識是包涵人們從感覺得來的表象，對於生活的態度，對於生活的看法，和平居的心理狀態。

但是人們的生活環境，是常常改變的，（那怕就是在一個階級內部），新的環境和生活，要求人們改變他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習慣，於是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就不能不被壓制下去。同時，由新的生活所產生的新的意識，也就把舊的意識壓制下去了。

這樣生活不斷改變，新的意識壓迫舊的意識，就不斷層積下去，形成了意識的層積狀態。有些原有的意識，因日子久了，漸漸被層積到下面去，而沉澱到下意識裡去。這個下意識，就是連本人也都忘記了，但這個下意識在這個人的意識上，還是起着若干作用的。

所以，就縱的方面來看，一個人的意識，並不是簡單的浮面的東西，而是由長期的生活歷史層積起來的。但這個意識狀態的層積，也不是靜止的，這裡面，我可以歸納出幾個規律：（一）當舊生活過渡到新生活的時候，新舊的意識也發生激烈的矛盾，舊的意識常常想抵抗新的意識，但由於外在壓力很强，舊的意識，終於是被壓到下面去了，（二）但這個被壓到前意識或下意識裡面的意識，還是常常想反抗，或者是把新的思想用舊的思想來解釋，或者是把舊的思想滲透到新的思想裡面去，或者是把舊思想化裝成新的思想，這樣互相矛盾，磨擦的結果，終於有一部份舊的意識，或因爲它對新生活不十分重要，或因爲它不甚引起人的注意，或因爲它還有若干用處而殘留在新的思想裡面，但那些爲新的社會環境所不容的意識則潛伏下去了。（三）但這個潛伏下去的意識並沒有死亡，一碰到外在的環境稍稍變得有利於它，或新的意識監視不十分嚴密的時候，它就又會浮了起來，所以在一個人的意識裡面，有些意識因爲受到了打擊，而退伏下來，而有些意識則又因得到機會而由潛在的情況而突然出現，於是，就形成兎起鶻落的狀態。（四）有些意識，因爲受到長期生活所薰陶，變得非常之頑固，所以雖然受到了打擊，而不能不潛伏起來，但它還是在暗中左右着人的行動，（這就解釋了爲什麽有些人口頭上是這樣說，而行動上又不是這樣做，有些人，因要求不遂，而情緒不安，或因生活困難而性情暴燥。甚至有時有些人，發了很大的脾氣，但事後想起來，他自己亦不能理解）。（五）年紀輕的人，因爲他的生活習慣，對於外在事物的了解和判斷的一貫方式，歷史較淺，因此，新的生活，很快就可以把它克服下去，而且舊的意識因日子淺也很容易被消滅，但年紀大的人則不同，因過去的長期生活，所層積下來的意識比較强固，因此它對新的生活底適應性較差，對於新的意識的抵抗力亦較强。（六）一個人的意識本身，也經常是在矛盾中發展的，每當社會激烈變動，階級鬥爭異常尖銳的時候，一個人的意識內部的矛盾也就愈加激烈起來，所以一個人的意識的矛盾，乃是客觀現實的矛盾的反映。（七）我以上這些話，完全想證實列寧在「哲學劄記」裡所說的話『自然底反映於人底思想中，不應當作「在」地，「抽象」地，既無運動，又無矛盾地去理解，而應在它們永遠的運動、發生，矛盾及解決過程中去理解』。

人的意識是決定於他的社會存在。這裡所說的

『意識』，是廣義的，它包含意識，以及潛伏着的下意識及潛意識。這個『意識』，在階級生活中不斷鍛鍊，和別的階級不斷磨擦，並經過分析，比較，綜合，判斷，企圖把零碎的思想，加以整理組織，用以說明客觀世界和作爲這一階級的人對於這世界的基本態度，於是就形成了一種有體系的思想——這就是意識形態。

但意識形態，也是社會歷史的堆積的產物，它有相對的獨立性。所以某一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形成，它一方面是反映了某一階級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它又是歷史上的意識形態的發展。所以列寧在「做什麼」一書裡面，雖這樣指出『……以爲從工人經濟鬥爭內部，即僅僅（或主要是）從經濟鬥爭出發，僅僅（或主要是）根據經濟鬥爭便可以發展工人們底階級政治意識……這種意見是根本錯誤的……階級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即只能從經濟鬥爭範圍外面，從工人對廠主的關係範圍外面來灌輸工人。』

根據我們上面所說的一些命題，現在可以試作一個簡表如下：

傳統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

下意識……→前意識……→意識

生活的歷史→社會的存在→生活的前途，希望

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裡面，曾這樣指出『人的本質乃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的總和。』這是從橫的方面來了解人的意識，但從縱的方面說，人的意識，則又是他在階級生活實踐中所層積下來的意識狀態。

工人階級，他們本身就經驗着被壓迫的生活，因此當他們一接觸到革命的馬列主義以後，他們就立即能從自己的生活實踐中體驗到這個學說的正確，從生活到意識，到思想體系都是一致的，這是一個完整的革命人生觀。但知識份子，他們的革命理論是從書本上學來的，而他們本身的生活，則可能還是地主的、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因此，他們的理論和他們的生活，和他們從生活歷史所層積下來的原有意識是矛盾的。

當然，智識份子之走向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運動，亦是有其社會基礎，但是他們究竟不是勞苦大衆出身，他的本身沒有經過長期的被剝削被壓迫的生活，在他們的意識裡面，沒有深厚的生活體驗，在下意識裡沒有層積下來的痛苦的經驗，因而也就沒有堅決的鬥爭，因爲有這些種種原因，所以他們很容易把傳習得來的馬列主義化成簡單的抽象教條，或庸俗化成細目，或根據他們自己的生活經驗作有利於他們的解釋。而在實際工作中，則表現爲解決事情時，常不切實際，遇到緊要關頭時常會動搖。

從文學創作的觀點說，智識份子的左翼文學，在革命文學運動史上看，是有其一定的意義。但它的缺點，就是沒有實際的生活，而多是抽象的概念，或者是主觀主義的空洞吶喊，或者是把自己化裝成工農來出場，或者是只攝取了工農的外表的形象，而對於他們的精神生活毫無理解，或者是撫拾一些工農生活的零碎片段，而加以猜測。

智識份子在文學創作上爲什麼會有這樣的缺點，原因是在他們的生活裡面，他們沒有工農階級的階級感覺，并從這感覺所獲得來的表象，沒有從實際生活中所養成的階級的愛和憎，沒有和感性認識聯絡在一起的頑強的階級態度，在下意識裡面，并沒有這些表象的積蓄。而這些積蓄又是必須經過長時間去堆積起來的。

在平淡的生活裡，所獲來的表象是很容易在意識裡面沉澱下去，而很快遺忘。所以，如果能夠經常在鬥爭生活中和外在世界保持着緊張的關係，那麼他所獲得來的表象就愈深刻，即使一時沉澱下去，也很容易在適當的時機又浮了起來。

對於外在世界的某些事物接觸得愈頻繁，愈熟悉，則對於它的表象也就愈深刻；即使一時忘記了，但一到創作的時候，它又自然就會浮現起來。

和某些人相處得愈久，相同之點愈多，同安樂共患難之時間愈長，那麼潛伏在意識下面的這些表象，就愈深刻，好像這些人都成爲了自己生命的一部。所以，一當意識動員它出來的時候，它立即就從心裡面湧現出來，表現得異常親切。

過去強調下意識在創作上的作用是不對的，正如過分重視感性的認識是不對的一樣，不過潛在的意識在創作上會起一定的作用，這是事實。最理想的情況，是經過長期的生活鍛鍊，把層積着的潛在的意識和思想，意識形態統一起來，使它服從於思想的指導。

正確的思想不必一定能使作家寫出很好的作品，但是它能在以下幾點幫助作家。首先，它幫助作家確定自己的觀察的角度，和對外在世界的態度。其二，確定作家的創作方向和加強他對於政策的了解。其三，它加強了作家對於某些事物的敏感；其四，它加強作家對於人物的本質的側面的把握；其五；它幫助把從各種事物的關係中和變動中去瞭解事物。最後，它幫助作家批判自己，清洗潛伏在意識下面的前意識和下意識。

學術討論

本欄的增闢，是爲了對各種重要的學術問題，展開自由討論，和培養學術界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風氣。

——編者

讀了「怎樣研究中國歷史」

劉晴

在「新建設」第三卷第二期上讀了翦伯贊先生的「怎樣研究中國歷史」一文，覺得有幾點意見，願意提出來討論：

第一、在翦先生論到研究中國歷史的立場問題時他說：「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是不能也不願揭示歷史眞理的。」——這些話倒是很眞實很正確。可是繼續說「能夠揭示歷史眞理的，只有無產階級，因爲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給與歷史以科學的說明，才能使歷史學與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才能指出歷史發展的規律」。我認爲這樣的說法，就有欠妥當了。

這樣的說法，首先容易使人認爲想把武裝無產階級指導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具有先覺作用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解消於無產階級中的誤解。

如果只說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這樣才能那樣，而沒有說只有無產階級，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一先進的科學的武器，才能這樣，才能那樣，那將置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於何地？想把它解消了吧，可是歷史的事實的邏輯，又在說明它的先覺作用。

我想翦先生這樣的說法，也許是和唯心論者把無產階級看作消極的無活動的大衆的那種觀點對立而言，不過這樣說又有些過了火，這一過火不要緊，又容易惹起像上述的那樣誤解，是不是？

現在，我認爲我們有把馬克思黑格爾法律哲學批評序說上的一些話引到這裏來看看的必要，「就好像哲學在無產階級裏找到了它的物質的武器一樣，無產階級在哲學中也找到了它的精神的武器——這解放運動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哲學沒有無產階級的揚棄，就不能化爲現實，無產階級如果不把它轉化爲現實，也不能揚棄自己。」從這些話可以看到無產階級的哲學和無產階級相需的情景，從這裏也可以看到把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解消於無產階級中，就和想把頭腦解消於心臟中一樣的不妥當。

第二，翦先生說：「我們應該批評那種站在狹隘的種族主義立場（爲統治階級的種族支配作辯護）所寫的大漢族主義的歷史，建立包括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的眞正的中國歷史」。同時又說：「爲了建立這樣的歷史，在積極方面，我們應該把中國歷史的研究，聯繫到各少數民族歷史的研究，（理由是）因爲實際上中國的歷史、不只是大漢族的歷史、大漢族的歷史不論在中國史上佔有怎樣重要的地位，也只能是中國歷史的一個主要的組成部分，眞正的中國歷史是中國境內各種族歷史的總和，如果不研究各民族的歷史，中國史就無法得出正確的結論。」

這段話有的是對的，有的是不對的。

爲了建立包括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的眞正的中國歷史，除了研究漢族的歷史以外，還應研究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的歷史。這是很對的。

可是，如果說中國歷史是中國境內各種族歷史的總和，不只是漢族的歷史，所以去研究各少數民族的歷史，認爲這樣才可以使中國史得出正確的結論，這就有些差點了。

假使從已往到現在，中國境內只有漢族這一個民族，而其他各少數民族都不處於中國境內而處於中國境外的話，那麼，我們今天研究中國史，就不用研究在我們中國境外的各少數民族的歷史了嗎？

我認爲研究漢族的歷史，首先不應與各少數民族的歷史相分離，研究包括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的眞正的中國歷史，除了研究漢族和各少數民族的歷史以外，還不得與亞洲各民族的歷史相分離，並且一般的也不與世界人類歷史相分離。把漢族的歷史放在中國境內各民族的歷史中，把中國境內的各民族的歷史也就是眞正的中國歷史放在亞洲各民族的歷史中、放在世界歷史中，在它們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之下去研究中國歷史，才可以使中國史得出正確的結論。否則，得出的結論，也不會是正確的，因爲用了形式邏輯的分割的大刀，把中國歷史一下子割死了的緣故。

其次在這段的後邊「最後，我們也應指出，由於中國境內各種族在侵略與被侵略，征服與被征服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今日的偉大的中華民族。」

我認爲翦先生既能夠認爲對於歷史事變，不歸結於卓越人物的願望，而應聯繫到當時的社會經濟予以說明。同樣的，對於中華民族的形成，也應以各民族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致又不一致性，去作爲說明中華民族的形成的決定原因和過程。

第三，翦先生批評唯心論的歷史家的時候，說他們「對於任何歷史事變，都不聯繫到當時的社會經濟去給以說明，總是把這些歷史事變歸結於卓越人物的願望」，更進而「把卓越人物的願望歸結爲神的啓示」。這唯心論的歷

史觀點，已被歷史事實的邏輯，說明了它的錯誤。

基於這樣的看法，於是乎有些歷史研究者，都怕偏於唯心論的不正確的傾向，而對於歷史上所有的一切，都歸因於歷史發展一般規律的作用，即一般原因的作用，遂把歷史人物個人特點的意義完全忽略過去，於是「却會覺得甚至各個歷史事變的局部特點都是由一般法則的作用來決定。如果你認爲各個事變的局部特點都是由一般法則的作用所制約而與歷史人物的個別特性無關，那你就不免要得出結論，說這種特點是由一般的原因來決定，並且絲毫不會因歷史人物的改變而有所改變。於是這個理論就變成爲宿命論。」（普列哈諾夫論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就流入客觀的宿命論的歷史觀點上去。斯大林在「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上也說過：「至於社會思想、理論、觀點和政治制度的意義，至於它們在歷史上的作用，那末歷史唯物主義不僅不否認，恰巧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們在社會生活和社會歷史上的嚴重作用和意義。」

而翦先生在說「社會經濟的結構是歷史的眞實基礎，在歷史上各時期的政治法律宗教哲學及其他觀念，歸根到底都應該由社會經濟來說明……都是社會經濟的派生物，只若社會經濟一有變動，它們或遲或早都要跟着變動。」之後，雖也說到「唯物論者從來不忽視觀念形態對歷史所起的反作用，而且以爲只有把握社會經濟基礎與觀念形態之間的關係與統一，才能理解歷史上的社會之有機的構成。因此，我們研究中國歷史，也要根據物質的實踐去說明觀念形態，並且從觀念形態中去尋找社會經濟的反射。」可是始終也沒有明顯地提到促進或延緩社會的發展的因素之一，也就是沒有提到卓越人物的願望即代表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帝王將相、征服者、侵略者的企圖或行動，以及爲歷史所需要的社會領導人物的個人特點、願望和行動，在歷史上在社會的發展上所起的促進或延緩的作用，把它們作爲促進或延緩社會發展的因素之一。

歷史的具體事實說得很明白：「在歐戰末期，帝俄要爆發革命是必然的，無產階級在這革命中也必然地要發生重大的作用。他們需要領導革命的領袖，倘若沒有列寧，一定將有他人來補助他的地位。但是沒有疑問，列寧對於蘇聯及世界革命起了極大的加速作用。在蘇聯革命初期，倘若沒有列寧而是機會主義者取得領導，有可能把蘇聯革命的成功推後數年或十年。」（葛名中「科學的哲學」）又如我們中國革命，如革命初期陳獨秀等的領導早些換爲毛主席的領導，那中國革命的成功，一定會提前數年。再如：我們中國已往如果沒有那些不想社會經濟如何發展，而只想破壞，只想淫靡無度的許多帝王將相，以及沒有各民族間的相互掠奪，而引起的征服反征服、侵略反侵略的戰爭，就是有個別決定的因素，決定社會發展的遲緩，但也不致於使中國社會經濟延緩在封建階段上這麼長。

當然，這些好的壞的卓越人物的願望和行動，只能延緩或促進歷史的進程，卓越人物的個人特點，只能決定各個歷史事變的局部外貌，但他不能改變歷史的方向、不能改變當時事變的一般趨勢，能決定這進程的趨勢的，只有由於生產力的發展、以及依此種發展爲轉移的社會經濟、生產過程中的人們的相互關係、即生產關係來決定。

第四，就是關於研究中國歷史的方法問題上的意見；翦先生說「這裏所謂方法，是指辯證唯物論而言。不過這裏我要說到的，不是這個方法論的本體，而是怎樣應用這個方法來研究具體的中國歷史。」

我覺得（也許是不正確的）爲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是一個有機的結合的整體，是不可以分割的。在辯證唯物論裏，論理學、認識論、方法論三者是同一的、是一致的，雖在把它當作世界觀、當作哲學、論理學來看可以稱之爲辯證唯物論，在把它當作認識論、方法論來看的時候，可以把它叫做唯物辯證法，但這很顯然的絕不是把它分開。尤其是在把它當做方法論來用時，更不好把這方法論的本體拋開而應用這個方法，若把這方法論的本體拋開，則脫離方法論的本體遊離出來的方法，是個甚麼方法？又方法遊離出來以後所賸的方法論的本體，又是一個甚麼樣的本體？它成了一個甚樣的東西？是庸俗唯物論？是機械唯物論？還是別個？不管它變成甚麼，敢保它不是辯證唯物論，遊離出來的方法，也敢保絕不是唯物辯證法。

我記得「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裏，辯證法、論理學及認識論的同一性，是立腳在這一哲學的唯物論的前提上的，這個同一性是建築在唯物論的基礎上的，只有用唯物論去解決存在與思惟的問題，只有站在反映論的立場上，才能使辯證法、論理學及認識論的問題，得到徹底的解決，要理解關於論理學、辯證法及認識論的一致的問題的列寧的言論。列寧在馬克思的資本論註釋中對於論理學、辯證法及認識論的一致的論究，是有着重要意義的。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指出資本論方法的完美特徵說：『馬克思雖然沒有遺留下論理學，却留下了資本論的論理學，並且可以充分利用它去應付當前發生的問題，在資本論中，論理學、辯證法及認識論，是當做同一個科學來應用的。』」（艾思奇譯「新哲學大綱」）所以拋開方法論的本體而應用它的方法是不對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曾經有些人們，對於辯証法唯物論的發生「巧妙地宣傳着一種全然錯誤的觀念，據他說來辯証法唯物論，不過是兩個部分——即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和黑格爾的辯証法的合計，這種觀念是把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實際發展過程加以單純化，同時加以曲解。」（艾譯「新哲學大綱」）這不過是資產階級想要湮沒無產階級哲學的革命的本質的一種企圖而已。

我想翦先生倒未必是受了這個宣傳，不過是爲了歷史研究者更容易明白研究中國歷史的方法問題、思想方法問題一時未加緻密考慮的順筆書來而已。

不然，他就直接的提出來要應用黑格爾的辯証法去研究中國歷史，有多麼乾脆呢？

第五，翦先生說研究中國歷史，要學會從階級矛盾中去尋找歷史的變革。這是最正確不過的。

不過他說「階級矛盾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斷的變化中發展着的。例如西晉的歷史，就充分地表現了階級矛盾的轉化過程：最初是統治內部的矛盾（八王之亂），以後引發了敵對階級間的矛盾（流人暴動），最後轉化爲種族間的矛盾（永嘉之亂）。因此，當我們分析階級關係時，就必須注意矛盾的發展和轉化。」

這種說法，我却不敢同意。

我認爲(也許是錯誤的)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敵對階級間的矛盾是敵對階級間的矛盾，而種族間的矛盾又只是種族間的矛盾。敵對階級間的矛盾不是由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所引發，而種族間的矛盾又更絕不是由敵對階級間的矛盾所轉化。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是該統治階級在形成或團結成爲該階級時就有這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而敵對階級間的矛盾，是該階級社會在形成的同時就有這敵對階級間的矛盾；至於種族間的矛盾又是該時各種族間所素有。祇是敵對階級間的矛盾在八王之亂以前，是在隱藏的不顯露的鬥爭着，由於八王之亂對於社會存在社會經濟的影響，因而使敵對階級間的矛盾更尖銳化起來，終而演成敵對階級間的公開的鬥爭的所謂流人暴動。至於種族間的矛盾，既不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的發展，也更不是敵對階級間的矛盾的轉化，種族間的矛盾在八王之亂以前就存在着發展着鬥爭着，祇是還未尖銳化，祇是還未被歷史家所注意而已，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公開的鬥爭，由於敵對階級間的矛盾的公開的鬥爭，所謂八王之亂，所謂流人暴動，使種族間的矛盾加速地尖銳起來，使各種族間的種族支配被支配與壓迫被壓迫的矛盾的鬥爭，和敵對階級間的統治被統治與剝削被剝削的矛盾的公開的鬥爭，合流在一起，結成該封建段落上的不自覺的民族民主鬥爭的統一戰線的巨流，形成所謂永嘉之亂的歷史事變，一下子淹沒了西晉。

固然是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公開鬥爭的八王相攻，貪一時便宜借外力進行內戰的利用所引起。但可不能說，種族間的矛盾是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或敵對階級間的矛盾的轉化或引發。

固然，上述的矛盾與另一矛盾之間，上述的這一歷史事變和另一歷史事變之間，有着一些因果關係，但這因果關係，只是在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之下的因果關係，決不是誰轉化了誰，不，誰決定了誰的那樣的因果關係。

不錯，若是浮淺的從歷史現象去看矛盾的發展和分裂，去看事物的轉化，也倒是像翦先生所說的那樣。不過我認爲研究歷史研究中國歷史，還是應該要依照翦先生所說的「要從歷史的表面現象的背後，去發掘構成這些表面現象的基本東西——經濟結構，再用這種基本的東西去說明表面的現象。即把目光透過現象去尋找它的經濟根源……然後才能對於某一時代的政治現象、文化思想，以及一切複雜紛亂的歷史現象，給與正確的說明。」「便要學會從歷史現象背後尋找本質的方法。」就是要學會作爲研究歷史的方法論的唯物辯證法，也就是要學會矛盾統一法則、質量轉化法則、否定之否定的法則以及屬於唯物辯證法範疇的諸思維方法，然後才能使歷史的研究，走上正確的科學的道路，才能指出歷史發展的規律，才能使歷史學與革命的實踐相結合。

再這裏附帶地還要說幾句的，就是在談研究歷史的方法問題時，似乎應該知道蘇聯的辯證法論者德波林學派是怎樣的犯了錯誤，我們也使辯證法純方法化了沒有？把辯證法和認識論對立起來沒有？再就是我們在建立新的中國歷史時，我們有沒有把唯物辯證法和歷史生硬的揉合在一起的地方？

第六，翦伯贊先生告訴我們研究中國歷史的人，不應停在史料的搜集，不應僅止於歷史現象的記述，一再地指示歷史家的任務，是多麼懇切而正確。

不過我以爲如能以「爲什麼要研究中國歷史」把歷史家的任務，把研究中國歷史的目的，提示在前邊，那就可以使我們更清楚一些，因而能夠更明白了掌握到以馬列主義這個「矢」通過中國歷史，吸取中國歷史中的有用的東西，去射中國革命與東方革命的這個「的」的研究中國歷史所必具的「有的放矢」的態度了。是不？

整個說來，翦伯贊先生的那篇作品，不失爲具有指示性的有價值的文字。

對於上述的幾點意見，如認爲有不正確處，希望多批評，多指正，因爲這樣，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才可以提高。

本刊三卷五期要目

實踐論　毛澤東
學習「實踐論」，提高新中國的學術水平　社論

專著

「實踐論」——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　李達
人民民主建政　謝覺哉
從犯罪分類上談滿清舊刑法觀點　王紀新
論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歷史地位　華崗
關於編寫與講授本國史的指導原則　尙鉞
人民租稅綜論　周伯棣
剩餘價値說與馬列主義經濟學　王台
論中國父權社會對於舅權的抑制　潘光旦
奴隸社會意識形態的研究　周谷城

譯文

愛因斯坦的新理論　饒毓泰譯
新編『哲學史』　王子野譯
評劉大年著美國侵華史（書評）　李光霖
學術討論（三篇）
學術問答（三篇）
學術文摘（三篇）
學術簡訊（六則）
一九五〇年國內期刊重要學術論文索引

再論中國歷史研究

翦伯贊

去年十一月，我在「新建設」第三卷第二期發表了一篇「怎樣研究中國歷史」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我提出了三個問題，即研究中國歷史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問題。最近新建設的編者寄給我一篇劉晴先生所寫的文章，對於拙著提出了很多意見，歸納起來，約有五點，現在依次答復如下。

一　無產階級能不能揭示歷史眞理？

劉先生對於我的第一個批判，是說我所說的「能夠揭示歷史眞理的，只有無產階級」這句話，錯了。他以爲剝削階級固然不能揭示歷史眞理，無產階級也不能揭示歷史眞理，能夠揭示歷史眞理的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的馬克思。這裏所謂「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當然不就等於無產階級，因爲如果就等於無產階級，那又不能揭示歷史的眞理了。因此，照劉先生的說法，能夠揭示歷史眞理的，豈是不剝削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中間階級？

劉先生所持的理由，是在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已經有無產階級存在，然而當時的無產階級並沒有揭示歷史眞理，一直要到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後無產階級才清楚地正確地認識了歷史。因此，他以爲單只說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這樣那樣，而沒有說無產階級有了馬克思主義以後才能這樣那樣，便是想把馬克思主義「解消於無產階級之中」。

是的，馬克思以前就有無產階級存在，而當時並沒有出現科學的社會主義，這是事實，但這並不能証明就是無產階級不能揭示歷史眞理。因爲無產階級不是一出生就能揭示歷史眞理，必須是這個階級已經有了階級意識的覺醒的時候，才能揭示歷史的眞理。而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之覺醒，又只有在資本主義發展達到了一定的階段，即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成爲它所包含的生產力的障碍的時候，才有可能。在馬克思以前，資本主義還在上升的階段，在當時雖然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也有矛盾，但當時的矛盾，還沒有達到非決裂不可的程度，因而當時的無產階級沒有清醒的階級意識，從而不能產生科學的社會主義，是當然的。

到馬克思的時代，跟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產階級已經壯大，並且已經形成了國際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據「共產黨宣言」上說：當時的共產主義，已被歐洲一切勢力，公認爲是一種勢力了，已經該向全世界公開說出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意圖並拿出自己的宣言來對抗那些關於共產主義怪影的神話了。不僅說出自己的觀點意圖，而且已經在巴黎公社的歷史事件中，第一次掌握了政權達兩月之久。馬克思主義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之下產生出來的。換言之，他是在無產階級鬥爭的基礎上，在全世界革命經驗與革命思潮的精確的總結和估計上，以及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產生的。總之，沒有革命的無產階級便沒有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是分不開的。

至於劉先生就心怕把馬克思主義消解在無產階級之中，這可以不必，難道我們還希望把馬克思主義放在無產階級之外嗎？

二　可不可以假設中國境內沒有少數民族？

劉先生對我的第二個批判，是說我在說到大漢族主義時沒有提到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關聯。他的理由是：「假使從已往到現在，中國境內只有漢族這一個民族，而其他少數民族都不處於中國境內，而處於中國境外的話，那我們今天研究中國史，就不用研究在我們中國境外的各少數民族的歷史了嗎？」因此，他以爲疏忽了他的這一假設，就是「用形式邏輯的分割的大刀」把中國歷史一下子劃死了。

在這裏，我要指出劉先生的這一假定是不能成立的。因爲歷史是具體性的科學，研究歷史必須根據具體的史實，具體的中國歷史，明明白白告訴我們在中國這個地理領域內，自古以來，就分佈着許多不同的種族，一直到現在，還是存着許多少數民族，怎麼能、而且爲甚麼要把這些本來已經存在而現在依然繼續存在的具體事實假定爲沒有呢？如果把歷史上「有的」都假定爲「沒有」，那麼任何眞理都可以推翻了。

是的，研究中國史要注意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關聯，關於這一點，我在一九四三年發表的「略論中國史研究」一文中，就談到這個問題，同時，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中國史綱」也曾經應用這個方法，雖然沒有應用得很好，但總是注意了這個問題。至於新建設所發表的那篇文章中，沒有談到這個問題，那是因爲我的論點是着重在批評大漢族主義的歷史觀點，即反對狹隘的種族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歷史觀點。在這個論點之下，沒有機會說到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關聯。如果要說到這個問題，那就是節外生枝，那就會鬆懈了我對主題的說明。

三　可不可以假設中國以往沒有淫靡無度的帝王將相？

劉先生對我的第三個批判，是以爲我說「社會經濟的結構是歷史的眞實基礎」，不甚妥當，雖然他也承認我曾經說過「唯物論者從來不忽視觀念形態對歷史的反作用」。又曾經說過「應該精細地研究統治階級代表人物的歷史，因爲只有從統治階級代表人物的歷史中，才能發掘出勞動人民的歷史」。但他仍然認爲我對個人在歷史上所引起的「嚴重作用和意義，」不夠強調。

爲了證明個人在歷史上所引起的嚴重作用，劉先生在這裏又作了一個假設。他說：「推之，以至於我們中國以往如沒有那些不想社會經濟如何發展，而只想破壞，只想淫

靡無度的許多封建帝王將相以及沒有民族間的相互掠奪而引起的征服反征服侵略反侵略的戰爭，就是有個別決定因素決定社會發展的遲緩，但也不致使中國封建經濟延緩在封建社會上這麼長」。因此，他以爲如果不強調個人在歷史上的「嚴重作用」「就不能明白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當然也談不到歷史學與革命的實踐相結合」，也就「流入客觀的宿命論的歷史觀上去了」。

在這裏，我首先要指出劉先生這一假定是非歷史主義的，因爲封建社會之所以爲封建社會，就是由於有劉先生所說的這一類「不想社會經濟如何發展，而只想破壞，只想淫靡無度的帝王將相」之存在，就是由於有「各民族間的相互掠奪而引起的征服反征服侵略反侵略的戰爭」。理由非常簡單，因是封建時代的帝王將相，他們不可能是社會主義者，必然爲了「淫靡無度」而剝削農民；同時他們也不可能是國際主義者，又必然要掠奪鄰人而互相侵略。假如這一類的帝王將相和相互掠奪的戰爭都不存在，那麼，非但封建社會可以縮短，而且根本就沒有封建社會了。

其次，我要指出：帝王將相以及相互掠奪的戰爭之存在於封建社會，是世界史上一般的現象，不是中國歷史的特點，因而不能引以爲中國封建社會遲滯的原因。試問那一個民族的封建社會歷史中沒有帝王將相沒有相互掠奪的戰爭？而且封建時代的帝王將相以及掠奪戰爭也不能一概都認爲是阻礙封建社會前進的。例如隋煬帝總算是一個「淫靡無度」的皇帝，但他發動人民開掘了一條運河，溝通了中國南北的交通，這條運河直到現在，還有經濟上的作用。又如漢武帝曾經發動遠征西域的戰爭，但在客觀上卻第一次溝通了中西的文化。這些，不但不阻止中國封建社會的前進，而且幫助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前進。

是的，我們研究中國歷史，應該細緻地分析歷史人物的作用，對於每一個足以特徵歷史時代的人物，都應該給以恰如其分的地位。（關於這一點，我在「略論中國史研究」一文中也曾經提出。）但我們不能忘記，個人對歷史所起的作用，還是要受着客觀條件制限的，不能爲所欲爲。

四　辯證唯物論是不是可以應用？

劉先生對我的第四個批判是認爲我在拙著中，不談方法的本體，只談方法的應用是不對的。他的意思是如果談到唯物辯證法，就只能談這個方法的本體，如論理學、認識論等等。假使不談方法論的本體而只談方法論的應用，在劉先生看來，那就是「庸俗唯物論，是機械論」，那他就「敢保不是辯證唯物論」、「敢保不是唯物辯證法」，而且他就以爲不如「直接提出要應用黑格爾的辯證法，」甚至就是「資產階級想要湮沒無產階級哲學的革命的本質的一種企圖而已」。

劉先生所持的理由，是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是一個有機結合的整體，不可分割。爲了說明這一點，他引了艾思奇先生所譯的「新哲學大綱」上的一段話：「馬克思雖然沒有留下論理學，却留下了『資本論』的論理學，並且可以充分利用它去應付當前發生的問題。在『資本論』中，論理學辯證法及認識論是當作同一個科學來應用的」。

在這裏，我首先要指出劉先生引用的一段話，並不能作爲馬克思禁止應用唯物辯證法的理據，恰恰相反，這段話是說馬克思就沒有留下一本類似哲學大綱的書，即專談論理學辯證法及認識論的書，他的理論學，辯證法及認識論是留在他所著的『資本論』一書之中。這就是說，馬克思並不是一談到方法論，就是連篇累牘的論理學認識論一套教條、公式，而是把他所創立的唯物辯證法應用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分析。

至於說，一談到方法的應用，就是資產階級想湮沒無產階級哲學的革命的本質的企圖，那也許是劉先生的過慮。我想資產階級如果眞想湮沒無產階級哲學的革命的本質，他決不會把無產階級的哲學從理論提高到應用的階段，而是希望唯物辯證法永遠停止在教條主義。

關於學習唯物辯證法，究竟是爲了空談教條，還是爲了應用。毛主席在他的整風文獻上說得非常透澈，用不着爭論。

五　矛盾是固定的、孤立的，還是變動的、相互影響的？

劉先生對我的第五個批判，是以爲我說的「階級矛盾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斷的變化中發展」這樣的說法不大妥當。

劉先生對矛盾的看法是這樣的；

「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敵對階級間的矛盾是敵對階級間的矛盾，而種族間的矛盾又只是種族間的矛盾。

「敵對階級間的矛盾，不是由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所引發，而種族間的矛盾又更不是由敵對階級間的矛盾所轉化。

「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是該統治階級在形成或團結成爲該階級時就有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而敵對階級間的矛盾，是該階級社會在形成的同時就有這敵對階級間的矛盾，至於種族間的矛盾，又是該時各種族間所素有。」

總括劉先生的意見，各種矛盾都是孤立的，彼此絕緣的。而且是固定不變，沒有發展，也不相互影響的。因而他就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即「誰也不能轉化誰，誰也不能決定誰」。

矛盾是不是誰也不能決定誰呢？照我的看法是可以的。因爲一般地說來，在階級社會中，敵對階級間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如在奴隸社會，奴隸階級與奴隸主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在封建社會，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這種主要的矛盾，是決定一切矛盾的矛盾。

矛盾是不是誰也不能引發誰呢？照我的看法，是可以的。因爲矛盾與矛盾之間，並沒有一堵高牆隔着，而是相互交錯，相互關聯，一種矛盾的決裂就會影響或牽動其他的矛盾。劉先生也承認：「由於八王之亂對於社會存在社會經濟的影響，因而使敵對階級間的矛盾更尖銳化起來，終而演成敵對階級間的公開鬥爭的所謂流人襲動」。同時

中國山水畫的發展和成就

楊竹民

——與徐悲鴻先生討論中國美術遺產問題——

「新建設」第三卷第三期上刊載着一篇徐悲鴻先生的美術遺產漫談——一部分中國花鳥畫。我讀了這篇文章之後，對於徐先生的看法，有幾點不同意的地方；現在把我的意見寫出來，與徐先生試作討論。我對於中國美術只有一點片斷常識，所以寫出來的這篇東西，理論之膚淺不正確和不周至的地方，一定很多，倘望徐先生予以指正。

徐先生的文章開頭說：「繪畫亦古人在創製文化上勞動之收穫，中國於此，成績特著；但其造詣，確爲古今世界上佔第一位者，首推花鳥……」我認爲中國畫的成就（即徐先生說的造詣），不一定首推花鳥，而山水畫的成就，也不在花鳥畫之下。我說這個問題，自然不敢「妄加軒輊」，也不敢貿然作批判；只客觀地說明這個事實而已。中國主要的繪畫，發展爲自然主義的，是唐代以後的事，我覺得中國美術並不照徐先生所說的「無疑，幾乎全是自然主義，」（這問題留在下面討論）；而山水和花鳥畫，當然是屬於自然主義的，這兩種畫也都是從唐到宋才成熟壯大起來，各有成就，難較上下。徐先生說花鳥畫在北宋爲達最高峯，當然是對的，但山水畫也是在宋代爲達最高峯的。徐先生推花鳥畫「確爲古今世界上古第一位者」的理由，在文章裏沒有詳盡的說明，只在最後說：「現代世人擅飛禽者……但俱未能突破宋人紀錄，不比山水讓位于 Constable Turner 及印象主義作家……」我覺得這樣並不足以確定它們的地位，所以有加以討論的必要。

中國山水畫和花鳥畫，都是自唐、五代、到宋發展到這最高峯，而自元以後就走向衰落的道路。徐先生對於花鳥畫發展盛衰的看法，我全同意。同時，我所指的成就部分，也以宋代作品爲標準。（徐先生所指的一部分花鳥畫，也當然是指北宋諸家的作品。）他的發展過程，自然是以社會發展爲基礎。我們要討論它的發展和成就，就同時得顧及社會發展的因素。中國藝術和其他文化一樣的，起初完全是由勞動人民所創製的；到社會發展產生階級之後，就和其他生產品一樣底漸漸的爲剝削階級佔有起來。經過奴隸制度到封建制度時期，就爲統治階級完全佔有，並向上發展起來；但創作力起初還是掌握在勞動人民手裏，不過他們是服務於剝削統治階級而創作的。所以流傳到今天的美術遺產，幾乎全是在封建統治之下發展而成的東西。以繪畫來說，所有製作在前一段時期（大約唐以前）還大部分是勞動人民（畫工）所創製的；通過唐代，士大夫階級大量參加創作，並在創作方面起了領導作用，自唐到宋又把山水和花鳥畫發展爲繪畫的主要部門；自此，中國繪畫也就和廣大勞動人民隔閡加深，而大部分的製作，就出自於統治階級士大夫的手裏了。這樣，由唐、五代、到宋，一方面唐宋兩代都有相當長的承平時期；另一方面兩代的文化都盛，作家們在這種條件之下，得以精心創作，而他們的創作態度，也非常認眞嚴肅，不論山水和花鳥，經過這樣一個時期的充分發展，所以在宋代就都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在中國文化上造成燦爛的成就。同時，因爲與廣大人民脫節的關係，也就給它埋伏下衰落的根源。到了清代就靡弱不可復振，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們不能以此而抹煞古人所創製的文化收穫。這是我對於中國繪畫在中國社會發展基礎上發展情形的大致看法。

我們基於這種看法，進一步再看山水畫的發展因素和發展情形。山水畫是道地的自然主義的產物。因此，我們要分析它的發展因素，就得從自然主義來說起。說到自然主義，我不同意徐先生「中國美術，無疑，幾乎全是自然主義」的說法，在這裏有順帶討論一下的必要。中國大部分的屬於宗教的雕塑和建築美術，是不屬於自然主義的，固不必論；以繪畫而言，我認爲是從唐代起才把主要部門發展而成自

劉先生也承認西晉末種族間的矛盾，「是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公開鬥爭的八王相攻，貪一時便宜借外力進行內戰的利用所起引」。是的，在劉先生看來，那些被引發矛盾，原來是存在的，不過由隱伏的鬥爭變成公開的鬥爭而已，但是他爲甚麼會由隱伏而變成公開呢？這就是受了別種矛盾的影響，被別種矛盾所引發。

矛盾是不是誰也不能轉化誰呢？照我的看法是可以的。例如當農民戰爭爆發，敵對階級間的矛盾激化時，統治階級內部即使有矛盾，爲了鎭壓共同的階級敵人也往往獲得暫時的妥協，甚至不惜與外族妥協，假借外族的力量剿滅農民。又如當蠻族入侵，種族矛盾激化時，敵對階級間即使有矛盾，這種矛盾也往往在種族國家的危機之前，退到次要的地位，而使矛盾轉向種族間的鬥爭。像這樣從一種矛盾鬥爭轉化爲另一種矛盾鬥爭的例子，在中國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

總之，不論階級矛盾或種族矛盾都是變動的，因爲階級矛盾是反映階級關係，種族矛盾是反映種族關係，歷史上沒有不變的階級關係，也沒有不變的種族關係，因而，也就沒有不變的階級矛盾和不變的種族矛盾。同時，不論是階級矛盾或種族矛盾都是相互交錯，相互影響的。因爲，不論階級與階級間或種族與種族間，都不能孤立的存在，例如：在南北朝時代的北朝，種族矛盾與階級矛盾混在一起，從種族方面看，漢人與鮮卑人有矛盾，從階級方面看，漢族和鮮卑族的農民，對鮮卑族及漢族的地主階級有矛盾，怎麼能把階級矛盾和種族矛盾截然劃開呢？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本社啓事

本社所領北京市軍管會報紙雜誌通訊社臨時登記證新字第五〇號不愼遺失。除呈請補發外，特此聲明。

然主義的，就是唐以後的繪畫，也不能說完全是自然主義的，我拿徐先生的話來證明：

「……獨吾國北宋，承唐代文化之盛，……至於繪畫，藉百餘年之承平，服務宗教之外，于花鳥一門特臻其極。……」

可見，宋代還有服務宗教的繪畫，而這種繪畫，應當是指釋道畫而言。釋家人物故事畫，不能說是自然主義的。服務於道家的繪畫，也不能以自然主義包括之，因爲自然主義不過是擷取老莊思想中的自然觀念而已，老莊思想不具宗教的意識形態；而所謂道教，則爲具有宗教意識形態的黃老道教。我們再從唐代追溯上去，隋代的繪畫，是以宗教及歷史風俗故事畫爲主，其次是界畫臺閣，都不能說是自然主義的。再追溯上去是六朝、晉、魏，這些朝代的繪畫，更是以宗教及歷史故事畫爲主，也不能說是自然主義的。各家畫史都有明白的記載，不須再我旁證。至於漢代的繪畫雖還沒有服務於宗教；可是，與當時的政敎相結合的，而以經史故事畫爲主。我們引幾段記載來看：

「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後漢書蔡邕傳

「漢明帝雅好圖畫，別立畫官，詔博洽之士班固、賈逵輩，取諸經史事命尚方畫工圖畫。」——歷代名畫記

「成都學，有周公禮殿，云漢獻帝時立，高眹所作文翁石室在焉，益州刺史張收畫盤古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於壁間。」

——玉海

至於明光殿的圖古烈士，麒麟閣的畫功臣像等記載都可爲證。再證以存於現在的山東武梁祠孝山堂等石刻畫，這些畫大部份爲歷史故事，或死者生前事蹟，和書上記載的相同。可見當時是以經史故事畫爲主。魯迅曾說：

我想，唐以前的眞蹟，我們無從目覩作，但還能知道大抵以故事爲題材。

——且介亭雜文：「論舊形式的採用」

這是很明確的，以故事爲題材的畫，都不一定是自然主義的。

爲什麽唐以後的主要繪畫是自然主義的？我想由於士大夫統治階級領導創作是主要原因。也可以說，士大夫把繪畫領導上自然主義的道路以後，這種繪畫又發展爲中國的主要繪畫。爲什麽士大夫會把繪畫領導上自然主義的道路？這裏不擬詳加闡述，只約略說明一下：自然主義是出於道家思想；而道家思想支配一部分士大夫的思想，可以說是自漢代就開始的。漢武帝雖然能黜百家定儒家一尊思想；但實際上儒家思想並不能完全桎梏了朝野士大夫的思想。因此終漢之世，仍有「異端」之學。這「異端」之學，大抵是發揚道家思想的。到魏晉之世，玄學之風大倡，而老莊思想也更進一步地支配了士大夫階級的思想。從晉到南北朝，以老莊思想爲本的自然主義，就先通道士大夫階級，侵入文學的領域。陶淵明、謝靈運的田園山水詩，就是前後產生在這個時代。隋唐之世，雖然玄學之風衰息了；但其遺風所及，老莊思想深深地留存在士大夫階級裏，「魏晉風流」和「晉代衣冠」，都成了後來士大夫們崇仰的典型，這種風氣尤其在愛好文藝的士大夫們中間，更爲濃厚。（我覺得儒家思想最枯燥缺乏藝術風趣，所以歷來的所謂純儒，簡直沒有作畫的。）而這時的士大夫們不但大寫詩篇；同時作畫的風氣也盛行起來。因此，就在創作方面起了領導作用。山水畫南北宗（董其昌的主觀分析）的領導人，一爲士大夫階級的王維，一爲宗室李思訓，其後花鳥畫的代表作家邊鸞也是個士大夫階級。這些士大夫們，又把以老莊思想爲本的自然主義，發展到繪畫裏來。而我國自然景物之優點，和「自然物之豐富」，也是給自然主義作家們發展的良好條件。因此繪畫就走上自然主義的道路；並且和自然主義的文學——詩——合流爲一體（不僅在思想內容上，並在意境表現上）。而形成中國畫的一種特色。（雖然西洋人也有詩畫合一之說，如希臘詩人西蒙尼台斯 (Simonides of Ceos) 說過「畫爲不語詩，詩爲無言畫。」及羅馬詩人霍瑞斯 (Horace) 所謂「即詩即畫」等，但所指爲具體事物的描寫，不是中國的意境表現。——見錢鍾書：「中國詩與中國畫」。）繪畫走上自然主義的道路之後，它的題材，就儘量地向着自然界方面擴張，最重要的對象，當然是山水。（也先發展了山水。）其次是花鳥，（發展也較後）此外爲一部分人物畫，(不甚發達)這原因也許是花鳥人物不及山水屬於自然的範圍領域之廣大；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些自然主義的作家們的創作目的，大半是抒情的，要藉自然物象來作胸臆的發抒。因此，在表現方法上，不重客觀的描畫；而爲主觀的抒寫。這就更進一步建立了中國畫的寫意方法。（中國畫法雖然有工筆寫意的區別；但嚴格說來，只是手法上的區別，其表現方法則都屬於寫意的。）適合這種表現方法的對象，自然是花鳥人物不及山水，因爲山水比較（不是絕對）地可以不受物形的拘束，更適合於主觀的抒寫。故在自然主義的繪畫當中，以山水畫最爲發達，自五代末到兩宋，傑出的作家輩出，如荆浩、關仝、董源、釋巨然、范寬、郭熙、李成、燕文貴、許道寧、劉松年、李唐、馬遠、夏圭等，俱各臻絕詣。徐先生說「于花鳥一門，特臻其極，」我認爲並不一定。

其次，我們再看山水畫的成就在藝術上的價値。我前面所說的主觀寫意的表現方法，它的素材完全取之於客觀的現實世界，是完全合於藝術表現理論的。雖然花鳥畫的表現方法，也同樣合乎藝術表現理論；但因爲上述比較不受物形拘束的原因，山水卻又比之更高一籌。我們看一看中國山水畫，不但一山一水一樹一石全不對照實物來描寫；就是全幅整個的位置結構，也沒有不從作者意象而出。卻又無不合乎自然造物的形態和性質，這就是掌握着客觀現實的本質、必然性、一般性的原因，同時，也就說明了所謂寫意，並不是根據脫離現實的主觀幻想；而是必須對客觀現實先已有了眞確的認識（所謂「成竹在胸」），然後才能有這樣成功的表現，所以，好的作品，才能具「咫尺千里」之勢，和「引人入勝」之妙的。這種表現方法，說是「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是非常正確的。至於山水畫的表現手法也是高妙無比的，無論怎樣繁複的巨製，除了遠山和雲邊水際略施面的烘托外；其餘全用點線積累而成(南宋馬夏是參用面的)。徐先生說，米氏父子開始用「點」寫水山，也不盡然。米氏用點的方法，是學自遠在五代末的董源的，不過米氏父子擴大點的運用而已。其畫面然

點線積累的方法，又是由一種小的單純的定式，如山石皴法及樹葉點等幾乎等於符號的一種東西，結合而成。雖然是一幅山重水複的巨製，但在用筆（點線）方面却是毫不紊亂；而又是變化無窮的。不獨各家有各家的面目；而同一作家，也往往有不同的變化。又不論如何變化，都能保持着一種和諧的韻律。這種手法，眞可以說達到古今中外表現手法的最高峯，而爲舉世無匹的。從這幾方面看來，我認爲山水畫的成就，是不在花鳥畫之下的。這種獨特的表現方法和手法，再加上前面所說的詩畫一體的特色，就形成中國山水畫特有的形式（民族形式）。也就是中國山水畫和西洋風景畫基本上不同的地方，由於這種基本上的不同，和所用的工具材料的特殊，我認爲中國畫和西洋畫是很難比較優劣高下的。誠如徐先生所說：「彼之所長，我還不及，而我之所長，彼亦不逮。」所以把山水畫讓位於 Constable Turner 及印象主義作家的說法，也不能說十分正確；更不能以之貶損中國山水畫的價值。在今天也絕不能不承認山水畫確爲我國美術寶貴遺產的一部分。

我在前面說過，中國繪畫經士大夫領導創作發展爲自然主義的之後，一方面給中國文化造下輝煌的成就；又一方面也給它埋伏下衰落的根源。這在山水畫方面表現得更爲顯著。山水畫到了元朝，因爲當時的漢族士大夫不堪異族統治者的殘暴壓迫，爲求避世逃名起見，對於繪畫的表現手法，取了消極態度（以生拙取勝）。同時，又因爲過分偏於抒情的關係，表現方法也達到極端的主觀，漸漸脫離了客觀現實。在倪雲林「只寫胸中逸氣」的口號之下，幾乎完全不顧客觀現實了，因此，以後就流爲人造山水。明朝浙派諸家雖然振作了一下，也沒有多大成就。明末董其昌南北宗之說成立，又專提倡清淡的南宗山水，這又把山水的衰運加深一層。到了清朝，作者專在筆墨形式上用功夫，創作少而臨摹多，陳陳相因，輾轉傳鈔，不但風格上沒有創發；就是結構佈景也都落了老套。離開現實世界愈遠，就成了千篇一律，索然寡味的八股山水了。但這時山水（南宗）仍然佔據主要位置，這有兩種原因：一爲這種脫離現實的山水畫，最適合於士大夫們不認眞創作，隨意揮灑的惰性；一爲仍是士大夫領導創作，他們受董其昌的影響，都存有南宗山水爲文人畫正宗的觀念，所以大畫其山水；而山水畫格也愈靡弱不振。我想這也許就是徐先生所說的「惜乎近代中國審美目光短視，偏重山水，而遺其他」的主要原因。這種衰落現象，正象徵着中國封建社會的沒落，沒落的封建統治階級所領導創作的美術，必偕同封建治度一同沒落。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起了變化，畫壇也隨之而起變化。山水畫的地位動搖，寫意花鳥；大有起而代之之勢；但稍縱即逝，爲時甚暫。從這時起，中國繪畫的發展和社會發展關係更加密切而明顯，這問題不屬本文討論範圍，不加闡述。但不論山水花鳥，它們都沒落了，其基本原因，就是和廣大人民絕緣的關係。

我寫完上面這段之後，就可以宣告結束；但因爲徐先生的文章裏曾約略提到中國繪畫今後應走的路線，因此，我接着寫下去，再把這問題附帶討論一下。徐先生說：

「……因此，我們現在既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實現『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最明顯的如『耕者有其田』，我們處於這樣的環境，似應有這樣反映的美術；自然環境，仍同古人所處，亦應當擷取其收穫，豐富我們的新美術！」

這段話頗爲模稜、籠統。我們現在不僅在實現「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和「耕者有其田」；並已熱烈地展開生產建設，和抗美援朝運動。「我們處于這樣的環境」有這，我認爲（也是大家公認的）就毫無疑義地「應當」有這樣反映的美術，不必說什麼「似應有」模稜可否的話。至於「自然環境，仍同古人所處，亦應當擷取其收穫，豐富我們的新美術！」這句話的口氣，倒頗有提倡花鳥畫的意思。我想大可不必。第一、不論山水或花鳥，它不能給人以革命、進取、振奮、向上的啓發；不能作目前人民情緒的反映。第二、欣賞者範圍狹窄，大多數的勞動人民不能充分賞會，不合於普及方針。第三、雖然「自然環境仍同古人所處」；但社會環境和人民生活却和古人完全不同。具體說來，就是大多數人民都還沒有優閒來玩賞這些豐富的自然物。就是將來有優閒玩賞的話；花鳥畫的格調也須改變，復古照抄是不行的。至於擷取古人之收穫，是應當的，但這只有少數有基礎的專家來努力；不必提倡大家來從事的。今天大家應當遵循魯迅的指示，來充分發展人物故事畫，來作新政治新經濟的反映。但不是率然地抄襲西洋美術就算了事；必須充分地採用並發展民族形式，使它眞正成爲新的中國繪畫。還有保存在今天的古人的製作，則應當公開展覽，並加以複製，讓人民大衆隨時觀覽，使人民認識祖國文化，從而啓發愛祖國、愛民族、愛藝術的情緒，這是相當必要的。

一九五一、一月十八日於重慶

答楊竹民先生

徐悲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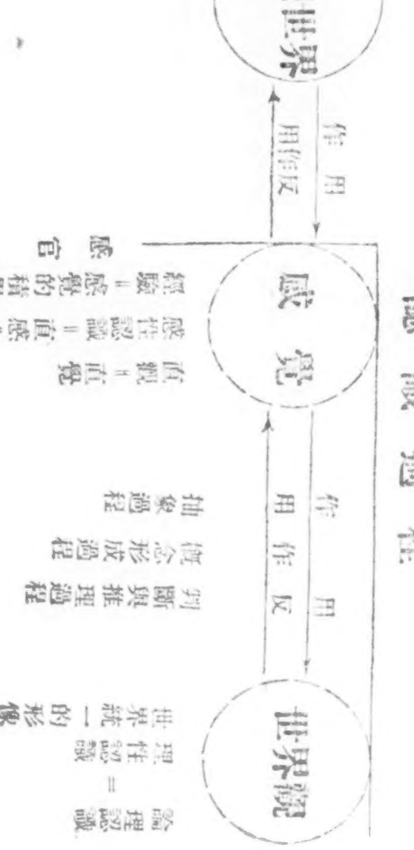
我的漫談遺產推重花鳥一文，得到楊竹民先生的反應，所謂拋磚引玉，實在感覺榮幸；我題出些遺產問題，希望得到大家來討論；我因百忙，不能爲有系統的文章，所以採取了漫談形式，楊先生對于中國山水畫的發展和成就的看法，我認爲大致是正確的，我已發表過「漫談山水畫」（新建設第一卷第十二期）意見相差，並不太多，不過無楊先生文中之博引而已；但有一點，是不相同的，楊先生之論據，多取之于理論，我之論據，多徵之于現存作品；好的理論，自然也是遺產，但可能如藥品廣告，中國山水畫理論，當然有過好藝，可惜難于再製；因爲它不但需要天才及自然環境，還須社會環境，所以只能當它一去不復返的東西了；現世所存之北宋山水畫，可以尚及百幅，但合乎理論標準的，不及十之一；（此固無妨，那怕只剩半幅）米芾點法，我認爲與近代印象主義理論相合，並不斷定前此畫家不用點，但因其與技法進步無關，比之舉宋詞不能說以前遂無長短句，楊先生竟以爲我不當拿 Con-

sta'le, Turner 來比中國畫（請楊先生見宥），但此是事實問題，我一定堅持的，同類的東西，爲能禁人不比；況且凡有造詣之作品，都可以在造詣上，計其程度；我曾經用印度蘋果，比廣東荔枝之甘美，（用洞庭東山枇杷）更不相稱。我並且希望中國學者，千萬不要以爲我們中國的好東西，定是世界他處所沒有的那樣的看法，中國山水畫之高明處，所謂意境，歐洲十九世紀前是不存在的，（單指風景畫）但孔司太白，吞納兩人，就做到；吞納不但做到，並加光大。如果楊先生看過方雨樓藏之郭忠恕岳陽樓圖及金冬心風雨歸舟那種氣象萬千漂渺空靈的境界，自然會驚嘆吞納作品之高逸（藏英倫Tate畫廊有百幅）一定會感到東西古今人才智之不相殊，幸而有此兩幅，可爲中國山水理法論之左證，否則吞納大名，將前無古人—他自己却崇拜十七紀風景畫家羅朗 C'aud Lorrent（所以要在中國古山水畫家中取一人與吞納比擬，還是很難，因爲不可能有傑作百幅存在一人的古之大山水畫家，這是吞納之幸運，我自信絕對不是洋奴心理！）（如有人以爲王石谷東西多，那眞不瓦礫之比珠玉！）所以，從十九世起，歐洲風景畫，便達到有韻律的道途，不像董其昌懶漢，專創作人造自來山水，推師低能，故山水一向爲人所重視，而花鳥則一向爲人所忽視，但二者之在世界藝壇之貢獻，可能有人不知，吾故分別論之，舉出事實，所謂知人論世，楊先生僅單指我這一篇，似乎近于斷章取義，況且我絕無意要恢復中國古代花鳥畫，我推重花鳥爲遺產，具體的說，我們現在畫的農民生活的畫中有一隻雞，可能如木雞，但我國古人已不畫木雞，一幅好畫，中有一隻木雞儘管在畫中次要地位便不美滿；至于楊先生文中後段的責備，我不想在此處借題發揮，因爲楊先生全不了解我的美術主張（請楊先生原諒），我們已昭告天下，遵照毛主席文藝方針，並實施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果如照楊先生所說，那我們做些什麼呢！至于自然主義，乃是一個外國名詞Naturalisme它不同古典，浪漫，寫實等有積極精神的宗派，而含有惰性的作風；楊先生所歷舉的幾種，能不能與以古典主義名稱？恐怕比自然主義更不妥當；這又好比歐洲從羅馬時代洞窟藝術發展而來的概稱之基督教藝術一樣，像復興時代之賴飛羅，他且寫過不朽傑作雅典派（教皇宮大壁畫之一）與基督無一些關係，但賴飛羅亦被包括在基督教藝術中；歐洲並無道家思想統治，我以爲無爲就是懶惰！缺乏鬥爭精神！

結論：中國繪畫，雖是自然主義，但花鳥畫，保有寫實精神爲多，故凡北宋之花鳥，幾乎一半是好的作品，但北宋人之山水，只有寫實工力好的文人，方能產出少量好的作品！（如巨然可能寫出傑作，但現世無一幅傑作，）（范中立溪山行旅，我雖舉之爲今日中國山水畫中第一，但其他作品，佳者不多，）因爲有寫實工夫，方做得到空而能靈，否則便成空虛，所以祇要保持寫實精神，可不必問時代！如明周東邨北溟圖，任何郭熙幅，都不及，冬心且是十八世紀人，此指山水，若花鳥，則呂紀、陸治、汪海雲、陳洪綬，皆有傑作，人物畫雖非中國絕詣，但寫像之傑作亦不少，最著者，如宋太祖趙匡胤像，可比之世界任何高妙美術品人像，所以我們有傳統，亦有遺產，倘好好接合社會主義，則民族的中國美術，將有偉大貢獻與世界！

（附言）花鳥畫的副作用，能改善工藝美術；山水畫于此適相反。（我曾在十年前著論提到，忘在何時何種刊物發表。）

（上接15頁）他們在下了這個判斷之後，如果當時他們眞有團結救國的決心，就能夠引出這樣的結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能夠成功的』。像這樣造概念，下判斷、進行推理的階段，是認識過程中更重要的階段，也就是理性認識或論理認識的階段。『認識的眞正任務在於經過感覺果到達於思惟』，引出論理的結論，付之實踐。例如毛澤東同志認識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首先了解了這一社會的內部矛盾，指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是革命的對象，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階級。必須結成以工人階級爲領導、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革命統一戰線，去戰勝那三大敵人。他又指出中國人民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走向社會主義，必須經過人民民主專政的階段，即指出這一社會的發展規律。同時他還指出中國人民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份，說明這兩個革命過程的本質的內部關係。照這樣，他創造了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理論，作爲中國革命的指針。這是從感性認識發展到理性認識的輝煌範例。所以我們對於周圍世界事物的認識，必須從感性的階段推移到理性的階段，從感覺上所反映的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的聯繫，轉變爲在理性上所反映的事物之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繫，暴露那些事物的內在矛盾，『因而就能在周圍世界的總體上，在周圍世界一切方面的內部聯繫上去把握周圍世界的發展』。（未完）



新編「哲學史」

第五章 巴黎公社後（一八七一——一八九五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發展（一續）

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
王子野 譯

化。

在馬克思主義底這個重要的時期，歷史唯物論底根本原則繼續着進一步的創立和具體化。

三 歷史唯物論進一步的發展

恩格斯對於人如何從有生界分離出來這個問題底研究，他對於階級和國家底產生、法律和宗教底產生和發展底研究用新的內容豐富了歷史唯物論底原則。恩格斯確定了『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底積極作用和揭發了它同社會生活物質基礎底相互作用底機械論。

在一八七六年寫作的『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一文內，恩格斯指出說，勞動、勞動工具底製造和使用對於人和人類社會底形成有着決定的意義。

高度發展的類人猿所處的自然條件和適應這些條件底必要性規定了這些猿底前肢底機能底改變。猿逐漸地學會了直立，這是從猿到人底轉變過程中的決定的一步。解放了的前肢變成了勞動新器官，且由於獲得的勞動的習慣和越來越複雜的勞動的活動，形成中的手才能日臻完善。『因此，手不僅是勞動底器官，它並且還是它的產物。』㊀

在勞動過程中形成起來的人類逐漸獲得了有音節的語言底能力。而勞動和有音節的語言便成了主要的因素，在它的影響之下猿底腦子逐漸轉變爲人的腦子。隨着腦子底進一步的發展，它的隣接的器官——感覺器官也發展起來了。斯大林同志發展恩格斯底這些原則時寫道：『假使猿經常靠四肢走路，假使它不能直起脊背，那末它的後裔——人——便不能自由使用自己的輕巧的聲帶，因此使不能使用語言，這就在根本上阻滯了它的意識底發展。』㊁如上所說，直立是勞動底產物，因此，勞動過程是人底解剖形態的和生物學的特點底發展基礎，是人之區別於動物底基礎。

但是勞動創造了不僅是人類的個體：它還創造了人類社會，它是同自然界裏碰到的動物羣的各種形態有所區別的，因爲後者不能使生物越出利用外界自然底界限，而人類社會却能强迫自然服務於人類底目的。』這是人與其餘動物同最後的本質的區別，而由於這種區別，人還得感謝勞動。』㊂

恩格斯又指出說，人類生活底原始社會的組織，其特徵是非對抗的關係，和其後的對抗的社會關係底產生乃是由生產發展中的一定的過程所規定的。

在一八八四年寫作的『家族、私有財產和國家底起源』一書中，恩格斯運用歷史唯物論來分析古代歷史底某些最重要的現象，並對它作了科學的說明。由於這個，唯物論又在一個領域內取得了對唯心論的勝利，在那個領域內眞正的歷史事實是僞造出來的，以便歌頌資產階級的秩序，以便用『自然的』、不變的材料來把這些秩序寫成永久如此的。資產階級的家庭、資本主義的私有、資產階級的國家——所有這一切都被描寫成爲『永久的』機構，似乎它在歷史上是經常都存在的。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底產生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恩格斯在它的著作中所發展的理論，最終地粉碎了和埋葬了資產階級僞科學底這些敎條。

依據着美國人種誌專家路易士·摩爾根底材料，依據着自己的發見和俄國學者瑪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關於斯拉夫的『大家族制』底研究，恩格斯指出：在古代社會歷史底基礎上擺着親屬的組織，那是在婚姻形態長期進化過程中形成起來的。

羣婚是古代的婚姻形態，在這種婚姻形態之下一羣男子和一羣女子彼此互相依屬。『但是由此決不能得出結論，——恩格斯附加說明，——說雜亂無秩序的性交在每日的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時的個別的對偶底結合並非沒有，如現在在大多數場合甚至在羣婚中也還可以見到。』㊃

從無規律性交底這種古代狀態中很早就發展出所謂血緣家族。家族進化底這個第一階段，其特徵是在於人底不同的世代從婚姻圈子裏排除了出來。

家族進化底下一階段是所謂普那路安家族（此名出自夏威夷的親屬關係底用語，Punalua意爲共同體，同儕）。它是由血緣家族中經過逐漸禁止親兄弟和親姊妹結婚而產生出來的。從這種普那路安的家族中在大多數場合都會產生氏族。氏族，這是同胞親族底羣，

㊀馬恩選集第二卷第七二頁。一九四八年版。
㊁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三一三頁。
㊂馬恩選集第二卷第七九頁。
㊃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和國家底起源』第三五頁。

其成員彼此之間已無權結婚，並且氏族是從曹那路安家族底母系形成起來的。

在氏族中婦女佔着高級的地位。親母底優先的承認，因爲不可能確實知道親父，這就意味着對於婦女、對於母性底高度的尊敬。

婦女底高級地位底眞實基礎是她在生產中的作用。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著作「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裏寫道：「曾經有過母權制底時代，那時婦女被認爲生產底主人。這用什麼來解釋呢？這是由於在那時的生產中，在原始的農業中，婦女在生產中起着主要的作用，當男子到樹林裏去獵取野獸的時候，她們担任了主要的職務。父權制時代到來了，那時生產中的統治地位便轉入男性之手。爲什麼發生這個變化呢？因爲在當時的生產中，畜牧經濟中，那裏主要的生產工具是投鎗、繩索、弓和箭，男子起了主要的作用……」㊀，父權制家族是已經確立的男性統治底第一種形態。它佔着中間的位置：在它以前是對偶家族；在它以後是一夫一妻制。

由於婚姻關係長期進化底結果，如恩格斯所說，便產生出個人的一夫一妻制，依據對抗的社會底歷史地發展着的關係而採取了各種不同的形態。在私有財產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一夫一妻制的家族帶着最明顯的經濟的契約底輪廓，特別是在資產階級統治底世紀和在他們中間。「它是建立在男子統治權之上，這種統治權是以生育子女爲明確的目的，子女生育之屬於父親是無可懷疑的，而生育底這種無可爭議之所以必要，是由於子女從作爲直接的遺產繼承者之時起就應當出來掌管父親底財產。」㊁

在考察婚姻關係底進化時，恩格斯把每一個新的家族形態同社會生產發展底相適應的階段聯系起來，指出說，家族和婚姻形態底改變主要決定於生活資料底取得方式底改變，而向一夫一妻制底過渡是完全由經濟原因所決定的。可是恩格斯在自己著作底第一版底前言中對家族關係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却作了不正確的規定。那裏寫道：「按照唯物論的理解，歷史上決定的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的生活底生產和再生產。而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底生產，衣食住底物品及爲此所必需的工具底生產，另一方面是人類本身底生產，種族底繁殖。某一歷史時代和某一國家底人所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秩序是受兩種生產制約着的：一方面是勞動底發展程度，另一方面是家族底發展程度。」㊂

斯大林同志第一次指出這個概括是錯誤的。

其不正確之點，就在於家族形式底更換被恩格斯看作是社會發展底決定的原因，然而按照歷史唯物論只存在着社會發展底一種決定的基礎，這就是：物質財富底生產方式。

從恩格斯底研究中明白可以看出，氏族的原始共產主義的組織是特定的生活資料取得方式底產物，是社會生產力特定的狀況底產物，它是古代歷史底基礎，一切民族在他們的生活底原始時期都經過了這個階段。

後來氏族底原始的共有秩序崩潰了，這又是生產發展底結果。當人們開始馴養動物和繁殖動物羣的時候，就造成了前所未見的財富底泉源和產生了新的社會關係。這種新的勞動部門允許生產更多的生存所需的資料，而在遊牧的種族就造成了交換自己一部份生產物底條件。開始時種族之間底交換是在族長主持之下進行的，因爲動物羣是由種族和氏族所共有的。

跟着畜牧業底產生，牧草場底經營和飼料底播種也產生了，它開始是由飼養家畜底需要所引起的。生產更加多樣化了：除畜牧之外，它現在還包括農業在內。往後完成了過渡到利用鐵。這個過渡促進了生產底新的增漲和引起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進一步的交換底擴大是勞動底這個新的分工底結果。

勞動底分工和交換開始只在種族之間進行，自從社會勞動愈益專門化之時起，便侵入了種族和氏族底內部。這時，在氏族成員間勞動分工底這個基礎上產生了私有財產。列寧在自己的著作「什麼是『人民之友』和他們怎樣反對社會民主黨人？」發展了恩格斯底原理：「當原始印第安公社底全體社員還共同製造他們自己必需的一切產品的時候，私有制也是不能發生的。當分工制侵入公社，而其社員已經各自單獨來生產某一種產品，並把這種產品拿到市場上出賣的時候，於是表示各商品生產者這種在物質上各自分立現象的私有制度就出現了。」㊃

動物羣以前是由種族和氏族所共有，以後逐漸過渡爲各自分立的財產。開墾過的土地還繼續停留於種族底財產，而這時對動物羣已經存在着私有財產。但是逐漸地土地也脫離了種族底所有而開始讓渡給氏族使用，以後讓渡給大家族，最後讓渡給個人，這些人獲得了領有土地的某種權力。

在已經產生的私有財產和發展着的交換底基礎上，由於市場底自發底動作，一部份人便有可能變富，另一部份人便有可能破產。於是出現了一羣失去生產資料的人，財富積聚和集中到爲數不大的階級底手裏，同時羣衆底貧困增加了和窮人底數目增加了。與自由人之劃分爲情況不同的階級同時，奴隸制就形成起來和發展起來了。戰俘以前是被殺死的，現在由於勞動生產率底增長而使人底勞動力有可能生產出多於維持其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生產品，因此就讓他們活着並使他們變成奴隸，他們的强制勞動作成了生產進一步發展底基礎。這樣一來，社會便劃分爲兩個階級：統治者和奴隸，搾取者和被搾取者。

恩格斯所發展的對階級底產生底歷史唯物論的解釋，使得對國家底產生問題可能作出科學的解答。對國家底產生問題恩格斯曾以三個國家（雅典、古羅馬和德意志）底產生底實例來考察。這三個國家中每一個底產生都不表現爲完全同一的圖景。

分析了雅典國家產生底歷史之後，恩格斯指出：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已形成的基礎上對抗的階級是怎樣形成起來的，搾取者對被搾取者的壓迫怎樣引起特別的武裝力量底產生，它已不同於人民底自動的武裝組織，如在公社的氏族制中所常見那樣的。再者國家底產生

㊀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三四〇頁。

㊁恩格斯：「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底起源」第六二頁。

㊂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和國家底起源」，第四頁。

㊃列寧全集第一卷第一三六頁。

即是意味着人口依照氏族和種族底組織已被依照土地的組織所代替。

『國家，——恩格斯總結起來說，——絕不是從外面强迫加給社會的一個力量。國家也並不是如黑格爾所斷定的什麼「道德觀念底現實」或「理性底外形和現實」。國家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社會陷入自身不可解決的矛盾中並分裂爲不可調和的對立方面而又無力擺脫這種情勢的表現。爲了使這些對立方面，這些彼此經濟利益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互相消滅而使社會同歸於盡，於是一種表面上似乎駕凌於社會之上而用以緩和衝突，使這些衝突不致超出「秩序」範圍以外的力量，就成爲必需的了。這個由社會當中產生出來，但使自己駕凌於社會之上，而且益與社會脫離的力量，便是國家。』㈠

在自己的關於國家底產生這個問題底研究中，恩格斯指出了國家在歷史上底過渡的性質，對以下的一些問題作出了唯一正確的科學的答覆，這些問題就是：國家是什麼，它的性質是怎樣的，它的實質和使命在那裏，它的職能又是怎樣的。

由於對私有財產、階級和國家底產生這個問題底研究，恩格斯用新的具體的歷史內容充實了社會發展過程底唯物論的理解。

在推進歷史唯物論底理論時，恩格斯也發展了關於社會意識依賴社會存在底特性底某些重要的原則。並且恩格斯對於那種造成意識形態獨立底假象的情況作出了光輝的分析，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就是利用這種情況來掩蓋社會意識是從經濟基礎上產生出來的這一事實。

如恩格斯所指出，產生這種似乎是觀念創造歷史的錯覺底最一般的原因之一，是在於社會發展底歷史在一點上與自然界發展底歷史根本不同，這不同之點就是：在社會歷史中有人（賦有意識底生物）底行動參加，在這裏沒有一件事不是按着有意識的計劃和預定的意圖去做的。

『但是，——恩格斯指出，——這個區別對於歷史研究，——特別是對於個別時代和事件底歷史研究——不論它如何重要，它絲毫不改變這個事實，就是歷史過程服從於內在的總的規律。』㈡事實上，雖然每一個個別地行動的人在自己的行動中是從一定的預期的目的出發，而這些行動底結果却是另外一回事，關於這些結果不能說它們是某種有意識的預期的目的。『無數的個別的意向和個別的行動底衝突在歷史領域內就引導到和統治着無意識的行動的自然底完全相類似的情況。』㈢

由於人們底行動結果是在他們的意志和意識以外形成，從這個事實得出結論：歷史底真正的動力不是潛伏在個人底衝動裏面。爲了找出這些動力，首先應當從那推動廣大羣衆、整個民族和階級底原因出發。『這裏也是一樣，——恩格斯補充說，——重要的不是短時的爆發，不是瞬息即逝的火星，而是持續的、引起偉大的歷史變革的運動。研究動因，這些動因或明或暗地、直接地或在意識形態上甚至可能在幻想的形態上以意識衝動底形態反映在行動着的羣衆及其領袖，所謂偉人底頭腦中，——這就意味着走上了唯一的道路，這條道路引導到認識那統治着一般歷史及其個別時期或個別國家底規律。』㈣

在表面的觀察之下，政治同經濟底聯系、它的經濟的制約性容易看落，這種情況還可以用以下的情況來說明。國家，恩格斯說，一經產生便獲得了對人民底獨立性，並成爲統治階級底機構。被壓迫階級反對壓迫階級底鬥爭必然成爲政治鬥爭，因而減弱了對這種政治鬥爭同它的經濟基礎底聯系認識。『假如，——恩格斯指出說，——它在戰鬥者方面並未完全消失，那末，在歷史家方面却幾乎常常是缺乏的。』㈤由於國家和它所產生的法律的意識形態底出現，一切經濟的因素爲了取得法律底確認，必然要採取法律關係底形式，這種情況更加使得政治同經濟底聯系模糊不清。在榨取階級底政治家、理論家、法學家看來，法律的形式就是一切，而經濟的內容則空無一物。此外，馬克思所稱爲『意識形態主義』，就是現實底歪曲的、虛僞的反映，也是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的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底特徵。一切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反映現實不是直接地、不是公開地，而是如恩格斯所說，採取了『歪曲的形態』。資產階級專政如斯大林同志所說是『秘密的、隱蔽的、隱藏的專政，這是爲了用這種或那種好看的外表來欺瞞羣衆。』㈥

一切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政治的、法律的、倫理、宗教等等，都起了這種好看的外衣底作用。這些意識形態底每一種都充滿了歪曲的概念，其目的是在於掩蓋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的和其它意識形態觀點底階級性質。

例如說，資產階級的法學愈發展和愈複雜，它就愈蒙蔽自己的真實的、經濟的基礎。立法被資產階級的法學家描述爲絕對地獨立的領域，它是從它自己獨特的內在的前提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的專家在法律底領域創造了法律的體系，對比和比較了各個時代底法律的觀點，並認爲法律底進化不是經濟過程底反映，而只是法律概念（『意志』概念，『自然法』，『人民的精神』等等）底內在的進化。

在這樣的意識形態的領域內，如哲學、宗教等等，觀念對它們的物質基礎底聯系還要混亂，還要模糊不清。但是無論如何，恩格斯指出說，這種聯系是存在的。

在宗教觀點底發展底扼要的和內容非常豐富的綱要內，恩格斯對宗教底根源作了真正科學的解說，這對於理解宗教消滅底條件及與之作鬥爭底正確的政策有着重要的意義。

宗教底產生，恩格斯指出說，開始是自然界底自發的力量統治着原始的人類底結果，宗教觀念是在這些條件中產生出來的，它是統治着原始人類的外界力量在他們的頭腦中的荒誕的反映。對自然界和自身肉體特性底無知就促成了關於無肉體的精神觀念底產生，精

㈠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和國家底起源』第一七六頁。
㈡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古典的德國哲學的終結』第四一頁。
㈢同前
㈣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古典的德國哲學底終結』第四三頁。
㈤同上第四八頁。
㈥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三一〇頁。

神奇居在肉體內，而且是不死的。神底第一批觀念是不能理解的和威脅着人類生存的自然力量底荒誕的反映，既經產生之後，宗教，如同『一切的意識形態，便與現存觀念底全部總和相聯系而發展起來，把它們作進一步的加工。』[一]它保存着前代所遺傳下來的某種觀念底材料，這是傳統力量底結果。『但是，—恩格斯寫道，—在這種觀念底材料裏所發生的變化是由造成這一變化的人們底階級的，即經濟的關係來決定的。』[二]

假使開始時宗教是自然統治人類底荒誕的反映，那麼社會發展底自發的力量便成了宗教觀念底主要的來源。發展恩格斯底這些思想時，列寧寫道：『現代宗教底根源就是害怕資本盲目勢力的一種恐懼心理，而這種勢力確實是盲目自發的勢力，因爲民衆不能預察到它，因爲它使無產者和小私有主隨時隨地都可能遭到，而且真正遭到「突如其來的」，「出人意料的」，「偶然發生的」破產，滅亡，變成乞丐，變成窮人，變成娼妓，死於饑寒的危險。凡屬不願始終做個預備班的唯物主義者的人，都應當首先和特別注意到這種根源。』[三]

宗教逐漸轉變爲統治階級用來同被壓迫和被榨取羣衆作鬥爭底武器。

從對宗教底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出發，恩格斯同時又說明了宗教消滅底社會條件。他指出當社會來掌管生產資料和有計劃地利用它們的時候，『最後的敵對的力量便將消滅，這樣力量一直到現在都是反映在宗教裏，而同時也就消滅了宗教的反映本身，所根據的理由是很簡單的，因爲那時已經沒有什麼東西要反映了。』[四]

從以上的恩格斯底話裏，決不能得出結論說宗教底消滅是自動的過程，在生產資料一經社會化之後，一切信徒馬上便從自己的宗教觀念裏解放出來。意識中的舊的殘餘不是自發地和立即地便消滅的，雖然它們的社會基礎已經不存在了。即在我們的國家內—社會主義已取得了勝利的國家內—還有信仰宗教的人，這只有由於積極地參加共產主義的建設，由於共產主義的培養和教育，才能逐漸擺脫宗教的意識。

恩格斯發展了關於道德問題，特別是關於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道德問題底許多重要的原則。就在這些原則上建立起馬克思主義的倫理學，它與一切其餘的倫理學的理論是對立的，那些倫理學與科學毫無共同之點。恩格斯駁斥了關於所謂永久的和不變的道德底唯心論的和形而上學的提法，它把道德看作是普遍的、一般受尊敬的、離開社會底物質生活，離開社會的階級構造而獨立的東西。關於道德底這種觀念（它教育了榨取階級底一切理論家）不過是榨取者底自私的階級道德底虛僞的掩飾，榨取者把那種道德違反工人階級底利益而强加於他們身上。揭發了費爾巴哈的倫理學，這種倫理學是從人類天生的對其同類的愛，亦即對一般人的愛出發而得出永久的、不變的道德標準，恩格斯揭露了對道德底自然主義的解釋底反動性，把它同唯物論底道德學說對立起來，按照唯物論道德乃是反映社會存在底意識。

道德如同社會意識底其他形式一樣，是由社會存在決定的 ，而在階級社 會底條件之下，統治的道德標準是統治階級底標準。它們隨同社會底變化而變化。佔統治的道德底特列的形式對於每一個新社會經濟形態是各具特徵的。這是由於在階級的，敵對的社會裏，統治的道德反映着榨取階級底狀況和利益，它不可能對於一切社會都是同一的。因此，在資產階級社會裏，除了統治的資產階級的道德以外，還存在着革命無產階級底道德，它是同他們的解放鬥爭不可分離地聯系着的。

由此可見，資產階級的理論主張的爲一切時代和一切社會階級所共有的所謂一般人的道德，實是對人民的欺騙。

各種不同的道德體系是各種不同的社會階級底產物，它們將隨同那些產生它們的階級一起滅亡。唯獨無產階級的道德是例外，因爲無產階級是唯一的階級，有能力消滅人對人的統治和永遠結束社會底敵對的發展。因此在反對資本主義鬥爭中產生的無產階級的道德是將來的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底道德底基礎。恩格斯寫道：『站在階級矛盾之上和一切關於階級矛盾記憶之上的真正的人類的道德只有在這樣的社會發展階段才有可能，那時不僅消滅了階級底對立，而且在實際生活中擦去了它的痕跡。』[五]恩格斯底思想明顯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在倫理學領域內所實行的革命的轉變。創立了無產階級的道德底學說，揭發了資產階級的道德理論，馬克思和恩格斯於是就把倫理學變成科學。

就以我們的國家爲例，我們看到無產階級的道德已不只是工人階級一個階級的道德，而成了全蘇聯社會底道德。和資產階級的社會不同，在那裏人口被區分爲敵對的階級，在道德上也是這樣區分，在蘇聯只有唯一的一種道德。這表現出蘇聯人民道德上政治上的統一。

恩格斯對宗教的和法律的意識形態、對道德問題所發展的思想，最終證實了唯心論的所謂法律哲學、宗教、道德等等底破產。

馬克思主義揭露了唯心論者所造成的假象，照他們的意見思想底歷史恰恰是離物質的生產和階級鬥爭底發展而獨立的而且甚至決定社會底發展。馬克思主義指出一切思想意識的領域沒有例外，都是由經濟底發展決定的。特別是談到文學和哲學，恩格斯指出說，歸根結蒂經濟發展在這些領域內的優勢是無可爭論的。恩格斯並且指出經濟對這個或那個意識形態領域的作用是通過各種各樣的道路。法律的意識形態以比較直接的形態反映出經濟底運動。而在哲學中經濟發展底表現是通過間接的道路，如恩格斯指出說，『大部份都穿着自己的政治的以及其它的外衣』——就是通過對哲學起影響的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因此，任何意識形態領域底歷史，只有把它不當作獨立的邏輯過程，不當作觀念底獨立發展，而當作物質過程，經濟關係底發展歷史，階級鬥爭等等底最終的反映，只有在這

[一]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古典的德國的哲學底終結』第四九頁。
[二] 同上第五二頁。
[三] 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三七五頁。
[四]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三〇〇頁，一九五〇年。
[五]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八九頁。

種條件之下才能被正確理解。

新的，在更高階段的歷史唯物論理論中的重要的貢獻，是恩格斯所發展的關於『上層建築』底積極作用底思想，就是說『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底反作用。恩格斯在一八九一——一八九四年這一時期的一些通信內發展了這種思想。當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新的、唯物論的歷史理解的時候，他們一方面同唯心論底代表進行頑强的鬥爭，同時又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這種理論底解釋上，這種理論認爲生活底物質條件底生產和再生產是一切歷史運動底出發點和基本的原因。至於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底作用如何，對這個問題還沒有詳細說明。

因此，馬克思主義底敵人伯恩斯坦認爲似乎恩格斯對『上層建築』底積極作用底解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底以前的觀點底修訂，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底直接的誹謗。其實，問題底實質只是在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敘述自己的理論中開始時集中注意歷史唯物論底主要原則，亦即關於經濟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作用的原則，而後才去說明自己對意識形態上層建築底作用的觀點。促使恩格斯從事這件解釋工作底原因，是由於機會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僞造馬克思主義，他們力圖把無產階級底科學的意識形態底革命內容勾消。

在以上所說的恩格斯寫歷史唯物論通信的這個時期，在德國又有一批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份子重新依附於社會民主黨。

恩格斯認爲必須起來反對歷史唯物論底僞造和庸俗化，更由於有一部份社會民主黨員也支持這種庸俗化，那些人自認爲是唯物論者，而在事實上對馬克思主義底理論不過是一知半解。

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某些半瓶醋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歷史唯物論底理解是不正確的，就因爲他們否認思想和意識底作用。

『必須証明思想底偉大意義。於是恩格斯就這樣挺身而起并在自己的通信（一八九一——九四年）內强調着說，思想確乎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生活本身所產生的，然而一旦產生了，就獲得巨大的意義，它們把人們聯合起來，把他們組織起來並且在產生它們的社會生活上烙下自己的印記，——思想在歷史運動中，有着巨大的意義。』㊀

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到一八九四年所寫的主要是涉及歷史唯物論問題底通信，有很大的理論的和政治的價值：它們在反對機會主義者曲解馬克思主義底鬥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些通信是在反對機會主義底鬥爭中產生的，並給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尖銳的武器。這副武器被列寧和斯大林磨得更鋒利，他們賦予它以新的力量，靠着這副武器底幫助，布爾什維克揭發了『經濟主義者』，孟什維克和一切的國際機會主義，他們用所謂『經濟的』唯物論來代替歷史唯物論，以便用它來支持自己的機會主義的理論和自發、自流、尾巴主義底實踐。

恩格斯底通信奠定了一條原則：從經濟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意義不能得出結論，說其它的社會生活因素對歷史過程不發生影響。『經濟狀況，——恩格斯寫道，——這是基礎，但是上層建築底各種因素同樣也對歷史鬥爭底過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場合總是決定它的形式：上層建築底各種因素是：階級鬥爭底政治形式及其結果——憲法，這是由勝利了的階級在已取得的勝利之後所製定的，還有與之相類似的法律形式乃至一切這些實際的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和他們進一步向教條體系底發展。』㊁意識形態的形式底根是生長在經濟裏面，但在自己的往後的發展裏，在某種程度上也依賴於自己的以前的發展。

假如拋開了以前時期底成就，哲學、美術底進步發展便不能理解。

如恩格斯所說，歸根結蒂，經濟發展對於意識形態領域的優勢是『在特定領域本身所規定的條件範圍之內才發生，例如在哲學中，經濟的影響只及於前驅者所達到的已存的哲學材料。經濟在這裏什麼新的東西也沒有創造出來，但是它決定改變和已存在的思想材料底進一步的發展底形態。』㊂

活在人們意識中的傳統，在社會發展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所有這些因素歸根結蒂是由經濟產生的，但又對經濟起着反作用。

在考察經濟和政治底相互關係時，恩格斯指出說：政治、國家政權對經濟發展所起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種：國家政權可以指導經濟發展新方向，——這時經濟底發展以較快的速度前進；它可以反對經濟的發展，這時現存的國家制度或早或遲不可避免要破滅；它可以一方面促進經濟的發展，同時又阻碍它。這種場合最終還是歸結到前面兩種中的一種。

政治和經濟底交互作用如恩格斯所說，是『兩種不同的力量底交互作用。』國家不成爲獨立的領域，而是在自己的存在期間依賴於生活底經濟條件，歸根結蒂，依賴於生產力和交換關係底發展。每一次都是如此：當現存的國家政權保護着已過時了的生產關係底時候，它就要同經濟發展發生衝突，鬥爭底結果是統治的階級及其國家底敗亡，代之以新的階級底國家，而經濟發展總是不屈不撓地爲自己開闢道路。

當說明思想不能有自己的獨立歷史，即不能有脫離經濟發展底歷史這條原則時，恩格斯指出說，它們在一般地依屬於經濟基礎底限度內也獲得了發展底多少相對的獨立性。

這同勞動分工聯系起來是最容易理解的。例如：從國家一產生之時起，便產生了一羣人，他們形成社會內部勞動分工底新的部門。正在產生中的國家產生了新的意識形態——法律——隨之出現了新的職業——法律的職業。每一個這樣的領域在自己的一般的依屬於生產和交換之外，同時又日益獲得相對的獨立性，因爲它已經產生並且由於這種相對的獨立性而獲得一種對這些政權發生反作用底能力。

恩格斯關於意識形態發展規律底原則，一方面是針對着反對歷史底虛僞，唯心論的敘述；另一方面是反對歷史過程底庸俗唯物論底曲解。恩格斯把自己的正確敘述歷史底要求（針對着反對這兩方面的曲解）概括爲以下的話：『必須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條件底細節

㊀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一一八——一一九頁。

㊁馬恩通信選集第二二三頁。

㊂同上第四三〇頁。

首先是試圖從其中挑出與之相應的政治的、法律的、美學的、哲學的、宗教的等等的觀點。』㈠

恩格斯底通信把歷史唯物論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交互作用底原則具體化了，深入地闡明了它們的交互作用，使有可能更完滿地和更具體地理解意識形態及其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底發展規律。

馬克思主義的基礎與上層建築底理論在列寧和斯大林底著作中得到進一步的全面的研究。思想在社會發展中的意義這個問題在斯大林所解釋的原則中得了自己的高度的理論的發展，斯大林所解釋的原則是說前進的思想，科學共產主義底思想起着動員的、組織的和改造的作用。

在斯大林底著作『論語言學中的馬克思主義』所發展的基礎是社會在其發展某一階段上的經濟制度；上層建築是特定的經濟基礎所依以生活和活動的某一時代底產物；上層建築同生產，同人們底生產活動通過經濟底媒介，通過基礎底媒介而發生的間接的聯系；又說到上層建築起巨大的作用，這許多原則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基礎與上層建築底理論底新的卓越的貢獻。上層建築是在基礎上產生的，但這決不是說它只反映基礎，它是被動的，對自己的基礎底命運，對階級底命運是中立的。一經出世，上層建築便成為偉大的積極的力量，服務於自己的基礎——它的形成和鞏固。

歷史唯物論底理論，不只是認識過去和現在底武器，而且是認識未來底武器。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俄國革命運動底命運底預言在這方面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們密切注視着俄國革命思想底發展。馬克思特別對車爾尼雪夫斯基底英明的著作感到興趣，並認為它們是未來的革命底標記。

『現在在俄國所發生的思想運動，——馬克思寫道，——証明了在底層深處正在發生着動盪。思想往往是被許多看不見的綫同人民底肉體連在一起……。』㈡

恩格斯同『勞動解放』社保持着活的聯系並且寫道，令人高興的是在俄國的青年中間產生了一個政黨，這個政黨採納了馬克思底偉大的經濟的和歷史的理論。

還在『勞動解放』社形成之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進行了反對民粹派的鬥爭，反對他們以為沒有無產階級也有可能達到社會主義底幻想。在『論俄國底社會關係』（一八七四——一八七五年）一文內，恩格斯對特卡却夫認為公社的農民比工人更接近社會主義底論斷給以尖銳的批評。馬克思和恩格斯把俄國革命底命運同工人運動聯系起來。

馬克思和恩格斯巧妙地採用唯物辯証法和歷史唯物論來規定歷史的遠景和表現出許多英明的思想：關於未來的發展——關於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和關於共產主義社會底最一般的特點。

『馬克思底一切理論，——列寧寫道，——都是採用發展底理論——在其最一貫的、最完滿的、深思熟慮過的和內容豐富形式裏——於現代的資本主義。自然，馬克思也提出了採用這個理論於資本主義底即將破滅和未來的共產主義底未來的發展問題…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底問題如像自然科學家提出一種新的，譬如說，生物學的變種底發展問題一樣，正像我們所知道，它一經產生出來，就依着一定的方面變種。』㈢

馬克思底英明的著作『哥達綱領批判』在這方面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該書寫作於一八七五年，一八九一年首次公佈於法國社會民主黨底理論性的週刊『新時代』上面，恩格斯寫了一個前言。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提出的和闡發的重要的新的原則，是關於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必須經過一個特別的、過渡的時期這條原則。

『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中間，有一個由前者向後者的革命轉變底時期。與這時期相適應，也有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底國家除了無產階級底革命的專政以外，不能是別的。』㈣

馬克思揭發了拉薩爾『自由的國家』那個口號底機會主義的、反科學的性質。這個要求是從黑格爾對國家實質底理解及其對待社會的態度出發：國家在有階級的社會裏是統治的榨取的階級底武器，哥達綱領把國家描寫成『人民的國家』，因此，抹煞了國家底階級實質：『……不把現存的社會（這對於將來的一切社會一樣有效）視作現存的國家底基礎（或者不把未來的社會當作未來的國家底基礎），它（哥達綱領——編者）反而把國家視作某一獨立的實質，具有其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礎』。』㈤指出了哥達綱領作者對國家問題提法上的這個基本錯誤，馬克思進而指出說，這個問題應當這樣提：『這國家組織在共產主義社會裏將碰到怎樣一種轉變呢？換句話說：那時將留下和今天的國家機能相類似的怎樣的社會機能呢？這個問題只能從科學上去回答；儘管「人民」這詞同「國家」這詞一千次結合在一起，然而，對問題底解決，却是無濟於事。』㈥

護衛着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國家底必要，馬克思和恩格斯揭發了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底破產和反革命的、反無產階級的實質，這種理論一般地否定一切國家組織。在論文『論權威』、『政治的冷淡』和七十年代所寫的許多論文裏，馬克思和恩格斯給予無政府主義者『國家不需要』的胡說以毀滅性的批判。

馬克思揭發了無政府主義者的宣傳底背叛的實質，因為他們號召工人丟掉武器和取消國家，而不是賦予國家以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形式和粉碎資產階級底抵抗。馬克思指出要是無政府主義底信徒公開地和直接地向工人說出這個由他們的理論所得出的實際結論，那麼，工人階級立即就會把一切這些小資產階級的空論家送到魔鬼那裏去，這些空想家使他們

㈠馬克思通信選集第四二一頁。
㈡同上第二五六頁。
㈢列寧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三〇頁。
㈣馬恩選集第二卷第二三頁。
㈤同上第二卷第二二頁。
㈥同上第二三頁。

解除一切現實的鬥爭武器，其理由是這些鬥爭武器不適合底唯心論的空想，無政府空談底宣傳家『創立』了這種空想，給它起了自由、自動、自發的名稱。

恩格斯對反革命的、無政府的要求給以粉碎性的毀滅，他們想靠社會革命底第一個動作就把權威取消。『這些人見過革命沒有？——恩格斯感慨地說，——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有權威的事物。革命是人口底一部份用槍、刺刀和大砲，即用非常有權威的武器強迫另一部份接受其意志底動作。假如取得勝利了的政黨不想失去自己的努力底結果，它就應當藉自己的武器所給予反動派的威嚇，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曾憑藉武裝人民底權威來反對資產階級，那麼它能支持到一天以上嗎？反過來說，我們不是有理由因爲公社把這個權威運用得太少而加以責備嗎？』(十)

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偉大思想：無產階級專政對於工人事業勝利的必要，這就奠下了一個基礎，列寧和斯大林在這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創造了完整的和嚴整的學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底政治基礎。

在說明過渡時期經濟底基本特點時，馬克思是從生產關係決定一切其他社會關係這條歷史唯物論底基本原則出發。拉薩爾派和自願投降他們的埃森派，(十一)背誦着說社會主義就是『平等』和『正義』，他們對社會主義底理解實質上是彈着資產階級的老調。拉薩爾派和埃森派在自己的綱領裏，承認每一個人取得完全的、不折不扣的自己勞動底生產品是『正義的』。在綱領裏說『勞動的收入全部地和按照平等的權利屬於社會底全體成員』。批評了這個拉薩爾派的要求，馬克思指出說，假如『勞動底收入全部地和按照平等權利屬於社會底全體成員』，這就是說，不勞動底社會成員也享有這些權利，並且那時勞動的社會成員就把自己勞動底一部份供不勞動的享受，『不折不扣的勞動收入底』原則便告破產。假如勞動收入只屬於勞動的社會成員，那末『一切社會成員底平等權利』又將置於何地？

再者，在集體的勞動收入中，在綜合的社會的生產品中，不僅包括消費資料，並且還包括生產資料。因此在綜合的社會生產品中包括：補償恢復生產資料消費底支出，擴大生產的增加部份，爲防止不幸事件、天災等等的預備基金和保險基金。

還應當加上建立國防底費用開支。馬克思沒有說到這個問題，其所以沒有說到，是由於他是從社會主義同時，最低限度，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這個假定出發。

恰恰在現在我們完全能夠理解和估計馬克思攻擊拉薩爾派的要求『不折不扣的勞動產品』時的這種憤慨底正義性。

假如社會主義社會按照這個要求去做，那末它便不能擴大再生產。而沒有這個便不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底基金，便不能保証社會主義國家底國防力量，社會主義國家便很容易被自己底敵人擊敗。現在生活本身足以証明拉薩爾派的要求『不折不扣的勞動產品』包含了使社會主義建設破壞和使社會主義勝利不可能的一切材料。列寧、斯大林底黨引導我們同小資產階級的平均的和敵視社會主義的右的和『左的』資本主義恢復者底理論進行鬥爭而達到社會主義底體制，這些人反對社會主義生產底擴大，反對工業化和集體化底政策，試圖剝奪社會主義國家國防所必需的工業基礎，解除社會主義國家底武裝。

馬克思指出說，在社會主義之下的分配是按照商品交換所完成的原則而完成：一種形式的一定數量的勞動同另一形式的同等數量的勞動進行交換。但是與商品生產社會裏的等價物交換有着本質的差別。這個差別是在於：在商品生產的社會裏等價物底交換，只存在於平均數裏；而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則等價物底交換是存在於每一個別的場合，因爲在這裏原則和實踐可以是完全一致的。

當哥達綱領提出『不折不扣的勞動產品』這個要求時，它認爲這個要求是永久『平等』和『正義』底表現。馬克思推翻了這條原則而提出按勞取酬底原則，他解釋說，這後一原則才表現平等，因爲它不承認任何階級的差別，每一個人正如一切其餘的人一樣，都只是工作者，但是它同時又承認由於能力差別而來的不平等。這種能力底不平等，任何時候也不完全消滅，往往是一部份人貢獻給社會的多一些，另外一些人則少一些，看各人能力而有差別。但是這並不是說，給每個人的報酬只按其所能担負的工作支付永遠是公平的。這裏在我們面前展開一幅清清楚楚的畫圖：馬克思關於將來社會底一切論斷，完全是建立在科學上面並且擺脫了任何先入之見的假定底微小的雜渣。馬克思說：

『在共產主義社會底高級階段上，當那奴役人們迫使其服從社會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以後，當精神勞動和體力勞動底對立隨同消失時；當勞動不復單單是謀生底手段而本身成爲生活底第一要素時；當生產力已隨個人底全面的發展而增長如一切社會財富底泉源都充份流湧出來時，只是到那時才能完全克服資產階級的法權底狹隘眼界，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十二)

馬克思提出分配底問題，不是從抽象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假定這個觀點出發，而是從社會發展底規律出發。按照馬克思底理論，向按需分配底過渡只是在生產力和人們對勞動底共產主義的態度底發展達到一定成就底結果才能實現。當生產力增長到使社會握有足夠的資料來對每一個人實行按需要分配的時候，當人們已開始按習慣進行勞動和按勞分配已不復起刺激勞動底作用的時候，——那時才有可能實行按需分配。並且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爲假如在達到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以前按勞分配是生產力增長和發展底必要的條件，那末生產力底這個發展却達到這樣的結果：按勞分配原則底繼續保留反倒成爲它們的障碍，因此必須拋棄這條原則而代之以按需分配底原則。但是在共產主義底第一階段上，按勞給酬是唯一正確的和在發展眞正的平等上的進步的、公正的全世界歷史的前進的一步。當發展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裏所提出的原則時，斯大林指出說：在社會主義之下，平等是在於每一個人都有按自己能力進行勞動底平等權利和平等的勞動得平等的酬報底平等權利。

(十)馬恩選集第一卷第五九一頁。

(十一)一八六九年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埃森召開會大會，會議上以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爲首的一派擁護馬克思和第一國際，這一派就得埃森派之名——譯者。

(十二)馬恩選集第二卷第十五頁。

馬克思把與分配形式相適應的物質生產力水平底差別，作爲共產主義底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社會主義和第二階段或高級階段是共產主義）底差別底基礎。

『哥達綱領批判』是馬克思主義底卓越的文獻，科學預見底典範。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闡明了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底最一般的特徵。列寧和斯大林研究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底動力底規律，關於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這個過渡時期以內的步驟和階段。斯大林同志所研究的關於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底逐漸過渡問題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的最重要的貢獻。

在斯大林同志著作中關於這個過渡問題底提出和它的規律闡明是在認識建立完全的共產主義底道路和方法上的偉大的前進一步。斯大林同志解答了與共產主義底過渡有關的而還不能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面前提出的許多新的問題。

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底許多重要的原則，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和特別是在『家族、私有財產和國家底起源』一書中都有發展。

恩格斯底以下的一段話，在這段話裏他規定了在社會主義之下社會發展底性質，是眞正的預見。

『社會生產內部底無政府狀態爲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爲個人的生存而作的鬥爭停止了。因此，人現在——在某種意義上是最終地——由生物界走出來和從生存底野獸的條件中過渡到眞正地人的條件。在人們周圍的和至今一直統治着他們的生活條件現在才落在人們底統治和管理之下，人們第一次成爲眞正的和自覺的自然界底指揮者，因爲他們成了自己的社會化的生活底統治者。他們的自己的社會活動底規律，這規律一直是當作一種不可解的，統治着他們的自然界底規律和人們對立着，現在人們將可以運用自如，因而將服從他們的支配。人們底社會存在一直是當作超乎自然和歷史的一種約束力量和他們對立着，現在成了他們自己的自由的事了。客觀的，不可解的力量一直是統治着歷史，現在也處在人們本身底管理之下。而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開始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有到那時由他們引起運動的社會的原因，才在相當可觀的和日益增漲的程度上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底王國向自由底王國的飛躍。』[30]

但是，這個自由不僅依靠於發展規律底認識和利用它來達到人們底利益。自由還決定於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底性質本身。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之下由於認識了社會主義底客觀必然性，爲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而進行鬥爭，然而他們仍然是被奴役的，被壓迫的階級。他們只是在推翻了自己的剝削者和消滅了剝削的時候才獲得眞正的自由。斯大林同志說，要成爲自由的，首先就要解脫剝削。一切勞動者過去的歷史都不能給他們自由。只是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的革命才給他們和一切勞動者帶來自由。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的自由是建立在自覺的、科學的領導社會發展和建立在擴大勞動者達到自己目的底客觀可能性上面。

以蘇聯爲例，在這裏，社會主義已勝利和完成着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運動，我們看到勞動者如何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成爲社會關係底統治者，同時也是自然界底自覺的統治者。

只有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才第一次開始有計劃的社會活動，其目的是爲了勞動者底利益而同自然界進行鬥爭。因此在這裏，如恩格斯所說，人們第一次成爲自然界底眞正的和自覺的統治者。這個特別明顯地表現在蘇聯所執行的改造自然的斯大林計劃裏。

在自己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敍述中，恩格斯也提出了社會主義家庭的問題。社會主義以眞正的一夫一妻制來代替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虛僞的、實際上只是說說而已的那種一夫一妻制。在社會主義之下一夫一妻制不僅不消滅，而且第一次完滿地實現起來。

從生產資料轉變爲社會的財產之時起，一夫一妻制便成爲眞實的了，因爲使一夫一妻制成爲不眞實的那個經濟基礎已不復存在。

可是，眞正的一夫一妻制將不是由於社會關係底自發的改變底結果而達到。它是在社會主義時代以及在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時期社會對家庭發展底推動作用所造成的社會主義的秩序：生產資料底社會所有，婦女底平等權利的地位，她們在與男子有平等的勞動酬報之下的勞動權利，她們與男子同等積極參加社會的和政治的生活，參加國家底管理，她們在經濟上脫離開了男子——所有這一切都引到男子和婦女之間在社會和家庭中的不平等底完全消滅。

這種不平等底消滅造成一切爲强固的家庭所必須的前提，這種家庭是建立在夫婦之間的互愛互敬和互助之上。新的勝利在這裏也預定了人們意識中和行爲中的舊的殘餘底完全消滅。因此，就需要爲建立社會主義之下的强固的、穩固的家庭而鬥爭。

並不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關於『未來社會』所敍述的一切都經過了生活底考驗，生活底考驗對恩格斯底敍述提出了某些最根本的修正。這首先就關涉到他的有名的關於國家衰亡底條件和期限底原則。

在自己的關於國家在無產階級勝利之後立即衰亡的這個假設中，恩格斯是從社會主義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同時勝利這個理論出發的。

但是資本主義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踏入新的和最後的階段——帝國主義階段。在這些條件之下以上所說的恩格斯底原則便不能不加以改變。它在蘇維埃國家底建立、發展和鞏固底實踐中受到了根本上的改變。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所產生的蘇維埃國家靠着紅軍、全聯反革命取締非常委員會底建立而執行了鎮壓被推翻了的剝削階級底職能，而不是採用取消常備軍底方法來執行這個任務，如以前所設想那樣。並且即使在我國內的剝削階級已經消滅之後也還沒有到消滅國家的時候。斯大林同志指出不僅在社會主義時期並且即在共產主義時期，假如資本主義的包圍還保留着的話，國家仍有保存和鞏固底必要。

（本節完，全文待續）

---

[30]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二六七頁。

學術問答

〔問〕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政策與人民民主國家的貨幣政策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一九五〇年波蘭的貨幣改革與蘇聯盧布改爲金本位有無相同之點？

（上海　朱從周）

〔答〕（一）這一問題首先要從資本主義經濟本質和人民民主經濟本質去瞭解，要從二者的歷史發展和現實情況去瞭解。

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政策是跟着資本主義發展的各個階段而演變的：

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銀行資本居於從屬地位；這一時代的貨幣制度是以貴金屬爲主體的所謂金本位制度，這一制度是符合當時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的要求的，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銀行資本佔有了統治地位，這時，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內在矛盾——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手段的私有愈益尖銳，經濟危機，愈益深化，世界領土已經分割完畢，市場日趨縮小，壟斷資本要在這樣的物質基礎上來擴大它的利潤，還須反對日益强大的工會組織。所以，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貨幣政策，對勞動人民來說，必然是一種災禍性的政策，那就是支持壟斷價格、壓低勞動者的實際收入，並使其生活日趨惡化的通貨膨脹政策。

銀行資本發展到這一階段，它不但掌握了全部貨幣資本，同時也控制了工業資本，因之，它就有可能製造象徵性的貨幣來代替貴金屬貨幣的流通，因之銀行資本家就具備有充分的權力來操縱貨幣資本的供給、流通及其作價，這一物質條件强化了壟斷資本對勞動人民的搾取和對外擴張的傾向，同時也深化了它的不可克服的危機。

二次大戰後，由物資缺乏和通貨膨脹所形成的虛假繁榮剛一過去，美國的壟斷資本就感受到經濟危機的嚴重威脅。所以，它們不顧全世界人民的反對，挑撥新的戰爭，指使它們的反動政府空前規模地屯積所謂戰略物資，擴大軍事預算，發動侵朝戰爭，於是爲它們增加利潤的通貨膨脹政策又得到了貫澈。在相反方面，則爲物價高漲以後勞動人民生活更進一步的惡化，如果人民堅持保衛和平的力量制止新戰爭的爆發，壟斷資本的通貨膨脹政策就會失掉基礎，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必然將以空前的規模爆發。

再來看各人民民主國家，它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從法西斯劫餘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是在遭到階級敵人的重大破壞以後，社會經濟最混亂的情況之下建立起來的。所以，在這些被解放不久的國家裡，通貨膨脹長期壓搾着勞動人民的生活，因之停止通貨膨脹，穩定物價便成爲人民民主政權的首要任務，否則，生產就不能恢復，城鄉就無從交流，財政收支也無法平衡。爲了恢復並發展經濟，爲了改善人民生活，人民民主國家的貨幣政策必然是爲人民生產服務的通貨穩定政策，由於壟斷資本或官僚資本的銀行和產業已經爲人民的國家所有，人民民主國家也就完全能夠完成穩定幣值的重大任務，又因爲人民民主國家是堅決要求並保衛着世界和平的，它們的人力財力和物力都集中於生產建設，並沒有準備戰爭的軍事預算，所以它們才能停止通貨膨脹，穩定物價。

因此，人民民主國家的貨幣政策與當前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政策有着很明顯的不同。簡扼地說：人民民主國家的貨幣政策是人民自己所掌握的爲人民生產服務的穩定政策，並隨着經濟的發展而提高。（如去年波蘭的貨幣改革。）而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政策是掌握在壟斷資本的金融寡頭手上爲擴大壟斷資本的利潤而服務，它是壟斷資本榨取勞動人民血汗並對外搶奪市場和原料的新武器，它在當前更表現爲帝國主義準備新戰爭的財政手段，因之它不可能是穩定的而必然是膨脹的，並且對勞動人民是災禍性的政策，它又給壟斷資本主義埋藏了毀滅性的危機。

（二）波蘭的貨幣改革與蘇聯盧布改爲金本位都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基礎上實施的。這是一個共同之點，蘇聯盧布改爲金本位是配合蘇聯社會主義生產的擴大與增加提高了盧布的價值；波蘭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初所實行的貨幣改革把波幣茲羅提建立在金本位的基礎上和世界上最穩定的貨幣——盧布平價，也就是配合着波蘭走向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提高了波幣的價值。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在經濟計劃勝利完成之下，生產迅速增加，物資

流通的範圍和數量擴大，勞動人民的生產力提，高他們的實際所得跟着增加，所以在作爲價值尺度和經濟核算工具的貨幣 ，必須與這種發展情況相適應，那是很自然的結果。

關於波蘭的貨幣改革可以參考「新時代」第五一期，波蘭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代理主席S.Jedrychowski一文，經濟周報第十二卷第六期載有譯文。

（王烈望）

〔問〕法，法律，法權的含義各如何？法律與法權是否可以混用？國家與國度兩者有何區別？

（廈門　沈訓鈿）

〔答〕（一）國家是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機器。在國家產生後，更有爲國家權力所制定或認可的規範，其目的在保護，鞏固，並發展懨意於且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社會關係和秩序，換言之，在實現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因此，法的規範，是表示國家的一切權利的。亦即統治階級的意志的表現。且國家必以强制力保證其法的規範的實行。

法的規範，可以國家權力所制定的法律的形式表示之（例如：中央人民政府於一九五〇年四月三十日所公布的婚姻法，）或可以國家權力所認可的習慣的形式表示之（例如：法院所認爲有效的習慣），且尙可以其他形式表示之。

這些法的規範的總和便是「法」。故「法」是國家權力所制定或認可的，表示統治階級意志的行爲規則（即法的規範）的總和；這種行爲規則的適用是以國家的强制力保證的，而其目的是在保護，鞏固，並發展懨意於並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社會關係和秩序（參閱：蘇聯阿爾惹諾夫等所著國家和法的理論，一九四九年俄文原版第一〇九頁以下）。而法律呢？它只是法的規範所藉以表示的一種形式。所以，嚴格說來，上述的婚姻法不能稱爲「法」，而是「法律」，因爲它是關於婚姻的若干法的規範所藉以表示的一種形式。這點從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也可明白看出。這法律第七條第一欵說：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制定並解釋國家的法律……」。可見中央人民政府所制定的實在是婚姻法律。至這婚姻法律之所以被稱爲「婚姻法」，完全是因爲後一名詞較爲簡化易讀的原故。

在若干外國文字中，「法」和「法律」也區別的頗爲清楚。例如：相當於我們的「法」的字，在俄文爲ПРАВО，在德文爲Recht，在法文爲droit，在意大利文爲dirftto，在拉丁文爲 jus；而相當於我們的「法律」的字，在俄文爲Закон，在德文爲 Gesetz，在法文爲 loi，在意大利文爲 legge，在拉丁文爲 lex。

（二）在若干書籍中，我們在上面所稱的「法」，被稱爲「法權」。例如：在解放社版的馬恩合著的共產黨宣言的譯本中，有這段譯文：「你們的法權，只不過是高昇爲法律的你們的階級的意志，這種意志的內容是由你們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第四四頁）在這段文字中，「法權」這個名詞，在俄文共產黨宣言的譯本中是npabo，在德文共產黨宣言的原本中應是Recht；「法律」這個名詞，在俄文譯本中是 Закон，在德文原本中應是Gesetz，（我手頭因爲沒有德文原本可資覆按，所以在這裡說「應是」）。但是，使用「法權」這名詞以代替「法」，似乎不很妥當，因爲「法權」的正確意義應指一個國家關於制定法律和執行法律的權力，而在這裡，npabo 和 Recht 純粹指國家權力所制定或認可的行爲規則的總和。

（三）如上所述，「國家」是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工具。「國度」泛指一個有確定界限的地域，而不特指在這地域上所存在的政治組織。在若干外國文字中，這兩個名詞也是以兩個不同的字表示的。「國家」在俄文中是ГОСУДАРСТВО，在德文中是 Staat，在法文中是 etat，在英文中是State；而「國度」在俄文中是 СТРАНА，在德文中是 Land，在法文中是Pays，在英文中是Country，例如：馬恩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中的最末句，在解放社的中譯本中，被譯爲：「一切國度的無產者聯合起來啊！」這裡的「國度」，在德文原本中原是Land，在俄文譯本中是СТРАНА，意指有確定界限的地域，而不指在這地域上所存在的政治組織。「一切國度」等於全世界，故如把這句譯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也很恰當。在中國的習慣用語上，「國家」與「國度」又往往是很難區別的。

（李浩培）

〔問〕馬爾的語言學，自稱是「唯物主義的」，它的內容是怎樣的？主要的錯誤在那裡？

（開封　黃振國）

〔答〕 馬爾的語言學說的內容及其錯誤如下

1、馬爾認爲語言是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他說：「語言就像美術及一般藝術一樣是具有上層建築的社會價值的」。關於此點，斯大林已經有了明確的批判，斯大林認爲語言與上層建築根本不同，因爲語言的基本詞彙和文法結構並不因爲基礎消滅

而消滅。上層建築是爲自己的基礎而服務的，語言則可以一視同仁地替舊的衰亡的制度服務，也替新的上昇的制度服務；上層建築壽命短，語言比任何上層建築，任何基礎的壽命都長。

2、馬爾認爲語言是有階級性的。馬爾說：「沒有不帶階級性的語言。」

「民族的全民語並不存在，只有階級語。」「語言從它發生那時起，就是有階級性的」。斯大林對這個學說的批判是：「很顯然的，在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根本談不到所謂階級性的語言」。「作爲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的語言是全社會統一的，是對社會所有組成員同樣服務的，不管他們的社會地位怎樣。」斯大林的三條結論是：（1）語言作爲交通工具，曾經是現在還是對於社會是統一的，對於社會的組成員是共同的。（2）有習慣語和同行話的存在，並不是否定而是肯定有全民語言的存在，因爲習慣語和同行話是全民語言的支派，並且服從於全民語言。（3）語言的階級性的公式是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公式。

3、馬爾的語言起源說。馬爾認爲聲音語言（因爲另外有手勢語言）的發生不是爲交際之用，而是一種「魔力」的動作。但依照馬克思古典學者的學說，語言是在勞動行爲過程中發生的，語言是由交際需要而生出來的。

4、語言的統一說。馬爾主張將來人類要有共同語言，在這一點上，似乎馬爾跟馬列主義的原理一致，但他的見解不正確，他說：「勞動生活在有了經濟和社會機構的統一並由此肅清一切障礙以後，總能使全體語言趨向於統一的」。當然，這是對的，但他却認爲「人類走向經濟和超階級的社會統一的時候，不能不採取經過科學研究的人工的方法以促進這個世界的進程」。馬克思主義者認爲民族語言的死亡和一種共同的世界語言的形成，其過程是漸進的，用不着什麼「促進」這個過程的「人工方法」。

5、古生物學的四要素的分析。馬爾的被人稱作基本成就並賴以推翻資產階級語言學的比較歷史法的學說就是古生物學的四要素分析法的學說。馬爾的四要素分析法的內容是：「所有語言的一切單字，既是一個創造過程的產物，所以都是由四個要素組成的，每一個字由一個或兩個要素組成……無論在任何語言的辭彙中沒有一個字是包含着這四個要素以外的東西的，……這四個要素是（САЛ, ВЕР ИОН РОШ 它們是形式上古生物學的分析的每個字的基礎……沒有這種分析，比較法是沒有用的。馬爾這種四要素分析法能够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比較任何的兩種語言，這是非歷史的，完全是附會，毫無論據，茲舉一例說明：

喬治亞語 Мчха 意爲橡樹，依四要素分析法，裡而會有 Му（ВЕР要素）ха（САЛ要素）兩個要素，第一個要素（МЧ）依馬爾的說法是可以和中國語的（木），摩爾達維亞語的（пу）（意爲木），喬治亞語的 пур-ц（糧食）希臘語的 Бал-ап-ос（橡樹子），減格利亞語的 ко-ъал-ц（糧食）……相結合着的；第二個要素 ха 能和喬治亞語的 хе（木）Тке（樹林）相結合。這樣一來，同一個要素 Му 和它的各種變形（ду,пур,ъал……）就表示木——橡樹子——糧食，並由此可以證明人類曾以橡樹子爲食。

我們可以看出馬爾的四要素的分析法是怎樣的荒誕無稽，不怪斯大林說四要素的分析法是眞正唯心的分析法了。

6、語言發展的階段學說。馬爾把世界上的語言分爲四個階段，認爲漢語是屬於原始階段的，印歐語屬於最進步的階段，意思就是說漢族是老早脫離了共同世界運動的民族，所以語言還滯留在原始階段上。這種見解暗示漢人是最不開化的民族。馬爾對於漢語的知識很淺陋，居然以他的管見作出這樣具體的結論，這是很大的錯誤。

7、反對印歐學派的「母語」（Nparzelk）學說。馬爾指出科學界中廣泛傳播着所謂由單一語言形成多數語言這一個原理是錯誤的，依馬爾的論斷：個別的少數的，但在廣大領土分散的部落不可能有一個對它們是共同的語言，但他不能很令人滿意地解釋像斯拉夫各民族的語言的血緣關係，同時既然不能由一到多，那麼四要素學說怎樣存在呢？馬爾自己就陷於矛盾中間。

8、馬爾的語義論。馬爾在晚期的作品中，揭示出表示社會集團經濟生活變化的語義系統，由這個方法創立了社會機能的語義論，所謂機能語義論乃是把許多表示造成過去各時代基於一個基礎上的同一社會機能的各種對象相結合起來的語義論，如馴鹿——狗——馬——車，馬爾認爲這些名稱不是對象本身給出來的，而是從社會環境中因對象造成的機能給出來的，這四個字的機能乃是移動的手段，在語言材料上明示着語義系統，表示在一定對象的經濟使用中生出來的變化。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論到基礎變種的形式，如——女人——水——樹木等字互相結合起來就變成語義論中的「房屋」時，就令我們感到了玄虛。

（王輔世）

書評

關於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

彭澤益

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之一李大釗曾在一個叫做政治生活的刊物上發表了一篇以馬克思的中國民族革命觀爲題的論文㊀，那主要是從英文譯述馬克思的一篇文章——中國的和歐洲的革命（The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in Europe）㊁。馬克思關於中國問題的論文最先被介紹過來的可能這是第一篇。把馬克思和恩格斯論中國的文章彙集印成專書，那是較晚的事。

約在一九三八年間，有馬克思和恩格斯論中國一書由解放社、中國出版社等出版，譯者署名爲方乃宜。同年十一月間上海珠林書店以中國問題評論集的書名僅把馬恩論中國書中第二篇的論文印出，無譯者姓名。最近新華書店根據一九三八年解放社舊譯本（即前述譯本）把它重印出來，也略去了譯者姓名。

全書的內容包括三個部份，第一篇和第三篇是從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關涉到古代東方與中國的片段摘錄；第二篇是關於中國問題的專篇論文。（本書目錄作「篇」，譯者的話中作「章」，應改正一致。）論文署名爲馬克思寫作的共有十四篇，署名爲恩格斯作的只有三篇。其中十六篇發表在紐約每日論壇，只有一篇發表在潑茱塞報。寫作和發表時間，從一八五三年六月至一八六二年七月間。在本書中，馬克思恩格斯對於古代東方及中國社會歷史的特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來英俄等國對中國的侵略、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鬥爭都作過很深刻的研究。在較爲完整而有系統的十七篇論文中，是批評當時發生在中國的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以及與此有關的各方面問題。這應是全書的主要部分。據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上說：「這個可惡的報紙（指紐約每日論壇——引者註），竟把我關於中國的一切論文（中英通商全史等等），作爲社論登了幾個月，甚至還收到了人家的恭維之辭」㊂。由此可見，在現有論文中只是馬克思當時「關於中國的一切論文」寫作可能被保存下來的一部份，在現存的三篇中英貿易論文恐怕也只是中英通商全史的「吉光片羽」了。

關於中國問題的寫作上，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其他一切寫作一樣，引用一切可能見到的材料，不僅耐心的整理那豐富而繁雜的材料，並且充分的佔有它，從中探求出歷史事實的眞相，由史事的現象到史事的本質，作出了最深刻最動人的分析。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中國問題論文的本身不但創造了對中國歷史的科學分析，且在寫作方法上乃至對文獻學或歷史材料的考訂辨僞上，也表現了高度的示範性。所以本書是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歷史觀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頭等重要著作。

書的內容是以中國問題爲主題，寫作時就不可避免的要引用中國材料和涉及中國史事。本書主要部分雖大都用英文寫成，但組成論文的材料來源又是根據各種文字的記載。這些論文然後由英文翻成俄文，中文則又從俄文迻譯。這樣一再轉譯，到最後要把書中引用的中國史材加以還原，勢必感到極大的困難。所以本書譯者表示本書很大的一個缺陷，即書中所引證的一切文件原文，無法找到，有幾條引證，只得譯出大意。以下所要討論的，除了爲本書提供引證的幾條原文來彌補這個缺陷，還想就譯文方面提些意見，作爲本書再版時改進的參考。

一　關於引證中文原文的補正

1、本書頁三十六引註資本論中關於王茂蔭的一段史事說：

「中國的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居然向天子上

㊀見李大釗守常文集（一九四九年北新書局版），頁九七——一〇四。

㊁這篇論文原發表在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日的紐約每日論壇。一九二六年三月重刊於倫敦出版的"The Labour Monthly" 第八卷第三期中。前述李大釗的譯文中說：「近者美國出版的工人月刊載有馬克思中國及歐洲的革命一文」，其中美國可能是英國之誤。由此可見，李大釗的譯文大約發表在一九二六年間。

㊂解放社馬恩論中國（一九五〇年新華書店版），頁一九六。

條陳，暗中想把官票寶鈔變爲可兌現的錢莊鈔票。因此他在一八五四年四月鈔法核議會的奏呈中，受了相當申飭。他是否受了竹板的笞責，則無消息。該奏呈之結尾有云：『本核議員等曾將其條陳詳加審核，覺其中所言，專利商賈，於朝廷毫無一利。』」

這段譯文大體上是採用郭沫若的譯文㊃，語氣稍加改變。郭大力王亞南合譯的資本論是現時最完備最通行的一個中譯本，現把它的譯文引來比較：

「中國理財官王茂蔭有一次曾上條陳給天子，要把一切官票化爲兌現的寶鈔。官票管理司，於一八五四年四月的報告中，對於他的計劃，曾痛加指斥。他是否因此受笞刑，却沒有記錄可查。報告的結論說：『官票管理司審議該計劃之結果，認該計劃完全是爲商人的利益，而於皇室毫無利益可言。』」㊄

這兩段譯文顯有出入，其中涉及到中國史事的地方也不盡符合。王茂蔭的職名解放社的譯文是對的。在清代，管理貨幣的機關是錢法堂，一個由戶部右侍郎兼管，一個由工部右侍郎兼管，下設造幣廠，戶部有寶泉局，工部有寶源局。王茂蔭原出身於戶部司員，到咸豐三年十一月間（一八五三年十二月間）做了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在這以前，他對當時的財經問題常發表意見。在戶部侍郎任內，他因堅決反對「鑄大錢」的通貨政策，主張實施鈔法來克服財經的困難。但照當時規定的法制，官票、寶鈔只能按成數解交官項，在京師則放多而收少，在軍營則簡直有放無收，在直省州縣則又有收無放。因此他主張票鈔都應兌現，兌現的方法是給商人以相當的利益，使其作爲一個中間交互流通的樞紐㊅。咸豐四年三月初五日（一八五四年四月二日）他便上了一個再議鈔法摺提出四條實施鈔法的辦法：（一）擬令錢鈔可以取錢，（二）擬令銀票並可取銀，（三）擬令各項店鋪用鈔可以易銀，（四）擬令典鋪出入均准搭鈔㊆。這只是照戶部所定在收放之間加以參酌改擬。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二兩條。第一主張錢鈔（即寶鈔）准交官項，又准兌現。兌現辦法以戶部寶泉局逐月所鼓鑄的制錢積存起來作爲兌現的準備，兌現許以半年爲期，以維持寶鈔的信用。次爲銀票（即官票）准交官項之外，又准兌現。兌現以所收各州縣錢糧及各地關稅銀兩爲準備金，讓商人以鈔易銀，「則鈔益貴重，處處可取銀，即處處能行用，而不必取銀。」這點顯然違背了滿清政府以搜刮爲目的的現銀集中政策。王茂蔭的摺子奏上，當天即奉旨申斥，認爲他的主張「有不便於國而利於商」，並以此摺着軍機大臣詳閱後，專交與恭親王奕訢等速行核議，「以杜浮言。」三天後，恭親王奕訢、親王銜定郡王載銓奏復，說「王茂蔭條陳鈔法，窒礙難行。」上諭即照所奏「均無庸議」，並傳旨對王茂蔭嚴行申飭㊇。在王茂蔭奉旨嚴飭後沒有幾天，滿清政府就把他調去做兵部右侍郎了。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王茂蔭條陳鈔法受斥事件來作爲討論貨幣問題的例子，史事是斑斑可考的。馬克思之所以能應用這事件的資料，主要是由當時俄皇派駐北京的教士巴達第(The Archimandrite Palladius) 把它繙譯介紹到俄國文獻裡去，然後亞培爾 (K. Abel) 和麥克倫堡 (F. A. Mecklenburg) 由俄文譯成德文，馬克思引用這資料即是根據德文。（關於這點，在好些年前似乎有人作過這樣一個考證。）巴達第原名 Piotre (Peter) Ivanovitch Kafarof（一八一七——一八七八），自一八四〇年九月來到中國，中間三度回國，先後留華約二十餘年。他因精通華文，曾任俄羅斯館的提調，助理俄國駐北京大使舘辦理對華外交文牘，並和理院藩院辦過交涉。編纂有中俄大字典（十一册，未完），俄譯西遊記等十餘種著作，爲當時歐洲有名的漢學家㊈。

從前有些人根據各種不同文字的版本來繙譯資本論，對於這段史材的回譯便發生很大的困難，而且錯誤百出。只要熟悉這椿史事，就可以知道王茂蔭原來的主張和事實經過了。解放社譯文中的「官票寶鈔」，這在當時是兩個不相同的東西㊉。「官票」指「戶部官票」，是一種不兌換的債券。票面額爲銀兩（有一兩、三兩、五兩、十兩、五十兩五種），所以又叫「銀票」。「寶鈔」指「大清寶鈔」

㊃郭沫若：資本論中的王茂蔭，光明第二卷第二期。

㊄郭王合譯資本論，（一九三八年讀書生活出版社初版）第一卷頁八二，註八三。

㊅吳晗：王茂蔭與咸豐時代的新幣制，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六卷第一期。

㊆見王侍郎奏議，卷六，頁一一——二五。

㊇這兩個上諭見王先謙東華續錄（光緒十六年刻本）咸豐三三，頁一二，頁一七——一八。

㊈S. Couling.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Shanghai. 1917) pp. 420—421;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o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1929) pp. 486—487.

㊉據吳晗指出，資本論中德文原文 "Reichsassignate" 是指「寶鈔」而言，並非「官票」。文見前揭。

鈔面爲制錢若干文。此鈔即代制錢行用，所以又叫「錢鈔」。按照規定：「官票」銀一兩抵制錢二千文，「寶鈔」二千文抵換「官票」銀一兩，與當時通行的大錢制錢相輔而行。凡民間完納地丁錢糧關稅鹽課及一切交官辦部協餉等款，均准以「官票」「寶鈔」五成爲率，其餘仍交納實銀。又前引兩段譯文中有所謂「鈔法核議會」和「官票管理司」，在清代各種制度中根本就不曾有這一類的機關名稱。（案這個名詞德文本資本論中作 "Assignaten Komitte"，英譯本通作 "Assignate Committee."）按中國史事和習慣繙譯，應指皇帝交王大臣議奏而言。⑪因照清代舊制，凡國家大政——自宗廟陵寢乃至人民疾苦，及兵政財政對內對外——和臣工條議例由皇帝交王大臣議奏，審核其可行與否，把意見貢獻給皇帝作最後決定。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引用該報告的一段即指王大臣核議的奏覆。這個原件在清代官書中沒有看見，清實錄和咸豐朝東華續錄也只保留了對這奏覆的批諭。這個奏覆原件我們在清代軍機處舊檔中找到了，該奏原文很長（爲了節省篇幅不錄全文），題爲「咸豐四年三月初八日和碩恭親王奕訢等謹奏：爲遵旨核議王茂蔭條陳鈔法不可行摺」⑫。起首引三月初五日硃批，繼錄王茂蔭的原奏一段，然後議論一番，接着就王茂蔭原奏所擬四條辦法逐條核駁，在全文結尾時奕訢等奏說：

「……臣等詳閱所奏，盡屬有利於商，而無益於餉；且該侍郎係原議行鈔之人，所論專利商而不便於國，殊屬不知大體，所奏均不可行。……」

這就是馬克思資本論中引用所謂「該報告」結尾一段話的原文。

2，在馬克思中國的和歐洲的革命論文中（頁四十二）也有一段涉及中國史材的譯文：

「因此，一八三三年一月五號，北京皇帝下了一道聖旨，命令武昌總督及漢陽巡撫免徵一部分欠稅和延期徵收稅捐，並命令他們最重要的，是絕對不得於應徵數目外再事苛求，聖旨中說不然『貧民何堪忍受？』又說：『如此，吾民當災患頻仍之際或可免於稅吏之勒索。』」（譯者原註：「此地引證，由俄文譯成中文。」）

從前李大釗曾根據英文把這篇論文翻譯過來，他的譯文是：

「這樣，在一個一八五三年一月五日由北京發出的皇帝詔令裡，我們可以察知有些頒布給武昌漢陽等處以及南方各督撫令他們減輕或緩人民的納稅，特別是無論如何不許強取以逾定額。詔令上說，倘不這樣，則『貧苦人民將何以堪』。詔令上又說：『行當舉國艱憂之時，如此吾民或能免於苛吏誅求之禍矣』。」⑬

這兩段譯文達意也有些出入，但無法找到原文來校對。關於詔令的年代，解放社譯文作「一八三三年一月五號」，李大釗譯文作「一八五三年一月五日」，時間相差二十年。仔細考察史事，便知解放社譯文有誤（筆誤或印誤均有可能），馬克思文中引用的「上諭」就是下面的一道諭旨：

「諭內閣：……前此被賊（案指太平軍，以下均同）滋擾省分，疊經降旨，令該督撫查明分別蠲緩撫卹。茲者岳州失守（案岳州在咸豐二年十一月初三日爲太平軍佔領），擾及武昌漢陽一帶，脊懷南服，憂思益深。若再令疆吏飭屬照常繳納，小民其何以堪？着該督撫悉令體察被賊（？）地方，分別蠲緩，奏請恩施；其餘應行徵收錢糧之處，亦著嚴飭各州縣總期照舊開徵，毋得稍有浮勒，庶幾吾民於顛沛困苦之時，不至再受追呼迫切之累。該大臣督撫等即刊刻謄黃，徧諭閭閻，共各仰體朕意，速振軍心，用殲蠢醜（？），毋再因循玩泄，致干重罪。特此通諭知之。」⑭

由此可見，馬克思參考這道諭旨並直接引用其中的原文，就是「小民其何以堪」和「庶幾吾民於顛沛困苦之時，不至再受追呼迫切之累」，這兩句話了。

（未完）

---

⑪ 參看吳晗：王茂蔭與咸豐時代的新幣制。

⑫ 中國科學院社會研究所藏抄檔。

⑬ 守常文集，頁九九。

⑭ 見王先謙東華續錄，咸豐十八，頁三一——三二。

本刊歡迎
批評！
投稿！
訂閱！

學術文摘

文摘這一欄，主要是爲了節省讀者的時間，摘錄的部分，只能包括各篇論文的要點和結論，以便讀者瞭解全文的大意。——編者

由「實踐論」說到經濟工作

王學文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工作的實踐。這種實踐是在毛澤東經濟思想領導之下進行的。毛澤東經濟思想是馬列主義的經濟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列主義經濟思想，是馬列主義經濟思想與中國經濟實際情況相結合而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思想。

我們知道，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與馬列主義經濟思想的中國化有密切不可分離的聯系。在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與中國化的馬列主義經濟思想長年間不斷的交互作用過程中（理論變爲實踐，實踐又產生理論），不斷向前發展（理論推動實踐、提高實踐，實踐又提高發展理論）與密切統一過程（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密切統一過程）中，證明中國化的馬列主義經濟思想的正確與發展，並證明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是科學的經濟思想領導下的實踐，能夠得到發展和獲得顯著的成果。因此，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與領導思想，尤其是經濟的領導思想，是與毛澤東同志的正確的思想和英明的領導不可分離的。

* * *

毛澤東同志的經濟思想有它的哲學的理論基礎，即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實踐論」就是毛澤東同志以有系統的文字表現出來的、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

我們經濟工作者和經濟理論工作者，要認識生產的重要性，要把生產當作經濟工作的基本部分。一切經濟工作以生產爲基礎爲中心，要爲發展生產的總方針而服務，要把發展生產的總方針貫徹到自己部門的工作中去。只有生產這一基本工作做好之後，其他經濟工作才有基礎，同時，其他經濟工作配合生產推動生產的時候，才能使生產順利進行有效地發展，並且做好自己部門的工作。

因此，判斷經濟工作好壞的標準，在生產部門要看在經濟工作中是否能起「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作用，其他經濟部門對於生產部門是否能有配合生產推動生產發展生產的作用。

我們經濟工作者，尤其是生產工作者必須在生產中，生產過程中，認識人們對於自然界的關係，其性質和規律性，同時，要在生產中，生產過程中，認識人與人間的關係，其性質和規律性。只有從生產兩個必要因素結合統一運動來認識生產，才能具體的、深入的認識。

* * *

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實踐是我們知識產生、形成和發展的基本來源，「一個人的知識，不外直接知識和間接經驗兩個部分」。我們的經濟工作者根據這種指示，不能以自己的工作經驗爲滿足，更不能以書本知識爲滿足，必須在自己工作中多多積蓄經驗（這是寶貴的），並且要吸取和接受他人的經驗；不單注意一個時期的經驗，並且須要長時期的經驗；不只現在的經驗，還要過去的經驗；不單注意一部門一地區的經驗，還要注意其他部門其他地區的經驗；不只是中國的經驗，還要外國的經驗；不只注意成功的經驗，還要注意失敗的教訓。這樣才能在工作經驗上充實自己，豐富自己。

我們經濟工作者，不要以自己工作上的感性知識爲滿足，要知道感性知識還只是低級階段的認識，還只是表面現象片面的認識。必須經常注意掌握運用唯物辯証法與馬列主義的經濟理論，總結我們經濟工作的經驗。要注意經濟工作的決議、決定、指示、工作計劃佈置和執行的過程及結果。實踐的結果，應成爲工作總結的重要項目之一，並判斷工作好壞的標準。

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如其他馬列主義理論一樣，是從實際中來又要回到實際中去。從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長期大量實踐總結中得到某些經濟規律，我們就能進一步比較全面的、深入的認識了某些經濟工作的實踐。

我們今後實踐過程中可以利用這些經濟規律，按照這些經濟規律辦事，更便於推動我們經濟工作的實踐。

經濟規律客觀地存在於經濟現象之中，在經濟現象中起着其應有的作用。這種經濟規律是可以被我們認識的。這種客觀經濟規律被認識的結果，就形成爲一定的經濟原理。我們對於經濟工作情況經濟規律的認識，愈能比較全面比較深刻，我們在實踐過程中，運用這些經濟規律，就對經濟工作的領導與掌握愈能加强，我們對經濟上自流性盲目性以及其他的阻碍的鬥爭力量也愈大，我們的實踐就能夠比較按照計劃方案順利地進行，并獲得效果。

＊　＊　＊　＊

我們處於戰爭與農村被分割的環境的時候，我們需要掌握戰時農村經濟的特點與其運動規律。我們由農村進到城市，並處在戰爭基本結束的時候，我們就需要掌握現在全國經濟情況、特點與其運動規律。不單要掌握農業經濟運動規律，還要掌握城市經濟運動規律，並且要注意城鄉物資交流與內外物資交流等等的規律，以及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等等政策。

雖然現在的新民主主義經濟與舊中國經濟之間還有些共同點，如農村半自給自足經濟存在與城市商品經濟相當發達等等，但重要的不在於這些共同點，而在於這些經濟的特殊性、經濟運動總規律的不同。新民主主義經濟不單完全不同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經濟較高級階段，也不同於低級階段，因而其經濟的運動規律也有不同。

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的特點，就在於認識這些經濟的特點與經濟運動的特殊規律。我們在實踐過程中，需要針對這些經濟的特點定出辦法，有意識地運用這些經濟的特殊規律。我們要認識新民主主義經濟是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的經濟，而新民主主義經濟運動規律又不同於社會主義經濟運動規律。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之中，我們又要認識五種經濟各帶有自己特點的運動規律。這五種經濟形成及其帶有自己特點的運動規律，互相交錯，互相影響，形成新民主主義經濟現階段經濟運動的總趨勢和總規律。我們如果能夠正確地周到地深刻地認識與掌握新民主主義各種經濟情況、運動規律及其發展的總趨勢和總規律，我們就能夠在實踐過程中比較自由地，因此也就比較順利地有效地進行我們經濟工作。

我們要注意，不單經濟思想不要落後於經濟工作的實踐，同時，我們的經濟工作思想，還要在工作實踐過程中起推動領導作用。

＊　＊　＊　＊

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是我們理論學習的最好教材之一，在認識論、思想方法上，給我們以正確的、深刻的、寶貴的指導。這是社會科學的基本理論，也是關聯一切經濟問題的基本觀點與方法。

毛澤東經濟思想（或經濟理論）與其基本觀點和方法，是密切不可分離的聯系着、統一着。我們學習「實踐論」正是從基本方面來了解毛澤東思想，首先是與我們工作有關的經濟思想。

如果我們努力學習，深入鑽研，能夠掌握這一著作的精神與實質，運用其觀點與方法到我們工作中去，對於工作推動與工作效率的提高，是有好的結果的。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六日人民日報）

從經濟看美國政治

陳翰笙

美帝國主義發展起來，不過短短六十年光景。所以，它在政治、外交上的反動經驗，遠不及英國。

美國帝國主義勢力的發展，到日本投降爲止，都是很順利的。這是由於歐洲的國際關係，造成了這種順利發展的條件。第一次大戰時，美國與英、法聯合起來，沒有費多大力氣就得到了很大的利益。第二次大戰時，美國參加了蘇聯所領導的盟國方面，也得了很多便宜。兩次大戰，美帝國主義都是以借欵和物資支持戰爭，所出人力比較少。從一次大戰到二次大戰中間，即一九二〇至一九四〇這二十年中間，美國的富力發展得很快，以負債的國家很快的變成了放債的國家，而對外的投資，也已與英國相競爭。美國在二次大戰中，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六年的六年之中，生產力增加了差不多一倍半，所以現在美帝國主義的力量能夠壓倒英帝國主義，並且能夠吸收法、德、荷、比帝國主義的殘餘力量。

美國財閥勢力的集中，在這十年內特別快。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內，有五十萬家光景的中小工商業被擠倒了。目前，美國全國的工業生產，都爲二百五十家大公司所控制。這些財閥中的最大領袖有三個。首爲洛克斐勒財團，勢力最爲普遍；其次是摩根財團，對外投資不及前者；第三是新興的杜邦財團。大體講來，這三個財團聯合地領導着美國的內外政策。所以，美國的兩個政黨在本質上毫無差別，在對外實行侵略、對內壓迫與剝削美國人民的基本政策上也無歧異。

三個財團各有其特點，而又互相結合。洛克斐勒最老練，範圍最廣大，投資側重在煤油方面。洛克斐勒的資產佈滿於南美、近東和非洲。羅斯福逝世後，洛克斐勒財團的勢力在華盛頓政府中要佔第一位。美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當然與這個財團有密切關係。摩根財團與英國銀行有密切關係，而在日本有大批投資，所以它的一切主張特別重視日本，尤其是極力支持麥克阿瑟。至於杜邦財團，則是一九二〇年以後，才廣大發展起來的，它的資本是與納粹德國、戰前法國的資本合夥，重心是在西歐，意識上最法西斯化，並特別偏重歐洲方面。美帝國主義的內外政策大都是這三個大財閥集團協調的結果。

美國中部地方和芝加哥以南的一些大城市，那裏另外有一個財團，它們的富力只是在地產、保險事業、某些輕工業及郵遞買賣公司等方面，它們的市場不在國外，而在

國內。目前代表這個財團的人物便是塔夫脫。近年來，在美國參院中塔夫脫是代表共和黨對內政問題發言的有力人物，但是共和黨對外交問題的最有力的發言人，却是范登堡。最近，范登堡因病退休，起而代之的是杜勒斯。杜勒斯雖沒有做參議員，但被杜魯門任爲總統的外交顧問，並且參加了聯合國的美國代表團。塔夫脫與杜勒斯在外交政策上是不一致的，因爲杜勒斯是完全代表洛克斐勒財團的。因此，塔夫脫最近所發表的言論，往往反對杜魯門、艾奇遜、杜勒斯這一批人的對外侵略的方法。這反映出美國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

杜勒斯出身於政客世家，在少年時，即與各大財閥勾結。在一九二〇至四〇之間，他爲在西歐發展美國資本勢力，出了很大力氣。在二次大戰期間，担任洛克斐勒基金委會主席數年。直到去年，杜魯門因爲要保持兩黨在外交上合作的緣故，突然起用杜勒斯。杜魯門起用杜勒斯的作用，便是要將中國問題也納入於兩黨合作的政策之中。因此，杜勒斯在今日美國反動外交政策上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塔夫脫固然是爲他的財團利益而發言，但是也多少反映了美國中小工商業者與美國中部和西部的農業經營者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觀念。甚至胡佛的意見，也多少利用了美國許多階層對於美國政府現行外交政策的不滿。據目前的情形看來，這般中小工商業者及農業經營者們，反戰的情緒相當流行。但是他們現在還缺乏聯絡、組織和領導，因而還不能向壟斷的大財閥作有效的鬥爭。他們今後如能與工人階級結合起來，那末就將逐漸在政治上表現出他們的力量。

二次大戰所造成的美國的經濟繁榮，到了一九四八年底，可以說是結束了。從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九年七月，美國的生產力下降得相當快，一般人都承認經濟恐慌要來到了。杜魯門政府想盡方法避免或至少是延緩危機。所謂危機，其內在的原因，就是因爲中等家庭在戰時的儲蓄陸續化光了，他們的購買力就逐漸下降了，市場上顯然出現了緊縮現象，因此引起了工商業的倒退。在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因爲積極擴充軍備，並有大批的物資送往國外作爲「經濟援助」，才暫時維持了工商業的局面。去年，美帝國主義發動侵朝戰爭，其一個目的便是延緩經濟恐慌，解決六百萬人的失業問題。美國侵略者主要的目的是以戰養戰，以侵朝戰爭來擴展種種軍需工業，並彌補經濟上的破綻。

一九五〇——五一年度美國軍事方面的支出，包括軍事本身，原子彈製造，援歐軍火以及馬歇爾計劃的對外援助等等，已達二百二十億美金，加以侵朝戰爭發動後所增各項軍費，包括戰費，軍備擴充費，以及對外軍援增加費等等，計有一百八十億，兩項共四百億美金。此數已佔美國全國國民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照目前情形看來，到一九五三年時，備戰力量可使全國經濟踏入戰時狀態。按照過去經驗，例如一九四四年的數目，到一九五三年時，軍事方面支出，至少要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八。可是上次大戰中，抗拒納粹軍隊的力量主要是出於蘇聯，美國雖然動員了一千二百萬軍事人員，化了許多物資，但所參加的戰爭，都是在敵人邊緣陣地。美國如再發動新的侵略戰爭，軍事方面的支出，決不止一九四四年的規模。況且，美國赤字財政，已日在增加。侵朝戰爭前，政府負債已達二千五百五十億美金。上次大戰中，美國還能一面大量製造軍火，一面增加國民收入，而在新的侵略戰爭中，就無法做到這一點。上次戰時的繁榮，是使一般人民由儉入奢；現在雖然還有人夢想再來一次戰時繁榮，事實却只有使他們失望，逼得他們由奢入儉，把生活強迫降低。因此，反戰情緒就不能不增漲起來。那時，世界和平民主陣線和美國內部人民覺悟力量的夾攻，就會促成美國帝國主義的徹底失敗了。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

中國古代史的劃階段問題（註）

Л·В·西英諾夫斯卡雅

中國保有着無數跟古代及中世紀歷史有關的著作，其中包括歷史的、哲學的以及文學的著作。但是如果不能很正確地劃分階段，就不能够研究歷史，就不能用馬列主義的歷史觀點來批判地修正這些巨大的歷史遺產。但是，由於對許多基本問題及整個歷史分界問題還沒有解決，便使各形態的更替和發展過程及其年代的精確表現成爲困難。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中國歷史的研究，證明了中國過去歷史也是和其他民族一樣經過了這幾種生產關係的發展階段，這即是原始公社制度、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但，一直到現在，關於這些社會的發展和更替的基本問題，還沒有充分的被研究出來。

關於中國古代社會初期原始公社制度的性質問題，也有過很多的爭論。考古學的發現，提供了不少文字來源的知識，並且對於最初的說法或是提出疑問；或者是加以駁斥。首先，否定紀元前四、三、二千年前帝王的存在。歷史小說神話材料，文字學的分析，尤其是物質文化的墓碑等等，說明了原始時期國家存在的不可能。相反地，他們

（註）這是一個提供討論的歷史問題。

證明了原始人類改善勞動工具和獲得生活資料的能力，是經過長期的過程。

隨着勞動工具的發展，人類社會就從蒙昧時代過渡到野蠻時代，過渡到起初以母系而出現的氏族制度，由於畜牧和農業的發展，於是引起母系氏族由父系氏族的轉替。

關於土地公有，氏族名字的相同，宗教觀念和祭祀的相同、方言的相同等等的特性，在文字來源中可以看得出來。大歷史學家司馬遷，在自己的史記中曾經談到族長會議和氏族內所有男女長者的代表會議。圖騰的遺跡也在古代英雄的肖像中被保存着。

由此可見，在最早期的中國古代生活中是曾經有過原始公社制度的特點。原始公社制度的這一最後階段，大體上是經過了二千年才崩潰的。

手工業的發展，這時期也達到了相當的高度：青銅、骨頭、石頭等的加工，陶器的生產，以及絲織品等，已經發展起來了。農業和手工業剩餘產品的出現，引起了交換的出現。各種各式不同的勞動，不能再由一個人來完成了。於是「產生出勞動的兩大分工：手工業從農業分離出來。」

關於奴隸開始被用來經營的這一事實，也可以從甲骨文中得到確証。在家族奴隸之下，奴隸是集體所共有，這些奴隸是屬於氏族或家族的。奴隸的來源是「軍事俘虜，但業已造成了使同種族和同氏族人淪爲奴隸的可能性。」

中國奴隸所有制度的發現，乃是蘇聯歷史學家以及中國進步的歷史學家的光榮。這種理論的產生，成爲一個條件，幫助蘇聯馬列主義的歷史科學的發展，並使列寧斯大林學說能在國外更加廣佈開來。在蘇維埃歷史文獻中，認爲奴隸所有制的時代，是從紀元前二千年末和一千年初開始到紀元二—三世紀爲止。進步的中國歷史學家之間，對這問題還沒有完全統一，但大多認爲在紀元前一千年前中國社會就已經從奴隸社會轉入了封建社會。

特殊的古代的士大夫階級代表了統治階級一個相當大的中間階層。他們的出現，反映出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界，這種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分界，又引起了這一中間階層的分裂。體力勞動注定了要成爲奴隸與貧苦者命運。智力勞動成爲統治階級的財產，幫助統治階級去解決一系列的問題，諸如確定國家組織、制定壓迫與榨取人民的制度，爲他解決軍事、外交等等的問題。老子的唯物觀點，和孔子的唯心論，正產生在這個時代。在紀元前一千年左右，就發生了政治上的分界，使統治機構複雜起來，並且產生了國家。

氏族民主的機關，很早就在中國古代國家中死亡了。紀元前一千年的古代史料，一點也沒有談到這一點。從古代還仍然保留到周朝的這種長者會議，只有所謂三公，即是上層貴族氏族的代表者和長者的共同會議。

但是在國家機關結構中，除了這些貴族以外，還有一些最接近於帝王的個人從僕與奴隸，因此，執管着經濟和家庭的「王」就轉變爲最有勢力並管理國家事情的人。

如果認爲中國的社會只有家長制的奴隸，而不延續爲更發展、更分化的奴隸所有制，這是沒有根據的。向發展的奴隸制度的過渡，必須由生產力的發展來作爲條件，作爲這一發展的基礎的，是鐵工具的大量使用。

原始公社關係的殘餘，（這一種在其最初的階段，就已經在中國社會牢固地生了根的原始公社關係的殘餘）曾妨害了奴隸社會的更進一步的發展。許許多多帝王間的紛爭，也成爲它的一個很大的障碍。

由於紀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的統一國家的形成（這是用併吞了一切小和大的王朝的方法來達到的），由於帝王間相互兼併的減少，由於農業、財政、軍事、行政等等的政策，爲原始公社的殘餘帶來了很大的打擊。由此，他們有了很大可能來發展農業（當時最大的灌溉，運河的開掘，堤壩的建設）來發展手工業以及交通國內各區及超越國界的商業。紀元前四世紀到三世紀的改革，正是爲私有制及富有者的利益，以土地公社及自由民之淪爲奴隸的方法來進行的。到紀元前三至一世紀，在這大國家的境內，土地私有制的發展，土地向大土地所有者的集中，國家的奴隸所有制，以及私人的奴隸所有制的擴展，都獲得了巨大的規模。於是伴隨之而來的是公社的崩潰，大量自由民向奴隸的轉化。

整個灌漑的系統，也都是以奴隸勞動作爲基礎。黃河、渭河、以及淮河流域的最大的運河網，都是由奴隸的手來挖掘的，而在這時候，田地則是由自由公社的人員來耕種。

大土地所有制向公社的進攻，大私有莊園的形成，公社崩潰的加速，公社人員之破產而淪爲奴隸等等，這就是奴隸所有制社會這一階段的基本特點。

有錢貴族地位的鞏固，他們對於氏族貴族的勝利，土地私有發展，以及高利貸的發達等等，乃是公元前二至一世紀的特點。對外的侵略，打開了天朝國界的道路，首先是到中亞細亞的道路。新的象形文字的發明，以及孔子學說，正式轉變爲統治階級思想，這兩件事也發生在這一時代。

在中國從來沒有實行過像梳倫時代那樣的改革，這即是一種防止本國人淪爲奴隸的改革。天朝的自由土地所有者，常常處在淪爲奴隸的危險性的威脅下。因此，作爲勞動力主要潛在來源的公社，猛烈地展開反對奴化，反對土地向大土地所有者集中的鬥爭。在紀元前一世紀左右，燃起了好幾次礦山奴隸的大暴動。

到紀元二至三世紀的時候，奴隸制度已經進入到崩潰的階段，在當時，奴隸所有主，雖然還沒有放棄奴隸勞動的念頭，但是不得不尋求新的方式，以便讓那些土地所有者和手工業在自己大量的經營中工作。

在所有天朝的領土內晉朝統一國家的形成，正反映出想要確立一種全國性的新的過渡形式的嘗試。

在漢朝統治的最後百餘年中，公社社民的破產，使帝國失去了軍隊的來源，并引起了中國軍事力量的極度削弱。在四世紀初，匈奴和鮮卑等等，突破了帝國的邊界，侵入到中國的境內，根絕了這個在三世紀末所形成的統一的國家的機構。

於是一個剝削形態遂爲另一種剝削形態所代替，在中國開始了封建社會的發展。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光明日報「學術週刊」）

學術簡訊

新哲學研究會舉行座談

討論毛主席的『實踐論』

中國新哲學研究會爲了討論毛主席的「實踐論」，於一月二十八日和二月十一日在北京連續舉行了兩次座談會，到會的有首都各大學哲學系教授及其他會員等七十餘人。座談會由艾思奇同志主持，大家發言非常踴躍。第一次座談會由淸華大學哲學系提出報告，題目爲「『實踐論』－馬列主義的發展和中國傳統哲學問題的解決」，第二次座談會由北大哲學系提出報告，題目是：「從過去哲學的認識論的批判來學習『實踐論』」，報告後並展開討論。

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積極開展發掘工作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輝縣調查發掘團」於去年十月二日離京赴平原省工作，已於上月下旬返京，參加此次工作者共十二人，發掘周圍村大墓時，曾雇用民工四百餘人，爲遠東考古發掘規模最大的工作之一。計共獲鐵器、玉器、戰國車跡、陶器等共一〇六箱，現正開箱整理中。去年春季殷墟調查發掘組曾赴安陽工作近兩個月，獲得各種古物三十箱，其中最重要的爲虎紋大石磬等。又該所今年計劃分三隊出發工作，夏鼐副所長一隊赴河南，郭寶鈞一隊赴平原，蘇秉琦一隊赴陜西，將於今年內積極開展發掘工作。

北京歷史博物館開放

『中國原始社會陳列室』

國立北京歷史博物館「中國原始社會陳列室」，已於二月二日開放。該陳列室是該館所計劃的中國社會發展史陳列的第一部分，其餘各部分正在籌備中。

該陳列室依照社會發展史，根據考古學上的實物，用佈景箱、模型、繪畫來表現。使觀衆能夠認識到我們的祖先在原始社會中的生產鬥爭情況。

京市史學界春節茶話會

交換推進研究工作意見

中國新史學研究會於二月八日上午九時在北京舉行春節茶話會，到林伯渠等一百餘人，首由范文瀾報告，繼由林伯渠、郭沫若、吳玉章、徐特立等講話。在會上交換了如何推進史學研究工作並結合愛國主義的意見。

語言研究所舉行

第二次語文專題座談會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於二月十一日舉行第二次語文專題座談會，出席者有葉聖陶、胡繩、黎錦熙、呂叔湘、羅常培等二十餘人。會上就中國語法的特點、分析詞類拿什麼作標準、怎樣編輯教科書、對刊物詞句中有不合語法的現象怎樣矯正等問題進行討論。今後擬將研討所得在報刊上發表。

老子學說在蘇聯

蘇聯漢學家楊興順專著『中國古代哲人老子及其學說』，由蘇聯科學院出版局出版。專著並附有『道德經』的俄譯。著者詳細分析了老子的著作，說它是古代中國具有唯物論概念的最初哲學巨著之一。並說老子的學說，後來成爲中國唯物論學說發展的基礎。專著序言中說到唯物論哲學在中國的出現，推動了自然科學的發展，遠在公元一千年前，中國就有了天文學，那時的中國學者，對於數學及化學，已有了很好的認識。著者對於那些認爲中國一直沒有自己固有哲學的資產階級種族偏見論者，在本書中也痛加駁斥。

『列寧全集』第34卷出版

列寧的重要論文，迄全集三十三卷爲止，已經搜羅進去。三十四和三十五卷包括了一八九五至一九二二年列寧同各機關和個人往來的書牘文電，這是一些極有價值的補充材料。這些材料說明（一）列寧創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活動，反對『民粹主義』，『合法馬克思主義』和『經濟主義』的鬥爭；（二）擬訂無產階級政黨革命綱領的一些問題；（三）列寧爲召集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和實行大會決議的奮鬥，爲布爾什維克主義戰略原則的鬥爭；（四）列寧反對取消派、托洛茨基派、召回派、調和主義以及反對曲解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基礎的鬥爭。

『列寧全集』第三十四卷最近已在莫斯科出版。

蘇維埃大百科全書的文學部份

在蘇維埃大百科全書中，中國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也佔了很大的篇幅，魯迅、郭沫若、蕭三等著名作家的作品都用專文介紹。波蘭、捷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等人民民主國家的文學也佔有相當篇幅。

計劃編入蘇維埃大百科全書的文學部份，計有六千五百條，其中有一千多條是關於蘇俄文學的，一千二百條是關於蘇聯各民族文學的，二千條是關於外國文學，五百條是關於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東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文學的寶貴資料，如越南、朝鮮，也將包括在蘇維埃大百科全書內。

蘇聯的圖書編目機構

蘇聯的全聯盟圖書館，是國家規模最大的圖書編目機構。成立以來，已過三十週年。它的任務是登記全蘇的出版物，普遍供給出版消息。蘇聯政府指令所有書店應把一切印刷品送三十八份給該圖書館，一份存放該館，其他各份，分送全國各大圖書館。

學習譯叢

本叢刊每兩個月出版一次，選譯蘇聯「黨的教育」、「布爾什維克」等雜誌重要理論文章。每輯約八萬字，第一輯業已出版。定價每册5800元。

・第一輯內容・

聯共(布)黨史是行動中的馬列主義……П・波斯別洛夫
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共產黨宣言』是科學共產主義底綱領文獻……M・米丁
馬列主義科學中的新貢獻——論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Г・奥比奇金
論基礎與上層建築……A・索伯略夫
布爾什維克黨底思想基礎——論列寧底『做什麼？』及斯大林底『略論黨內的意見分歧』……И・沃爾科夫
如何自修馬克思底『資本論』……A・莫羅佐夫
如何在聯共(布)黨史學習小組中講授黨史第一章『爲在俄國建立社會民主工人政黨而鬥爭』……M・伯遼佐娃
座談會是政治學校中學習底基本形式……A・夏德林娜

學習雜誌叢書

★ 新書預告 ★

社會科學基本知識講座(第一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胡繩等著　即出
從舊中國到新中國　亞士達夫葉夫著・張彥譯　即出
論思想改造問題　艾思奇等著　排印中
論斯大林著「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克魯日科夫著・蘇丹譯　排印中
學習「爲人民服務」　田家英著　排印中

學習雜誌社出版 ★ 三聯書店發行

北京市軍管會登記新字第五十號
北京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第九號
經中國人民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新建設月刊

第三卷・第六期

負責人　費青

編輯委員（以姓名筆劃爲序）

千家駒　向達　*沈志遠
*吳晗　狄超白　李廣田
金岳霖　范文瀾　*胡繩
袁翰青　孫曉邨　*陶大鏞
*費青　費孝通　*張志讓
*傅彬然　聞家駟　雷潔瓊
樊弘　*鄭昕　潘靜遠
錢偉長　錢端升　儲安平
鍾潛九　*謝覺哉　嚴景耀

（有*者，爲常務編輯委員）

出版者　新建設雜誌社
地址：北京東華門南夾道六十二號
電話：(五)五九六六
上海辦事處：上海延安東路中匯大樓六一八室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定價每册四千元

訂閱：
三個月三期　一萬二千元
半年六期　二萬二千八百元
全年十二期　四萬三千二百元
平寄郵費免收　掛號郵費另加

本刊每月一日出版
定價每册四千元

北京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第九號
經中國人民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刊每月一日出版
定價每冊四千元

CHINESE-LANGUAGE PERIODICALS

TRANSLITERATION: Hsin chien she

TRANSLATION: New construction

YEAR: 1951

NUMBER: 1 - 6 of Volume 4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c., Ann Arbor, Michigan.